

[法]皮埃尔·阿考斯　[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　著　　郭宏安　译

CES MALADES QUI NOUS GOUVERNENT

病夫治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CES MALADES QUI NOUS GOUVERNENT

病夫治国

[法]皮埃尔·阿考斯　[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　著
郭宏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夫治国/(法)阿考斯,(瑞士)朗契尼克著;郭宏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4-04023-9

Ⅰ.病… Ⅱ.①阿…②朗…③郭… Ⅲ.政治家—人物研究—世界 Ⅳ.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8858号

书　　名　病夫治国
著　　者　[法]皮埃尔·阿考斯　[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
译　　者　郭宏安
策划编辑　沈晓平
责任编辑　沈晓平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兴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1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23-9/K·511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要写一篇论文，谈谈疾病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说在创造这个历史的伟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为人知的作用。有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

亨利·德·蒙太朗

——《灯火管制:1965,1966，1967 和 1972 年手记》第 42 页

前　言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惟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对于奠定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神经官能症是个很不稳固的基础。尽管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通常他们也同样迅速地垮台。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造。如果米提亚底斯[①]在马拉松逃跑，夏尔·马代尔[②]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③]，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托马斯·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心理面貌》

① 雅典军事家（约前540—489），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王大琉士一世。

② 公元7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约688—741），公元732年，他在普瓦提埃阻止了阿拉伯人的入侵。

③ 据《圣经》，耶稣被犹太人抓住，送交当地巡抚彼拉多，后者将耶稣交付众人，听凭他们处置。耶稣遂被钉上十字架。

目　录

1. 富兰克林·罗斯福

此时,我们是在雅尔塔。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2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这个疗养胜地的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宫殿位于黑海之滨,昔日的沙皇很喜欢在那儿漫步。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协议。八天中,他们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本世纪中,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今天,人们知道了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考验已使我们厌倦了。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冷战,随后是局部战争,殖民战争和工业战争,造反,革命,这些地球分裂的苦果。

现在,2月11日开动这个程序的三位国家元首每人应负的责

任已经明确了。我们甚至能够描绘他们使新时代神圣化所用的洗礼盆。大喝高加索白兰地，宴会桌上杯盘狼藉，然后撤席，好宽宽绰绰地摆下决定30亿人的命运的文件。16点，他们在那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三大巨头终于告别了。

这些分析，这些描写，都出自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在过去长长的30年中，他们考察了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但是医学，很遗憾，被忽略了。

然而，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攫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基本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雅尔塔的事情就是如此。人们看到，在那儿会谈的三位国家元首中有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此人正是被视作西方世界泰坦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63岁。从北至南，他的影响遍及美国大陆。从澳大利亚沿海到欧洲的中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一个这样的人杰，以及他所承担的义务，都使人有理由询问他的情况。是他希望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他争辩，骂人，方才得到，而战斗却还在继续着。最高级会谈来了。但

是,他果真还有面对这次会议的智力和体力吗?

1945年2月3日,会谈前夜,距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上,跑道被冻得坚硬如石。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共有700人,运载他们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驾驶员不能指望在附近找到一个结冰不厉害的机场。到处都是一样地严寒。无论如何,飞机得降落。

罗斯福乘坐的飞机12点10分降落,到了机库附近才停下来。他想等候温斯顿·丘吉尔。20分钟以后,英国首相踏上了俄国的土地。当美国总统下飞机的时候,接待小组的负责人美国海军中尉诺里斯·霍顿在场,他看到的情景使他震惊。

一个名叫米克·雷利的警卫抱着罗斯福。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的特殊座位上,以便使他能够检阅苏联的仪仗队。

举世皆知,总统没有人的帮助是不能走动的。人们知道他曾患过脊髓灰质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是终生残废。在他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病毒已经侵入脊髓。两天之内,他就瘫痪了,软骨和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他从此戴上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用轻合金制成的假器包住了他的双腿。1921年,他初入政界的时候,病患已经将他压倒,但他战胜了可怕的疾病发作,于1932年11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11月7日,他三次连任,成为连续十二年生活在白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是惟一坐在活动椅上而持有这样大的赌注的人。霍顿中尉与众人一样,知道这些事实。他过去已经见过、接近过罗斯福。另一个原因也证实了他在萨基机场所感到的震惊。

“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八年后写道，“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一个玻璃做成的人，说话声音微弱。他与周围的人是多么的不同。

这些征候，医生看得出来，有时医学上的外行也看得出来，当然，这并不太客观，不能据此作出诊断。但是，某些有经验的医生，当从他们熟识的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征候的时候，他们能预感到这些人在以后数日或数星期内将会有疾病的大发作。好像机体就是这样提醒人们注意，它正在受着痛苦。许多严重的病患正是这样警告那些成为目标的人们的，尽管需要正确地解释这些信息。

此外，霍顿中尉注意到罗斯福总统比人们预料的要消瘦得多。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他，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衣服是晃里晃当的。他喜欢穿领口不紧的衣服，这时，用不着解开领子，就能把手伸进去，直至胸脯。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在危险之中。

总统最亲近的左右与霍顿中尉有同感。乔治·福克斯就是一个，他在海军当过护士，每天晚上都给总统做按摩。阿瑟·普莱蒂曼也是一个，他是黑人，总统的仆人，替总统推车。在预定八天的会议中直接辅佐总统的10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代表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总统乘坐昆西号战斗巡洋舰，在从美国到马耳他岛的海上旅途中，在地中海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卧铺。他平时酷爱侦探小说，在船上读了一大抱。他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他却没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关于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

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他在马耳他等候丘吉尔,一道乘飞机去雅尔塔。他的身体的衰弱没有逃过英国首相的眼睛。“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后者对左右埋怨说。

然而,在旅途中,却有两个人对普遍感到的不安无闻无睹。第一个是总统的女儿,阿娜·波廷格夫人,她代替罗斯福夫人参加了这次旅行。第二个是海军少将罗斯·T·麦金太尔。波廷格夫人没有注意到明显的事实,倒并不那么令人惊奇,感情常常会蒙蔽理智。但麦金太尔海军少将显得目光不敏就令人吃惊了,他是罗斯福的私人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们习惯上总是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陆军或海军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军官又是医生,”罗斯·麦金太尔在他于罗斯福死后写的一本书中解释道。“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得受军队纪律的管束。人们因此可以相信他们的谨慎。”罗斯福没有背离传统。他当负责海军的副国务卿直到1920年,他一直念念不忘,就选择了海军的两位代表来负责自己的健康。第一个是他的按摩师乔治·福克斯,这一决定他终生不悔;第二个就是罗斯·麦金太尔,这一选择不那么合适。

因为,如果海军少将对他自1933年起在白宫无意中获悉的国家机密表示谨慎的话,人们可以问问他是否认真地看到或听说将要夺去总统生命的疾病日益严重。如果为他辩白的话,我们可以指出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即使不是军人,肯定也可以以同样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服务,特别是,他肯定可以更好地治

疗那位令人敬畏的患者，延长他的寿命。

无疑，罗斯福总统不是个好伺候的病人。因为他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人。许多作家都描绘过这个人物的肖像，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在基本的评价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头猛兽。

某些人把他表现为一个实干家，现实，坚毅。他们赞扬他自1930年起表现出的勇气，尽管身体残废，他仍向顶峰迈进，并给美国人民以激励。他们把他表现为被他吸收进白宫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罗斯福是“新政”的惟一发起者。新政是在1933年向被严重的金融危机弄得筋疲力尽的美国提出的一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他是对外政策上的天才的干涉主义者。他在1937年将美国的中立一扫而光，在1941年重新武装了软弱无力的英国，随后又制订了未来的信条大西洋公约。他又把最后两个任期用于反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同时为后来的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总之，他是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技术力量相协调的热情，能够战胜，直到忘记来自身体的灾难。

另一些人，描绘了一个不那么卓越，几乎是懒散的罗斯福，他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不愿打开档案袋。他临阵磨枪，免得白费力气。这些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名叫阿尔杜尔·孔特。他看到的是一个确确实实没有才能的人。一个肤浅的人，他说，一个平庸的学生，一个没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一个没有生意的律师，他彻底投身于政治，只是由于机会，由于他喜欢赌博。他因为富有而不真正知道钱为何物，所以他在政治中预感到了一个奇妙的领域，他在其中将消耗

其战斗的欲望和蓬勃的生气。“他喜欢排场，”他明确地说，“他在权力中既寻求其本质又寻求其装饰，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想像力和深刻的舞台感，能够组织奇妙的场面，脸皮相当厚，足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玩票作风也相当浓，以脸皮厚为乐，他从未解决过一个重大问题。”像许多才能超群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样，他是个迷信透顶的人，喜欢西部片，不满足于珍馐美味，能够在无意中发怒。总之，人们知道他不太喜欢自我修养。

社稷栋梁？心血来潮之徒？历史没有裁断。历史将会裁断吗？历史不会混合这两副面貌吗？有一点是确实的，要想抵抗住罗斯福的魅力，要想让他保持持续的警惕性，要想让他服一剂药，得有点性格才行。人们难以想象罗斯·麦金太尔博士能够与这样一位患者平起平坐。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这医生启程去雅尔塔时表现出那样一种令人放心的平静。

“自我供职直到 1942 年，”他写道，“总统从未生过病。”如果说他在九年中未曾签署过一份有关他的患者的健康状况的医疗公告，倒是更接近事实。

向白宫呈送的第一份简报写于 1943 年圣诞节。简报说感冒使总统不能离开房间。感冒恶化，转成气管炎，将会引起肠功能紊乱。麦金及尔宣布他已就此拟定了一项详细的医疗方案。1944 年春天，3 月、5 月和 8 月，这场好斗的感冒屡屡发作。每一次，麦金太尔博士都更换医疗方案，让大家知道，并且明确指出，对于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总统的状况极好。

今天，当一个伟大人物频繁卧床，当他越来越多地不在国家事

务中露面已无法隐瞒的时候，没人会认真对待那些谈到顽固性感冒的医疗公报。诊断是方便的，却几乎总是掩盖着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病症。1944年，在华盛顿，麦金太尔博士乐观的公告并未能欺骗那些接近总统的人。显而易见，他日益衰弱。

秋天，麦金太尔海军少将宣布罗斯福血压偏高，但未告知数字。他将其归之于总统进行的第四次旨在再任的竞选所造成的疲劳。

应该承认，竞选运动令人筋疲力尽。1932年，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虽是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罗斯福面前却轻若鸿毛。民主党的海潮将他席卷而去。罗斯福在1936年和1940年又以同样的压倒多数当选。但是，在1941年，一旦美国参加席卷欧洲的战争显得不可避免时，民众的热情就开始低落了。

“像以往一样，我们试图袖手旁观，”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们拒绝相信我们将被拖进去。伟大的领袖告知全国，这是可能的。他被拖入泥淖，名誉受到损害，被人嘲笑，但他并未失去勇气。”

必须如此，方能唤醒和动员起这个巨大的国家，制订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战争生产计划，为盟国、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直至澳大利亚人生产大炮、坦克、飞机和食品，建造最大的舰队和最有效最强大的空军并使之投入战斗，装备相距两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的850万士兵。

努力是巨大的，但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对强迫他们接受的牺牲表示不满。如果说1932年胡佛抵抗不住罗斯福的话，1944年同在

职总统角逐的共和党新优胜者托马斯·杜威就不一样了。他在与横行美国东海岸的诈骗分子们的斗争中以雷厉风行著称。1944 年 11 月,罗斯福仅在终点线上险胜这个顽强的家伙。一场艰苦的比赛。

在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当选的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忘不了他行动的艰难,费了多大力气才作完就职演说。他们还记得,罗斯福赢得第四次以及前几次成功所依仗的人,哈里·霍普金斯,情况更糟。

哈里·霍普金斯不仅仅是个心腹谋士,他简直与总统本人一般无二。他是个优秀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共济会的高级人士,如同他自 1928 年就支持的罗斯福一样。他成为他的心腹,取得了他的信任,后者的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作出的。

“他们共同培育了一种对救世主义、没有障碍的自由、适宜的世界主义的强烈兴趣。”阿尔杜尔·孔特写道。

霍普金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厕身于总统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中。他的微妙而困难的使命,特别是与斯大林、丘吉尔、庇护十二和戴高乐将军所打的交道,无计其数。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然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政敌对他的方法和效率提出异议。他与总统一样,性喜奢华挥霍,这使他成为政治评论家心爱的靶子。他终生成为他为之效劳的伟大人物的挡箭牌。

和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大病缠身。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他的病情的一部分。1936 年,他在胃部多次出血之后,做了一次胃手术,手术表明存在着一种癌性扩散的溃疡。胃的部分切除使他的生命为时不久。自 1941 年开始,每个月医生都说他只能活几个

星期了。那是一种少见的病，被称为同色病，起因于机体中含铁过多，无疑是为补充出血而进行的多次输血造成的。这种病使他日渐衰弱，也加重了终于在1946年夺去他生命的肝癌。他周期性地受到可怕的病痛的折磨和消耗，每次他都在惊讶的同伴面前站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又倒下了。他是一团烈火，然而是飘摇不定的烈火。

在萨基机场，1945年2月3日，罗斯福被警卫抱到汽车上。这一天，霍普金斯是被用担架抬下飞机的。在雅尔塔，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躺在担架上进会议室的。两个残废，最后的日子实际已屈指可数，美国总统只比他忠实的助手早死几个月。而迎战斯大林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斯大林尽管为高血压所苦，却仍然是矫健的。罗斯福的衰弱有目共睹。苏联国家元首早在1941年德黑兰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就亲自对丘吉尔评论过了，那次会议仅仅涉及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削弱德国军队的抵抗。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知道正在摧残美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他知道罗斯福为战后着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就从损害总统健康的不可避免的衰弱中大捞好处。

请看事实。伊朗最高级会谈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吹第二次最高级会晤。他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艾夫莱尔·哈里曼建议在一个与华盛顿和苏联首都距离相等的地方会晤，当时提出的是苏格兰的北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避而不答。他以伊朗方面的理由回避这次旅行："德黑兰会谈之后，我耳朵疼。我的医生认为任何乘飞机的旅行，任何气候的变化，都将

对我有最坏的后果。”

1944 年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适于召开他所希望的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康士坦丁、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他提出了他不能出国的理由，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坚持到 1944 年 10 月，正是他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次，他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建议罗马或马耳他。斯大林等到 11 月，罗斯福再次当选，他才回答道：“敖德萨。”

在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哗然。旅途远至黑海，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苦难。罗斯福犹豫不定。这次，斯大林又建议：雅尔塔。作为恩典，他不过让对方少走了区区若干公里。于是，罗斯福让步了。会晤最后定于 1945 年 2 月。

当扑克手或拳击手看到对手软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斯大林在这场角斗中的这一手。扑克手们虚张声势，拳击手们总是引逗对手远离场地中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一个：进一步消耗对手，以便更稳妥地给以致命的一击。苏联国家元首善于等待时机。1944 年底之前，他一直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不害怕罗斯福失去总统的位置。公民感和爱国心不允许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有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危机。他在地点上讨价还价，迫使罗斯福去就他，从而赢得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不想在健康方面冒任何风险。相反，这七个月却严重地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他的体力在 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2 月之间确确实实是消耗殆尽了。何况，昆西号是一艘防护良好但不舒适的战舰，乘坐它在无尽的冬季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是

一场严酷的考验。而从马耳他到雅尔塔的飞机也是困难的。当时，谁也估量不出这几个月中罗斯福健康毁坏的程度。在这方面，那里的医疗技术是不大有效的。

直到 1970 年，人们才知道了这种逐渐摧毁罗斯福的疾病的名称。这一年，美国医生霍华德·G·布鲁恩在本国一份有巨大声誉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文章。

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他于 1944 年 3 月作为会诊医生被召入白宫，协助罗斯·麦金太尔海军少将。这个决定是在罗斯福夫人的坚持下作出的。他首先注意到，过去人们经常否认是疾病减弱了美国总统的工作能力。后来他感到惊奇，罗斯福死后，还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死后，平常保存在华盛顿附近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院的两位总统的所有医疗资料，都不翼而飞了。但是，他本人保存了有关他的患者的医疗资料，足以使其病历复原。

布鲁恩博士指出，罗斯福多年以来就患有动脉硬化。这种病起因于动脉组织变硬，其特点是血管内膜中非晶质脂肪增多。增多始于膜的内层，附带引起弹性纤维的增生和加厚，以及被称为结蒂细胞的萎缩，最后引起钙化。这种病对大中血管危害尤重，例如主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动脉和四肢的动脉，最后可以引起阻塞。

这种病同人类一起诞生。它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到处肆虐，因为它并不放过儿童。

动脉高血压是这种病的最初征兆之一，再加上由胆固醇引起的障碍，胆固醇是一种血液细胞中的脂肪物质，同时还有视网膜血管变质，这在检查眼底时可以看出，患有这种高血压症的人就是心脏

并发症或脑血管并发症的真正候补者。这正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情况。

1944 年 3 月,布鲁恩博士连续测量了患者的血压,动脉血压太高:高压 185 毫米汞柱,低压 105 毫米汞柱。在欧洲,许多医生还以厘米而不以毫米为单位,那就叫做"18.5 和 10.5"。如果能够说血压有平均数的话,那么在国家元首那样的年龄,正常的平均数应该是 140/70。

心电图上,"T"波深度颠倒,也表明罗斯福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初期症状。左心室关闭不全。这说明心脏衰竭已有多年,已不能减缓动脉血的压力的增加。动脉硬化,血管中胆固醇积存,硬化板和部分阻塞血管的隆起增加。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向全身供血的左心室增大了收缩的力量,心肌劳累而顶不住。向动脉供血减少。心室因为能倒空血液而扩大。

为了控制这种病变,人们通常使用抗凝血剂和利尿剂,使血液稀释流通,特别是谨慎地使用强心药。布鲁恩提出方案,主要是卧床休息和使用毛地黄,总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

毛地黄是当时经常使用的强心药,可以改善心室关闭不全。几天之后,罗斯福可以起床了。但是,1944 年 5 月 26 日,他又为新病痛所苦。布鲁恩诊断为胆绞痛,起因于胆固醇过多,他通过照相发现胆囊为结石堵塞。

1944 年 8 月 15 日,新的警报。在一次游览太平洋的时候,罗斯福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心肌梗塞。一个血块堵塞了冠状动脉。这次堵塞形成了一块至少四平方厘米的坏疽,伤及心脏。镇静药平息了

疼痛，强心药使节律障碍和休克状态消失。此外，罗斯福总统使用抗凝血剂，也许还有抗维生素 K，这是当时的新发现，其作用是减缓血块的扩大。

虽有布鲁恩博士的诊治，1944 年 11 月 18 日，病人的动脉血压还是危险地上升了。病人卧床时量取的血压是 260/150。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

以上是 1944 年使总统衰弱的病变的枯燥描述。就是这些严重的病痛被麦金太尔博士称为“反复出现的感冒”。在这些贯穿着病痛的岁月中，美国总统为使他的国家进行战争努力，领导美国国内事务，进行旨在连任的总统竞选，试图使斯大林愿意接受最高级会谈。人们难以明白为什么布鲁恩和麦金太尔竟让一个病势如此严重的患者进行将其带至雅尔塔的这次可怕的旅行。

布鲁恩博士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英国医生哈罗尔德·希海恩发表了一个直言不讳的看法：“很明显，罗斯福总统处于疾病的晚期。我们看到一个垂死的人，大为惊讶，他本该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在他那样的健康状况下，冒雅尔塔之险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系罗斯福先生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对于责任的牺牲精神所致。”

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朗勋爵与这位英国首相寸步不离，每当有机会接近罗斯福总统时，他总是仔细观察他。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患者的书中，他没有隐瞒美国国家元首到达雅尔塔时给他留下的悲惨印象：

“在一个医生看来，总统像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势沉重的人。他有着脑动脉硬化的一切征候，而且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认

为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当人们不愿意看的时候就成了瞎子，这里美国人不能想像他们的总统已经完了。他女儿不认为他真的病了，罗斯·麦金太尔支持她。我们启程去雅尔塔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罗杰·李发自波士顿的一封信，他是美国医学院和美国医学协会的前主席，他说：'八个月前，罗斯福有过一次心脏关闭不全。'心脏充血当然有不同的程度，但罗斯福还有肝脏充血，还有呼吸困难。死后的检查肯定会表明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充血。"

罗斯福将会因动脉高血压引起大规模脑溢血而倒下。好几条血管同时破裂。一种这样规模的激变是不会没有前兆的。在罗斯福身上，前兆是存在的。许多见证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发现和分析这些征候是微妙的，在当时无疑也是困难的。这些征兆组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阿尔瓦兹莱兹病"。

沃尔特·克莱门特·阿尔瓦莱兹是一位医生，1884 年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弗兰西斯科。他研究了一系列细小但令人不安的征候，因为他注意到这些征候常常在发病前出现。他发挥了一种罕见的科学家、分析家、统计学家的才能，反复进行验证，最后确立了关于这些频繁发作和表现的实验程式。他的同行于 1966 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卓越观察。

在大脑中，血管里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微动脉瘤的破裂形成了病灶。在别处，人们知道这叫做小发作。这些突然的发作很微小，然而是实实在在的。它产生了大量的微小的脑坏死，即黑点一类的东西。大脑中任何部位均可受到打击。根据发病的位置不同，病人的某些机能可能受到干扰，某些感觉消失。病人因此发生供氧不足，

暂时贫血或血管痉挛，形成轻微眩晕，或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也会变坏。写字也会不清晰。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志模糊。因其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到某些人赞扬的人会突然变得内向孤僻。

心脏病医生在心电图中未发现任何可疑现象，神经科医生在电脑造影中也是如此。因为患者在两次微小的发作之间很快就恢复了受到障碍的能力。许多医生忽视了或不明白这些征候。在那些敏锐的医生中间，有些人由于不知道这种病的特点，而把这些发作称为“歇斯底里的表现”或“精神与身体障碍”。有些人就直说是感冒症状，因为这些微小的发作伴有轻微的热度。多数受害者是衰老的人，姑且可以称之为老年歇斯底里。像罗斯福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也是受害者之一。温斯顿·丘吉尔也是。据他的心脏医生米亚斯尼科夫说，约瑟夫·斯大林亦然。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瓦莱兹病是一个尖兵，常常预示着在或长或短的期限内将发生一次严重的中风。对于查阅了罗斯福的病历的神经科医生们来说，怀疑是存在的：患有阿尔瓦莱兹病的证据很多。

首先，总统的字体改变了。笔迹学并非像某些外行人想的那样，是一门根据写字了解一个人性格的艺术。许多神经科医生利用它来掌握患者身体衰弱的演变。他们从中可以看出衰弱的迹象，这在动脉高血压严重的情况下是常见的。在阿尔瓦莱兹博士之前，弗拉基米尔·高特利伯·埃利亚斯伯格，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德籍神经

精神病医生，就已经试验过这种分析方法了。1953 年，他想到观察和比较罗斯福总统在若干年内的笔迹。

“远在雅尔塔之前，”他说，“笔迹已经大变。它似乎像是帕金森病患者的笔迹，或者，它像大脑血液流通障碍患者的笔迹。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之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笔迹的变化没有逃过罗斯福夫人的眼睛。麦金太尔在她的追问下，不知如何解释，就否认明显的事实，但这并没有使国家元首夫人安心。

据罗斯福身边的人说，他本人也对这种表达他的思想的物质困难感到烦恼。有时，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使他要费很大力气，而不得不终于放弃，进行口授。然而，照麦金太尔海军少将看来，这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有谁能怪他的盲目呢？病人很少能自己估计自己的状况，要由他们的医生做出估计。罗斯福的病太严重了，不能再动员起必要的精神力量，不能像他在患脊髓灰质炎时那样非常成功地抵偿所发生的障碍了。

其他早期征候也表明阿尔瓦莱兹病越来越严重。他的这种病表现为脾气改变，嗜睡，智力混乱，记忆力减退，思想不连贯。而这些都始于 1943 年。莫朗勋爵报道说，在这一年于德黑兰举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中，美国国家元首已经不能积极地活动了：“在他应该集中精力的时候，他却变得奇怪地暴躁易怒。如果某件事情需要他三思的话，他就改变话题。他并且失眠了。”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补充说：“哈里·霍普金斯，由于本身

受到癌的侵袭，在德黑兰会议上，也不能对他的老板的衰弱做出客观的判断，他对他说：‘总统在会上是无能的，人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而他的回答很糟糕。’”

最后一种迹象说明，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阿尔瓦莱兹病经常发作。他神志模糊，多年的梦想缠绕着他，而且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些东西。他反复说，达到长久和平的惟一途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急忙把他的话传给教皇庇护十二世。美国和苏联将通过积极的参与使其具有可笑的国联所缺乏的权威，国联是他的遥远而不幸的前任威尔逊于 1919 年出于同样目的提出的。这一行动的宽宏却被一种仇视所破坏：“必须做到两点：粉碎结成联盟的德国和日本，阻止斯大林对希特勒可能向他提出单方面媾和的诱惑让步。”

这种对于政治和战略现实的错误判断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吃惊。因为，如果说希特勒希望在 1944 年有这样一种停战的话，他也将从西方盟国方面得到，以便将他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与红军的战斗中去。从 1941 年起，他就不隐瞒这一点了。他将真正的敌人放在东部。

神志模糊的第二种表现是，罗斯福加重了判断对手的错误，特别是对斯大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人格令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他甚至说人们可以完全相信他：“我相信，如果我给他我所说能给予的一切，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话，出

于礼貌，他将不会试图吞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为了使苏联元首同意他的看法，他自认已准备好多作让步。

“世界的瓜分将是很简单的，”他对斯佩尔曼大主教说：“远东归蒋介石，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因为有通往印度的航道。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他肯定会要求巴尔干国家、芬兰、比萨拉比亚、波兰的一部分。我跟他比跟丘吉尔合得来，丘吉尔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跟我一样。这样，在我们之间基于现实主义的彼此赞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为了这种幻觉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严厉地批评晚年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医生不了解政治内幕，但是了解精神混乱的原因。按照他们的看法，也许应该把罗斯福晚年所干的大部分蠢事看做是体力衰弱和难以控制自己思想的结果。当一种严重的疾病损坏了一个结实的机体时，人常常能战胜痛苦，增强自卫的能力。甚至有时候，当病痛过去后，他还能得到好处，好像病痛刺激了生命的本能，好像它还能造福于病人似的。当死亡的过程折磨一个疲惫不堪的病人的时候，情况却正相反，衰弱从此加速。

斯大林为了接待他的异想天开衰弱不堪的来访者，并不吝啬。他为他打开海岸上最漂亮的宫殿——利瓦吉亚宫，一个三层的大蛋糕，用金黄色的石头砌成，坐落在林木繁茂的花园之中，是神圣俄国

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夏季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每天举行一次全会，以减少使美国总统痛苦的移动。鉴于他的残疾，人们安排他住在一层，麦金太尔博士和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国家元首的房间两侧，而霍普金斯也是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家具笨重而结实，是向总后勤部借用的，由莫斯科运来。还有镶在涂了金色的粗笨画框中的巨画、铜灯、桔黄色的丝灯罩、布卡拉的地毯。三节车皮运来了16吨鱼子酱，其他车皮运来了战时俄国尚能生产的最好的菜肴和最丰富的烧酒。

斯大林住在两公里以外的科列兹别墅，陪着他的有警卫、厨师西达尔·基里洛维奇和饮料总管李维特，他让温斯顿·丘吉尔住在更远些的沃隆佐夫别墅，这就限制了英国人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将被迫从科列兹别墅的窗户下面经过。

当美国总统带着他的400人的随从、外交官、军人、顾问、贴身打字员、个人仆役，那些菲律宾人，在萨基机场降落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擦得锃亮。利瓦吉亚宫中的桃花心木护壁板和改做会议室的舞厅甚至打了蜡。

克里米亚会谈在政治上如何，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描绘过了。它确实产生了一个联合国组织，但不完全是罗斯福想的那样。它肢解了战败的纳粹德国，划定了盟军的占领区，规定了德国人赔款的数目，确定了战犯的命运。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南欧国家的边界也划定了。关于海峡和世界上其他水道的协议也签订了。作为对日宣战的交换，满洲铁路、萨哈林群岛、千岛群岛，通往远东的一些路口都向苏联开放，这将使它的影响波及亚洲的一部分。这

是一些搅乱政治地理的钥匙。

现在,人们知道了,在长达八天的交易中,罗斯福的病对会谈起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第一天的会谈只进行了2小时40分钟,但是在此之前,各代表团会商了5个钟头,以后每天如此。在那160分钟之间,斯大林在摊在他面前的纸上画狼,丘吉尔抽了大量雪茄。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时是热忱的,甚至是开朗的,但渐渐不支,竟至心不在焉。他只是在请两位大人物吃晚饭时才又活跃起来。大勺大勺的鱼子酱,新奥尔良式烤鸡、肉末、通心粉、罐头水果。干了12次杯。斯大林只喝他自己那瓶里的伏特加,实际上掺了大量的水。丘吉尔举杯祝愿"百年的和平",而罗斯福则祝愿"尊重小国的权利"。安慰人心的祝愿,此后的岁月证实了这一点。那天晚上11时,罗斯福去霍普金斯房中道了晚安,后者在会议开始后就离开了会场,躺到了床上,癌症使他很痛苦。随后,罗斯福穿着灰色套衫躺下了,嘴上叼着雪茄,手里拿着本侦探小说,他也朦胧睡去。"一个生病的老人!"温斯顿一回到沃隆佐夫别墅就喊道。而他却长罗斯福八岁。

第二天,开了3小时45分钟的会,英国首相证实了他昨夜的看法。三个巨人,顾问,总共20人围坐桌旁,不是在会谈,他们好像在断断续续地闲聊。主持讨论的罗斯福过于随便,过于冷漠。"简直是随随便便!"丘吉尔嘟囔着,越来越恼火。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2月11日。通常是注意力集中一个小时后,罗斯福就不行了。他的思路就分散了,一阵阵的分心使他糊里糊涂。而斯大林却是聚精会神。他在混乱中找到了掩盖着僵局和可以预见的困难的

道路。那一天，他们在雅尔塔决定德国未来的命运，军事占领，赔款数目及其首领的命运。

次日开第三次全会时，罗斯福总统好像休息过来了。壁炉里的木柴熊熊燃烧，烤得背上暖烘烘的。罗斯福的眼睛在单眼镜后面闪动着，他开始说话了。他曾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与他一起决定了波兰及波兰边界问题的策略，特别是关于他如何设想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然而，轻松很快即告瓦解。斯大林抵抗着，口气越来越强硬。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声音冷淡，低垂着眼睛，视罗斯福的梦想为乌托邦，他更喜欢一种三国之间的坚实的同盟，以便在将来避免一切重大冲突。他明确拒绝重新考虑他对波兰一事的立场。晚上，罗斯福总统和女儿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感到不适。动脉血压上升到300/170，情况不妙，需要紧急护理。麦金太尔忙起来了。无论怎样按摩，乔治·福克斯也不能使患者的肌肉松弛下来。利瓦吉亚宫中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

斯大林是个变换手法的专家，既是外交家，更是战略家。他冷一阵之后又热一阵，第四次会议一开始，他就使罗斯福总统喜出望外。他考虑过了。他大体上接受罗斯福关于未来联合国的建议。接着就讨论了五个小时。罗斯福开始时还轻松，像个会谈中的美国总统，接着，精神开始涣散，麻木，表现出不可解释的冷漠。丘吉尔甚至注意到罗斯福有好几次打瞌睡。他递给他文件，而这位美国人并不看。英国人发怒了。晚上，他对他的医生莫朗说了。但是，他弄错了这些迹象的性质。他不知道这些迹象说明罗斯福已被疾病压垮了。

第五天是克米亚会议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苏联同意对衰弱不堪的日本宣战。罗斯福想爱惜美国人的生命,坚持加强对日本列岛的轰炸。他希望美国飞机的起飞基地设在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届时苏联军队要保证对日本列岛的清理,参加战斗。作为交换,他准备就苏联人对亚洲的野心进行谈判,斯大林长期以来就渴望打进这个地方。全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交易在罗斯福的办公室里秘密达成,而丘吉尔并未被召去。两个国家元首身边只有四个人:罗斯福有艾夫莱尔·哈里曼和波伦,斯大林有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30分钟以后,正式会议开始。丘吉尔心情苦涩,他感到了大不列颠从此只是个二流强国,世界的控制权已经易手,而罗斯福却神采焕发。快乐使他变了一副模样。星期四这一天,尽管连续开了四小时会,血压还在升高,美国总统坐在绿色的桌毯前没有瞌睡。联合国的组织确定了,波兰的命运决定了。东欧的命运亦如法炮制。

主要的会议结束后一小时,斯大林向两位客人和两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打开了科列兹别墅。一声铃响,21点了。厨师科里乌其科夫使出浑身解数。他预备上20道菜。一次王家气魄的宴会。大量的灰鱼子酱,桌上摆满汤和肉,腌鱼、熏鱼、水果、伏特加、白兰地、又甜又酸的香槟。干杯达45次!凌晨1点钟,罗斯福面色苍白,筋疲力尽,请求告辞。这样才结束了这次惊人的晚宴。

2月8日夜里的这次放浪的宴会,无疑是罗斯福参加而终席的最后一次宴会。有些人认为,这种放纵无论如何也加速不了那不可避免的后果,据他们看,还不如说死亡的过程早已开始。

2月9日,没有活动,只是拍了一小部影片,拍了几张正式的照

片。10日，罗斯福疲惫不堪，形容憔悴，目光呆滞，说要回美国了。“他准备撒手了！”丘吉尔十分恼怒，他始终看不到生理上的衰竭已吞噬了美国总统。11日是星期天，最后一次全会定于中午举行，以最后确定文件。在此之前，罗斯福乘坐特别的吉普车在利瓦吉亚宫前面的花园兜风。这时，他显得焦躁不安，什么事情都使他激动、生气。他感到末日来临了。秘书们准备好公报让他签字，三巨头于12点50分走到桌前。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道了别。斯大林为客人准备了礼物。“还是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熏鲑鱼、鲱鱼、黄油、柑子、橘子。”孔特说：“罗斯福送给他黄香烟、巧克力、电动刮胡刀、罐头果汁。”还有送给红军英雄的一大把美国勋章。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苏联国家元首留在科列兹别墅里。第二天，他乘火车离开了克里米亚。温斯顿·丘吉尔得等着罗斯福，他们要从公路去塞瓦斯托波尔港。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的友谊没有抵抗住八天会议的烈火，他冷冷地告别了罗斯福，扔下他，自己上了英国轮船“弗兰克尼亚”号，驶往英国。

在出发的混乱之中，在随从的匆匆行色之中，罗斯福意识到了英国首相的失望吗？他还能注意到什么东西吗？他现在是随波逐流。警卫米克·雷利把他抱上车，麦金太尔博士和女儿波廷格夫人已在上面了。在塞瓦斯托波尔，人们把他升上旗舰凯考克丁号，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就靠这艘旗舰与白宫保持联系。舰长C.O.孔博全身披挂，举行了一次美国式的晚宴。他使得舰上出现了一点家乡的气氛。但是，罗斯福像一只瘦鸟一样地摇着头，对这些敬意和

关切一无所感。黑海舰队的乐队接到斯大林的命令，他的女儿和麦金太尔上了岸。罗斯福受不了喧闹。他疲惫不堪，为疾病压倒，躲进了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舱房里。

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用尽全身之力呼唤的和平了。为了它，他一直来到这遥远的俄国土地。他将不能完全衡量他在这块土地上送给或丢给斯大林的东西的重要性。他也听不到第三帝国最后堡垒崩溃的声音了。六十天之后，在美国东海岸最美的州之一佐治亚州的热泉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响了。他的脑中突然发生破裂，而世界失去了平衡。

2.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沃伦·哈定

若望·德·拉封丹说:"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

风趣的寓言家善于观察,知道文字的确切价值。形象的影射,特别是动物形象的影射,以及委婉的说法,使他避免每次都有进巴士底狱的危险,他讲述了路易十四的绝对君权的暴虐,贵族,法院,第三等级,僧侣在地方上的滥用职权,他们在君主的卵翼下一起表现了 17 世纪的"生活的快乐"。这是被压榨的平民所相信的东西。

今天,公开谈论大人物的行为比先前受到了更多的容忍,虽然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国家内这依然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群众囿于千百年来的影响,不肯看到他们沉湎其中的神话破灭,这些神话帮助他们消除了自家的烦恼。例如,谁会成功地揭破善良的阿尔贝·施韦泽大夫的真相呢?

他在加蓬的密林中用他带给黑人的可憎医术掩盖着自己的神经衰弱。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44 年,然后在雅尔塔是个病人吗?胡说八道!有些人说。而他们也有道理。人人死于疾病。在西方,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脑溢血,其余死于癌症、肝硬化和肝炎,或死于车祸。一个国家元首这样死去有什么奇怪的呢?衰弱本身,产生于细胞的消耗,不是在疾病的形式下给生命带来自然的终结吗?

姑且同意这种论证吧。然而,罗斯福在他逝世前几个月中所经受的折磨却不能与打击一个老百姓的同样不幸相提并论。他拖着不久于世的病体,去克里米亚谈判半个世界的命运,当一位像他这样刚强的国家元首去世的时候,是他所代表的千百万人承担着以他们的名义所冒的风险,但事先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至少还可补充一点,在罗斯福不能真正控制他的思想的时刻里,他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随从也犯了错误:美国人民不知道他们那时已经没有掌舵的船长了。

还有一些利他主义者,罗斯福的责任有损于他的威望而使他们感到痛心。这种人为数众多,对他们来说,罗斯福始终是一位仁慈的总统,他为把欧洲从德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使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幅画很美,然而只对天真的人们才是好的。谁会出于仁慈而打仗呢?国家元首们打仗仅仅是出于必要。是必要性使罗斯福不得不作出这个严重的决定。日本奇袭珍珠港,摧毁那里的美国舰队之后,将要蚕食美国在太平洋的所有基地。而德国正在准备火箭,核分裂,美国的学者并非对这些毫无所知。美国,像地球上的

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是交战国与否，也感到受着威胁。这两个理由，经济的和政治的理由，说明了参战的必要。如果说美国总统在不得不介入冲突的时候还保持着清醒，却由于1945年2月笼罩着他的判断的疾病而不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了。事实上，他由于在雅尔塔接受的协议而打开了一条使战争几乎在世界各地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发生的道路。

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非没有受到警告。另一位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他之前，在类似的情况下，经历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肉体痛苦。他由于疾病也干了同样的蠢事。这种故事，周而复始，只是说说而已，并非为了证明什么，因为这不是一种科学。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会议将于次日在这里召开，持续167天，他想要什么呢？和平。他来保证人类的幸福。他对此有一个方案。

巴黎还沉浸在欢乐之中，1918年11月11日签订的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战斗的协定产生了巨大的宽慰。到处都在跳舞。生活又重新喧闹起来。协约国的士兵们，德国人的战胜者，“这些刚刚证实了正义和善的力量的十字军兵士们”——这是威尔逊的话——友好地加入了欢乐的人群，被当做英雄受到祝贺。穿着夹克、带条纹的长裤，戴着高顶黑帽的欧洲外交官也比比皆是。人人都想看见和接近美国总统。他却令人吃惊，令人失望。他常常手足无措。有时他很不安，仿佛精疲力竭身体垮了一样。法国内阁总理乔治·克雷孟梭私下讽刺说，“他自以为是耶稣——基督第二，来到

人间普渡众生。”

恶毒而廉价的攻击。伍德罗·威尔逊并不掩饰他的神秘主义。他是清教徒，性格刻板，对自己的原则寸步不让，民主党因此才在1910年选他做新泽西州州长。他于1912年成为美国总统。政治上确是飞黄腾达。他的纲领很简单，但他坚持到底。在国内政策方面，保护公共利益，反对工业和金融的勾结，通过改革关税制度降低生活费用。在对外政治方面，威尔逊的信条更简单：中立。这使他于1916年再度当选。他痛恨争斗，厌恶战争。他毕生没打过人，哪怕童年时也没有。他尤其憎恨潜水艇。“叛徒的武器”，他说，“因为它不露面地进行攻击。”神话制造者们说，他使他的同胞们于1917年4月6日参战，是因为他使他们相信德国人于1917年1月31日宣布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这是传说，实际情况是更为平淡的。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次可怕的冲突使欧洲大伤元气，德国和法国尤甚。威尔逊带着一个十四点的和平计划来到巴黎，这计划应该产生他梦寐以求的国际联盟，人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这项计划：防止冲突，消弭战争，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他的作品，他的副手豪斯上校只是拟定了细节。

但是，在巴黎和会的交易过程中，协约国集团，他的朋友们，变成了一个充满敌人的营垒。他在里耶卡的问题上得罪了意大利，这是个原属威尼斯的自由港，南斯拉夫声称属于它而未果。他冷了法国人的心，因为不理解他们的安全问题。他使大不列颠帝国不快，因为他顽固地要求一切服从他的国际联盟。当时，在欧洲，人们不

知道拿他的关于文明的救世主义怎么办。他对旨在防止战败国报复战胜国挑衅而进行的边界谈判先是恼火继而发怒。人们对他奇怪的苦恼开始还不露声色，接着就公开表示惊讶，他的神经不坚强，有时莫名其妙地哭泣。他表现出精神混乱的迹象。记忆上的混乱使他的演说时时中断。他常常心不在焉，让豪斯上校来代替他，几个钟头之后，他又回来打乱他的副手的工作，随后再次消失。误会越来越严重。在美国，人们也无所适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要签订一项单独的和约。舆论多数否定了威尔逊的创议。

美国不参加国联，国联变成了清谈馆，因缺乏执行它的惩罚的物质手段而信誉扫地。意大利法西斯侵占埃塞俄比亚，而国联无能为力。德国重新占领莱茵河左岸，国联亦未能加以反对。对待西班牙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它同样没有反对。德国侵占波兰，它视而不见。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富有人道精神的专家、心理分析之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试图理解伍德罗·威尔逊。他探索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障碍，病态的顽固和促使他在盟友面前让步的接二连三的软弱，这一切使他的旨在缔造千百年和平的事业走了样。这是天才的奥地利医生对一位国家元首的惟一观察。

弗洛伊德的头脑中总是萦绕着儿童对于父母的关系的分析，这是任何一个人性格构成的主要成分。他首先注意到威尔逊是多么爱他的父亲，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爱他，尊敬他，欣赏他。40 多

年中，他从未不征求他的意见而作出过任何一项重要决定。这是一种暧昧的固恋，因为他并不具备与父亲相像的外表。他父亲高大，漂亮健壮，在学业上是成功的。威尔逊却瘦削，体弱，在小学时又懒又笨，而后是个平庸的中学生，他从未摆脱过父亲的控制。当父亲布道的时候，他就在儿子眼中变成了上帝的选民的首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只有姐妹，因此自然地自视为独生子和这位上帝的宠儿。一句话，是耶稣。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这种不自觉地将自己看做人类救星的偏向对美国影响很大。

威尔逊受到母亲的溺爱，直到少年时代，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她。她宠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和对丈夫一样的虔诚。这使他后来找了一个各方面都与她相像的妻子。这些特点表明，他一直与女人或低于他的人为伍，拒绝一切与智力高超的男人的友谊关系，因为他不能"消除他的恋母情结"那种所有正常儿童对父亲必有的不可避免和合乎愿望的敌意。

弗洛伊德指出这些事实如何影响了威尔逊的政治行动。他说："既然是上帝通过他来行动，那么不论他做什么，都是善的。他有时承认他可能弄错了，但他从未有过错误。他的'超我'不允许。他不愿承认这些事实，更愿意忘掉或歪曲事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制造想像的事实，以与他的动机的要求相符合。"

这种行为使他终止了开始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律师职业。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律，于 1902 年当了这个学校的校长。他以一番说教开始他的任职："今天，如果基督处于我们的位置，有着我们这样的机会，他会怎样做?"但是，他还在其中加进去对许多管

理人员的仇恨,以至于为了一些有关个人自尊心的争吵而危及学校的财政。他投身政治,于1912年11月5日被选为总统,他用这样的话来感谢为他组织竞选运动的人:“你们对我的选举做得少或多都关系不大。你们记住,是上帝愿意我当总统,你们或另外什么凡人都阻止不了。”他这时已经感到厌倦,经常看病。他带着一个胃导管,吸出胃中的酸性分泌物。他为慢性的抑郁症所苦。

“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弗洛伊德结论道,“对于奠定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神经官能症是个很不稳固的基础。他的缺点的特点使他掌了权,但是,他的特点的缺点最终不是造就了一个伟人,而是造就了一个失败者。”

弗洛伊德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争论。乔舒亚·霍夫斯的研究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而美国纽约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埃德温·A·温斯坦教授,由于他能够接触官方材料,提供了一些细节,对扰乱威尔逊人格和行为的障碍做出了临床的解释,而不必求助于心理分析的靠不住的解释。他认为是脑血管的长期疾病逐渐压垮了总统。

1896年,威尔逊40岁,就已经表现出这种病的初期症状。实际上,他患了大脑衰退症,表现为右侧肌肉软弱,感到手指不灵,写字困难。在他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时候,这种病就发作过好几次。他没有去找医生,自己作了诊断:“我得了神经炎,写字时抽筋。”他的妻子很不安,他只对她说他的痔疮又犯了。他学习用左手写字。他甚至像左撇子一样地打高尔夫球,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1906年,他的左眼失明。这是由于一块结石堵塞了眼中央动脉,或是由于颈动脉受到损伤,那时候还不能作出诊断。乔治·

德·史威尼茨应召前去会诊，怀疑是普遍性的动脉障碍。他发现患者血压偏高，建议完全休息。威尔逊太太害怕是早衰。

两年之后，威尔逊还是感到右手软弱。自那以后，好几位医生的临床观察都被有意地销毁了。但是费城的艾德沃兹·S·小吉福德博士证实，这个时期未来的总统"动脉压力很强，眼底呈现出高血压动脉病变：动脉硬化，动脉痉挛，渗出性视网膜出血"。这与动脉高血压最严重的程度相符。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身政治，并取得了胜利。他的左右指出了他行为中的变化。他变得更易怒，更冲动，更咄咄逼人了。在白宫中，格莱森博士没有看到这些迹象，于1913年宣布说，新总统健康状况良好。30年后，罗斯福的医生麦金太尔海军少将的做法同他如出一辙。

1915年，威尔逊说他头痛，视力模糊。他变得更加烦躁。然而，他并未诉诸有名的专家，这种人在美国并不缺少，却找了一个海军的年轻医生跟在左右，此人与总统家庭有故，失去了医生的客观性，他也没有看出越来越严重的阿尔瓦莱兹病的征候，此病终于在1918年发作。

1919年4月3日，正当巴黎和会开会期间，威尔逊感到肠道剧痛，尿时有血，左腿和左脸不可抑制地抽动。他立即卧床。他的行为不合理性。他指责法国人企图毒死他。他躺在床上，禁止他的代表团的成员使用汽车。举目所见，谍影憧憧。这些不适都表现出一种阿尔瓦莱兹型的血栓业已形成。不过，跟随他的年轻医生没有诊治出来。随后就决定回华盛顿。

1919年8月22日，在白宫宽大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一阵新的头痛击倒了总统。他的情况更严重了。三天之后的凌晨，威尔逊感到脑子里像被撕裂了一样。左脸不能动，瘫痪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脑袋里又是一阵爆炸，又一次发作，也就是说，脑或颈动脉中形成血栓。左臂和左腿不能动了。9月28日，悲剧发生。大脑受到大规模侵袭，总统一蹶不振。首先，他失去了言语能力，紧接着是突然的心脏代偿失调，就是心跳紊乱，伴有呼吸困难，迫使病人长时间地坐在床上，苟延残喘。人们不能和总统说话了。形势严重。参议院正在辩论美国是否参加国际联盟。

白宫里一片惊慌。但是，恐惧被制止了，以防扩散到外面去。格莱森博士急忙采取措施，限制接二连三的发作所产生的后果，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可想像的情况：威尔逊夫人执掌国政，由她与部长们接触。她要求严守秘密。她使他们相信，“威尔逊总统辞职将对国家产生不良后果，还会对他的健康产生反响。”在这对于世界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刻里，美国这艘船失去了指挥，摇摆不定。

几天以后，威尔逊能站起来了，但还不能走出房间。他困难地绕床行走，很快就感到疲倦，几乎不能说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否认自己有病。“我脑子没什么！”他咕哝道。他自己也相信，因为他正认真地考虑第二次连任。跟他一样，他妻子也否认明显的事实。对左右的人，她经常举出路易·巴斯德的例子，说他在经历过一次脑血栓之后，还做出过几项发现。她的亲爱的伍德罗完全可以第三次出现在他的选民面前，他不过有点些微的不适，至多是一次警告罢了。

这对夫妇的麻木使外交部长罗伯特·兰辛大为惊讶，他在巴黎和会上已经没法减轻美国总统的糊涂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一次，他要发出警告了。其结果是他被罢官，永远得不到原谅。

在瞠目结舌的参议员们面前，他透露说总统的病比白宫中人们保证的要严重得多。他甚至怀疑威尔逊能真正担负起美国总统的职责。于是，在威尔逊的对手和支持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前者以国家理性的名义提出抗议。后者反驳说，任何人无权损害个人的生命。最后，任命了一个调查组，负责调查总统的健康，要求接见。顺便指出：被选出的代表中没有一位是医生。

威尔逊太太很不乐意地同意了让她的丈夫接受调查。她甚至想尽办法欺骗参议员们。他们分别被接见，每次会见的时间极短，仅几秒钟，最多半分钟。著名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很快摆上了一个沙发。威尔逊躺在上面，摆出一副懒洋洋的姿势。他把完全瘫痪的左臂藏在一只垫子下面。一位助手事先小声地告诉他来者的姓名，使他可以在他们进门时叫出他们的父名。总统的口吻傲慢而厌烦。果然不虚此举：这还是 1912 年的威尔逊，头脑清晰，思想奇特。没有一个参议员发现这是个骗局。

过了三天，总统才从这一次劳顿中恢复过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病人，他领导着美国。

尽管如此，他还是违背了妻子的意愿，没有参加 1920 年 11 月的总统选举。这一年的春天，疾病的严重连外行人都看得出来，真得承认，总统不行了。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组织者们被总统的身体状况吓坏了。打算选一名替换的领袖，参议员考克斯。

共和党人中，一个对手已在进行竞选活动，那是参议员沃伦·哈定。他早先是个排字工人，后来当了记者，取得了成功。当然，他的交往有些暧昧。人家说他与“空头银行家”，一伙靠损害集体发财的强盗有联系。不过，他一直是威尔逊政策的狂热反对者。他说，他下定决心，不使美国陷入欧洲事务太深。这个立场正好与1920年美国的多数舆论相符合。哈定的竞选论据抓得准。再说，与威尔逊相比，他的身体令人放心。他膀大腰圆，胃口极好。

威尔逊缩进华盛顿的一座豪华别墅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哈定于1920年11月2日当选。对他来说，那个冬季是严寒的。从这一天开始，他一病不起。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国家没有参加他那么热心筹备的国联。

偶然性还是给了他一个好报复的机会，尽管他已不能享受了，因为人们出于身体的考虑而选择的哈定也是有病的。他像他一样患有动脉硬化。

米恩斯先生和拉塞尔先生，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传记作家，关于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写了两本详细的著作。他们描绘的肖像是一致的：哈定总统当选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大病在身。除了他的亲信之外，无人知晓疾病的性质。他们都知道他的眩晕，他的“感冒”的原因，那些使他中断演说和旅行的不适的原因。他的血压经常高。可是他对危险显得不在乎。根据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他愉快地享受生活”。他以放纵来自杀。

在美国总统的伟人祠中，哈定没有打上优良的印记。他统治的时期带有大吵大闹的特点。他的私人关系和合作者都没有选好。

他们中间有许多惟利是图的人。内政部长艾尔伯特·B·福尔从联邦政府借给几家石油公司的准备金中谋取个人好处，他在这些石油公司中有股份。他后来因此吃了官司。其他一些官员因为类似的事情而不断成为调查和起诉的对象。哈定的智力由于动脉硬化而蒙受损害，他无力控制或清除不清不白的左右，便躲避他们，到美国各地去旅行。

1923 年 8 月，他死于圣弗兰西斯科，时年 58 岁，两年的统治平庸，多事，一句话，声名狼藉。死因是大脑出血和心肌梗塞同时发作，造成器质性的大破坏。副总统加尔文·柯立芝，佛蒙特州人，成为美国的第 30 任总统。

在华盛顿，第 28 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67 岁，在这段明确了他即将走出历史的可笑尾声中，已听不见，看不见了。一年后的 1924 年，一次大规模的脑震荡结束了他的生命。事实上，当美国遗弃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不过，他还梦想着给人类带来幸福和永久的和平。在他的头脑中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卡住了一切。在他被众人推开的同时，他感到被他毕生忠于的上帝抛弃了。一架钟没有钟表匠是不能存在的。

3.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一丛灌木掩不住两只红颏鸟，同样，鹰也不能容忍另一只鹰接近自己的巢。长有竖琴一样的双角的非洲羚羊痛抵进入40平方米范围内的同类动物，在这块场地上，母羚羊一给小羊断奶就来寻求配偶。这些习性人所共知。人类学家明确指出，哺乳动物或鸟类不仅这样保卫它们的领土和领空，而且首先要肯定它们的统治权。

统治—被统治，这种关系与生命一样古老。人类能置身于这种关系之外吗？人类为什么要逃避这种冲动呢？行为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都证明恰恰相反。到处是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指挥和管理。被统治者则认可，屈服，被人家强迫他们过的那种磨人的生活弄得面目全非，无所凭依，任人摆布和斥责，在互相接触中磨去棱角，像被激流冲得滚来滚去的卵石。

在动物之间，力量足以保证统治权，与此相反，有权的人为了让人服从却不一定需要鼓鼓囊囊的肌肉。罗斯福坐在瘫痪人的轮椅

中做到了这一点。威尔逊的手腕和胳膊形同妇人。智力和顽强，诡计和一个能含辛茹苦、吞下带刺的鱼的强壮的胃更加重要。

统治权生而有之吗？如果它指的是一种包含在遗传之中的天赋，而非一种精神倾向的话，这是明显的。显而易见，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充斥着高的和矮的、强的和弱的、漂亮的和不那么漂亮的孩子，尽管他们年龄相仿，仅差几个星期。在孩子堆里，人们分得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者唱，而前者定调。平等是一种欺骗，不惟“平等的机会”，那是诡计多端的政客们的口头禅，甚至在细胞组成上的基本平等也是一种欺骗。

当然，统治者的影响必须成熟，壮大，直至顶峰。这个过程是无情的。对于那些偶然上去的人来说，别指望有什么东西可助一臂之力。不专心致志的人要倒霉，因为位置的代价很高。有时，权力姗姗来迟，仿佛一枚人们不再等待或不再想吃的果子，起码思想上如此。此时，咬上一口，胃口全无。眼睁睁地看到嘴巴离开了果子，这是一种痛苦。美国将军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体验过这种失望。

人们说，美国喜欢反常的事物，并具有过度感。的确，它的公民中有许多人可以厕身于世界头等富翁之中，但是，也有西方世界最贫穷的人，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废弃的矿山附近破败不堪的木板房里。它是世界上惟一的国家，在宪法中写进一项高尚的权利，即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贫民窟中，生活十分艰难，许多儿童打破了吸毒的记录。它很愿意穿上一件不拘陈规的外衣，却精心打扮和粉饰它的死人，以便他们以最好的容颜进入虚无。它有一个英雄，满

载荣誉，处于军事荣耀的顶峰。它让他当了它的第34任总统，在许多人考虑退休的年龄上又赋予他新的生命。我们承认，他并不是心情愉快地接受这一重任的，至少第一次是这样。

还在他担任北大西洋公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时候，他的左右就常听他说："任何人只要想当总统，就没有资格受到重任。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向往这样一个职位：非强加于他不可。"他们强加于他了。只此一次。随后，他的理智崩溃了。

1952年，当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卷起铺盖卷儿，美国把白宫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他已经62岁了。这个年龄进入政界太晚了。他的看法似乎还不那么坚定。他说："名称有什么关系，我在这儿不过是出于职责。"人家强迫他，有事实为证。八个月之前，当竞选机器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初选时，他还在马恩-拉-高盖特[①]，守在他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门口。他甚至没有正式提出当候选人，但是他的名字统一了人们。民主党人呼唤他当领袖，共和党人也要他。他之所以决定参加后者，只不过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投共和党的票罢了。

一个如此缺乏理性的人领导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足以使人感到迷惑。众所周知，他喜欢钓鱼，打高尔夫球，星期天作画，搞搞种植，因为他在葛底斯堡有一小块土地。讽刺之声鹊起。"平庸到了极点"，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怒道，他是个大炮，自己梦想着统治，点燃原子弹以便与他的榜样宙斯并列。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将军夏尔·

---

① 巴黎西南的一个小镇。

戴高乐语气更温和，但同样尖刻："他不是干这种日常政治事务的料，尤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选择他的共和党人认为他有足够的优点来对付当时的困难。他有大象一样的耐心，倾向于不声不响地采取行动，天生爱好妥协。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这种调和感，这种对人的尊重，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爱惜人命的将军。他从孩子直到进入西点军校，他的母亲一直对他重复《圣经》中的一句话："以剑为生者死于剑。"他虽无政治教条，但有一个信念："我从未诽谤过一个人。我绝不试图破坏某人的名誉，不管我们的分歧如何。我把这个作为我的信条。"

替艾森豪威尔搞竞选运动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说，美国的确想喘一口气。国际形势紧张，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朝鲜战争方酣，联合国军与中国对峙。印度支那对法国发起无情的战斗，法兰西殖民王国摇摇欲坠。在中国本土，毛泽东赶走蒋介石，后者退到台湾。北美的商业领地南美，也开始动荡。对于特殊的盟友英国来说，古老的印度之路永远被切断。在欧洲，冷战继续，苏联和西方集团之间进行着危险的挑逗。

在美国国内，事情并不更妙。民主党政府，罗斯福配上杜鲁门，经过连续 20 年的统治，留下大量未偿付的发票。发展军事力量和核力量引起的债务四倍于岁入。银行储备消耗殆尽。观点极端希望加剧朝鲜战争的麦克阿瑟虽被排除，但一个同样激烈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在大张旗鼓地攻击所谓共产党。他的反共的电视广播令人难堪，已开始使全国不安。谢尔曼·亚当斯说，需

要一个救火员来控制这场大火，以防演变成慢燃不熄的炭火。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天生的组织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工作能力，干起活来很快，而且还能学习，他接受了打赌。最初，他的治理颇见成效。他解决了朝鲜战争，控制了麦克阿瑟，制服了麦卡锡，但他并未与他们正面冲突。1953 年，约瑟夫·斯大林的死讯一经宣布，他就提出一项计划，建议中止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要求并使得苏联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切领域中作出明确的表示。他改善了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改善了美国和西欧的关系。

为了缓和他的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又不抛弃台湾，他在一生中最有成果的演说的结尾，提出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第七舰队。他向全世界发出和平的信息，主张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裁军和对原子能实行国际监督。这个号召在印度支那立即被译成八种语言，使东方流下了宽慰的泪水。温斯顿·丘吉尔在发给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的个人信件中赞扬了这一良好开端。

“人们不知道，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历来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一次。”谢尔曼·亚当斯说。“总统中断了在奥古斯塔的短期休假，返回华盛顿，撰写演说稿。4 月 16 日早晨，他到了白宫，他感到肚子剧烈疼痛，疼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在电视摄影机前，他面色苍白，形容大变，紧紧地抓住桌子才能说话。我以为他挺不到底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竭力宣读，讲稿上的字在他眼前跳动不已。不过，他好歹念完了。”

1953 年，这种痛苦还不能反映出由于执政而产生的消耗，它说明艾森豪威尔患有克劳恩病，大肠内壁粘膜大量增厚。这种病又名

回肠炎，可以蔓延至整个结肠和直肠，最经常的是发病于某一段或中间隔有健康部分的某两段。有时发病的部分厚度增大，直至堵塞肠道，也就是形成某种梗阻。有可能演变为癌，但这种情况很少。惟一的治疗办法是外科手术，切除发病部分。1953 年，艾森豪威尔的病刚刚诊断出来，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必动手术。

但是，30 个月以后，白宫中繁重的政务使总统开始感到其他更为严重的不适，这是高血压的后果。他早就知道他的动脉在变硬，动脉硬化在威胁着他。直到 1945 年，他还不大注意饮食，也不爱惜肺部，也不特别注意血管。他每天抽两包以上的香烟。剧烈的头痛，眩晕，引起了医生的注意。他取消了香烟，减轻了饮食，他以为可以控制疾病的扩大。在政界人物面前抑制住了种种反应，他忘记了担任国家元首的劳累以及大量肾上腺素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病暗中发展着。1955 年夏，血压突然升高，引起了霍沃·斯奈德将军的注意，他是总统的医生和朋友。

医学并非不知道，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脏危机或脑血管事故会出人意料地发作，并且很少是在受到威胁的病人付出巨大努力的时候，也不是在他感到了那种窒息他的器官的巨大疲劳的时候，而总是，比方说，在假期中神经松弛的时候。至少有一半是这种情况。在夜里睡眠正酣时，尤其是在睡下后不久。在被称为“慢波睡眠”的恢复阶段，“快波睡眠”，或称“反常睡眠”，是做梦的睡眠，周期性地中断“慢波睡眠”。在慢波睡眠中，心脏的节奏发生变化。动脉中的血的压力不稳，时而减低，时而突然升高。正是这种动荡，还有血液组成突然发生变化，在冠状动脉中形成凝块，导致心肌梗死。

1955年9月25日，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度假的最后一天，他打了27洞高尔夫球，并未感到疲倦，还在他和妻子居住的劳里空军基地附近的一条河里垂钓很长时间。这天晚上，他感到消化不良，还以为是由于中午吃了生洋葱。10点钟，他回到卧室，很快就睡着了。四个钟头以后，他叫醒了睡在旁边屋子里的妻子。他感到胸部很疼。艾森豪威尔夫人以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让他喝了牛奶和氧化镁，但她还是叫来了斯奈德博士。45分钟之后，诊断作出了：心肌梗塞。人们给总统打了吗啡，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往最近的菲茨西蒙斯医院。路上没有随从，只出动了一辆汽车，免得引起恐慌。艾森豪威尔穿着睡衣，外面只披了一条浴巾。斯奈德博士一个人扶着总统，直到匆匆为他准备的房间。一名护士也没有叫。

采取这样的措施，斯奈德博士的意图很明确：掩盖冠状动脉的毛病，让人们以为是一次"感冒"，那种国家元首通常十分喜爱的"感冒"。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确与他的那些前任不同，他执意要把他的病情公布于众。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久病致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年轻教官，他跟同事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不让公众知道一个不能再担负领导国家使命的人的真实情况。依他之见，民众应该有权随时准确地知道总统的健康情况，不管这种健康状况如何。他那时想像不到他也会感到与威尔逊一样严重的虚弱。他如果知道，倒也并不会改变他的决定。他不是一经获悉，就立即批准了国会最近提出的，旨在限制再有像罗斯福那样衰弱的候选人无

限期地赖在总统位置上的宪法修正案吗？从此，任何人担任最高职位都不能过超过两次。

他忠于他的立场，一定要保尔·达德利·怀特博士，一位应斯奈德博士之请来帮忙的波士顿的心脏病医生，毫无隐瞒地向全国告知他的情况。“讲真实情况，全部的真实情况，不要试图隐瞒任何东西。”他的话照办了。没有一份关于一位国家元首的医疗通报能比这个更真实更详细了。他满意地向怀特博士指出了这一点，后者回答说：“对于公众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医生们会明白的。”

在他离开白宫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总统用了整整一章谈到他的心脏病，其中的几点补充说明反映出一个病人可能何等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这也许是因为他部分地丧失了形象——回忆，这是阿尔瓦莱兹病轻微发作之后大脑枕叶受损害时产生的，与梗塞同时发生：

“当我回想起我第一次患重病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只能庆幸许多事情，而其中并非最不足道的一件是，我不能再创造一个更好的时刻来发作心脏病。经济蓬勃发展，国会没有开会。我可以同我的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就国际问题采取行动，而当时世界上并无燃眉之急。我因此可以不必每日听取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赞成或否定国会通过的法案，以及向国会提出建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没有被要求作出必须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决定。肯定，如果形势危急(例如，测出敌方轰炸机入侵)，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使用美国的镇压力量，我可以在发病 48 小时之后独自判断和行动。

但是，如果出现一种类似 1958 年我下令出兵黎巴嫩那样的局势，在我发病的第一个星期内，精神的集中，论据的权衡，最终的决定，就会成为重负，而医生大概认为，对于一个刚刚患上心脏病的人来说，这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事情还是它本来的那副样子，我可以靠一段平静的时期，保持头脑清醒，与政府的成员商量长期的事务，令人满意地恢复了健康。"

所有有机会治疗心肌梗塞的医生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于心肌梗塞 48 小时之后对于决定美国参战能够"独自判断和行动"而不征询任何人，未免过于狂妄了。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的判断是多么首尾不一。让我们看看上面说的那一段吧：据他说，他发病两天后，能够决定一场世界大战，但他在发病的第一个星期内，他却退而决定一场 1958 年黎巴嫩那样小规模的战事，可怕。在事实的估计上，这种不成比例不说是过分，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真是想入非非。回想起来，令人脊背发凉。

从 1955 年 9 月开始，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说，事情几乎没有好转过。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并且是迅速地恶化。

1956 年 7 月 7 日夜里，斯奈德博士被紧急召往白宫。总统在三楼的私人房间里疼得打滚。还是肚子疼，克劳恩病。前一天，他在总统府设宴招待摄影记者。他遵守饮食规定，只喝了两杯威士忌。然而，这一次发生了肠梗阻。斯奈德博士犹豫不决，第二天下午才决定送他到沃特·里德医院。外科医生感到难办。心脏检查可疑。如果"老头儿"，他的助手们这样亲热地叫他，死在手术台上呢？梗阻加剧，患者脱离危险的机会减少：一比六。手术不能延宕了。手

术将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哪怕以后再第二次手术。果然，1967年必须做第二次手术。

手术进行得很漂亮，堪称典范，艾森豪威尔躺了八天，可以接见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甚至决定不取消7月21日的巴拿马之行。但是，他的左右知道他过去对患病的总统所表明的态度，现在产生了怀疑：他还是过去那个人吗？果然，他想竞选连任。他不开玩笑地说，如果不发作心脏病的话，他不会放弃白宫的候选人资格。他将他的责任感置于何地？他不正在经受着权力的腐蚀吗？

权力在腐蚀着他。连任一年之后，1957年11月25日，脑溢血击倒了他。他早晨接见前来进行正式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感到冷。早饭后，哆嗦得更加厉害。下午，"艾克"回到住处，试图和他的秘书安·惠特曼说一说，但他已说不清楚了。他完了。

神经科医生进行了仔细检查。他的语言障碍几天前就该引起注意了。谁也说不清总统的神经系统受到了多大的损害。他是在经受着更严重的疾病的初步打击吗？他得休息。他的日程减轻了。他甚至考虑到了辞职。

然而，权力的魔鬼是清醒的，遮住了艾森豪威尔可能的明智。他效法威尔逊，否认这个新病。脑子没什么，还得继续干。他又一次长时间地自言自语着他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责任是他的动力，如同和平是罗斯福和他之前的威尔逊的动力一样。历史的盲人总是给自己找出视而不见的理由。

自此，艾森豪威尔生命的节奏放慢了。谢尔曼·亚当斯在他的

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间小休息室。总统可以在午饭前后以及下午4点结束工作之后，在那里小事休息。人们给他准备了一辆电力车，使他能继续打高尔夫球，跟着那些小白球一个坑一个坑地移动。钓鱼还被允许，不过仅能在平原上，禁止在落基山的美丽溪流中，那儿的高度太累人了。在他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前，他还连续发生过两次梗塞。每次都有心脏纤维性颤动。那是心肌纤维的不规则颤动，使心壁有大量虫子蠕动的感觉。它引起心室麻痹，不能协调地收缩。要止住颤动，只能靠纤维性颤动缓解剂，利用电力冲击起搏心脏。第三次梗塞的时候，一天之内，艾森豪威尔要接受四次缓解，四次被从肯定的死亡中拉了回来。

如果说34届老板的第一任可以提出一份积极的报告的话，第二任却不是这样了。

国际局势重新紧张起来。以色列要向埃及开战，战火将燃遍中东。纳赛尔要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吗？为报复计，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埃及登陆。匈牙利当局控制不了布达佩斯的叛乱分子吗？苏联血腥镇压了反抗。冷战刚刚结束，又接上了令人精疲力竭的神经战。艾森豪威尔认为允许“黑蜻蜓”U-2飞机经常飞越苏联是正确的。一架这种间谍飞机在1960年5月1日被苏联火箭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威尔被俘。苏联人以此为借口，取消了原定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裁军的首脑会谈。核力量竞赛变本加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培养的新手，在南美挨嘘，甚至在委内瑞拉被群众打伤。古巴终于摆脱了美国的影响，成为距佛罗里达一炮之遥的一艘敌对的航空母舰。在国内，棘手的事也不少。年轻的黑人

厌倦了种族隔离，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起来反对白人。人们大打出手，不得不派出军队，恢复不安定的秩序。国会公开与总统作对，关于预算吵闹不休，预算像民主党执政最糟糕的时期那样大幅度增加。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引起争议。这届总统的结局可悲。既然舵手已看不见礁石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对自己的健康也没有看得更清楚，对血管崩溃的征兆麻木不仁。谢尔曼·亚当斯因一桩有争议的、但也摆脱不掉的财政丑闻于1958年被迫离开了他，1960年7月，他去白宫看他。艾森豪威尔坚信他对执政丝毫不感到疲倦。他自认身体健康，想到即将被人取而代之而颇感不快。他甚至向这位前助手示意，如果刚刚修正的宪法还允许的话，他还想第三次参加竞选。

身体健康？第三任？他还有理智吗？1960年至1969年间，他回到家中，又经受了四次新的梗塞。1968年8月16日至24日间，医生14次认为他临床死亡，因为他有14次危险的心脏纤维性颤动。他的肠部又因梗阻而动了一次手术。16块胆结石引起了剧烈的胆绞痛，结果胆囊被摘除。

一个面无血色的幽灵，最后一次考验在窥伺着他：心脏全面机能不全。1969年3月28日，他被慢慢地吞噬了。这一次，“老头儿”没能挺住。他79岁了。他筋疲力尽，慢慢死去。人为地维持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医生们垂下了手。然而，他们之中有两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博士和丹顿·库利博士，表示了这种意思，人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前者曾首次在南非的开普敦试过心脏移植，后者也在这一领域中享有世界声誉，他是休斯顿同样有

名的迈克尔·德贝基的学生，不过学生对先生恨之入骨。这两位血管外科巨人冷静地考虑为艾森豪威尔移植心脏。幸亏，死者家庭反对他们的外科杂技。有时候，医疗活动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4.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最近,圣保罗发生了一次普通的检疫隔离失误。不过这一次,病毒迅速扩散,脑膜炎使4 000人丧生。为了控制病害,需要迅速给6 000万巴西人打防疫针。世界各国的姑娘们几乎同时接受了超短裙,然后又接受了蓝布牛仔裤,这种扩散的过程颇类似传染病。因此,疾病或心血来潮以及四处扩散的传染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人们成群地表现出脆弱或者可以随意驱遣。

在某一时期,人们自发地或有选择地倾向于拥护一种事业,这是否与一种类似的机制相呼应呢?这一点将揭穿一个秘密:其职司并非主持菊展开幕式的权势人物在一种政治体制中掌权时,常常把他的狂热传达给他带领的群众。

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美国人像心脏病患者一样行事,并且郑重其事。他的血压升高了吗?他们就焦虑不安。他爱惜自己的力量吗?他们就像他一样昏昏欲睡。冠状动脉衰弱使他大伤元气吗?

他们就一蹶不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像吞噬了总统的生理代偿失调一样，也不时地出现失调：华尔街上，交易所行情下跌。

跟着来的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代。蓬松的头发，温柔的眼睛，温文尔雅的微笑，这个波士顿的阿多尼斯跳进了挤满野心勃勃的鳄鱼的水沟。他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在司法界和电影界取得了一颗新星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成功。如果在民主党色彩的舞台上驱使角斗士搏斗，他要祛除的是什么样的魔鬼呢？人们认为，在正经地参加总统竞选之前，平均需要 20 年的政治成熟期。他却作为一枚青果子来了，其短浅的政治经历只有 8 年；与他的那些前任不同，他从未管理过州或市。他只熟悉一种美国：特权者、时髦大学和俱乐部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呢，如果不是传染的话？

许多作者围绕着肯氏一家错误地编造了一个故事。他们添油加醋。乔，父亲，被说成是个神秘的专制君主，能够给每个儿子提供一个国家统治，而且自己还参与其事。他的母亲罗斯跟着他祈祷，心跳。在波士顿的海恩尼斯波特，他们为了自己的小圈子而吞掉了整整一个区。这是个吵吵闹闹的家庭，一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天赋极高，只有罗斯玛丽除外。她幼年患有脑运动障碍。然而，据那些神话制造者说，她竟独自一人到了华盛顿，躲在人群中，当她哥哥成为“总统先生”的时候，向他鼓掌。

事实果然与这虚假的传说相符吗？罗斯玛丽没有参与她哥哥的胜利，她少年时就进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座修道院，从此未曾离开

过。他们的父亲乔生下来就很富有，是个会赚钱的好手，但仅此而已。他搞工业，搞电影，甚至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搞投机。他在罗斯福的几次竞选中都曾给予资助。他得到的奖赏是1937年当了美国驻伦敦大使。但是，他因对希特勒表示好感，对纳粹的专制主义五体投地，而于1941年被迫辞职。他伤心之余，更加陷入保守主义。不过，他很精明，注意不去影响孩子们。

在肯尼迪家，影响孩子的职责由母亲罗斯承担，她性格坚强，从不畏畏缩缩，是家族的灵魂。她从年轻时就开始记日记、做卡片，把什么都记下来。她管理、引导，由于她，而不是由于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才得以爬上政治的最高轨道。

他们全家去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度假时，人们给了她这个老二一个绰号：唐璜，罗斯发现他的确对女性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诱惑力，各种年龄的女人，只要接近他，无不脉脉含情，对他大加青眼。她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用的天赋，如能正确地加以利用的话。于是，罗斯心中有了数，开始全力以赴。1952年，肯尼迪不顾席卷全美的反民主党浪潮，参加了参议院选举。马萨诸塞州是共和党最牢固的光荣之一，亨利·卡博·洛奇的领地。私下里，罗斯组织了计划外的竞选活动。她组织了33次大型茶会，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将要把洛奇击倒在地。她们在自己的偶像周围越聚越多，1958年选举肯尼迪进了参议院。1960年，他施展他对女性的魅力，又赢得了总统选举。

这年的1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初选，指定夺取最后胜利的候选人。共和党领袖理查德·尼克松发起了一场古典式的运动。

但是，从母亲那儿得益匪浅的约翰·肯尼迪在他弟弟的支持下，别出心裁，搞了个“女人”行动。当时负责两兄弟与报界联系的皮埃尔·塞林格后来说，将来所有希望掌权的美国人都会从中受到启发。

方法直接受到间谍技术的启发，首先是确定将要取得合作的人选，在发现了控制他们的方法之后加以利用。一群聪明的女人走遍全美国。她们在民主党全国会议上会见肯尼迪寄予希望的那些代表们。私生活，爱好，亲密的关系，都一一被探将出来，编成卡片。当肯尼迪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就能找出合适的话来，表明他个人对他们是多么感兴趣。三年来，好几个协调人在各州里根据同样的方法搜集了大量关于女选举人、有影响的男选举人的材料。这样，肯尼迪家族就有了一个惊人的机构，拥有许多人。他们所具有的暗中了解别人的倾向，造成他们力量的细节感，都得之于他们的母亲罗斯。

约翰·肯尼迪这般武装起来之后，就可以开始他在初选中的竞选活动了。这时，他才真正发现了美国的现实，它的神奇的财富和它的苦难。在西弗吉尼亚州，他第一次接触到矿工家庭，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贫困。在威斯康星州，每天 16 个钟头，他都在与人握手。在新罕布什尔州，他的手被别人的手指磨破出血，真是地地道道的马拉松。在华盛顿州，他的嗓子喊破了，一位演说教师转眼间就教会了他如何说话，以免重新遇到这种危险。

如果说他不费力就赢得了公众的话，特别是当人群中女人占多数的时候，他面对集团首领，并不缺少领袖的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时候，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知识分子为阿德莱·斯蒂文森祈祷，南

方人只对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宣誓，黑人特别拥护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他们面前，肯尼迪显得纤弱稚嫩。哈里·杜鲁门认为他太年轻，讨厌他："他是天主教徒，但是，通过他，我害怕的不是教皇，而是他爸爸，乔老爹，那个顽固的保守派。"已故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党内仍旧炙手可热，她不能原谅这个"孩子"，如同他们全家一样，长时间地认为一心反共的参议员麦卡锡是美国的救星。不过，人人都屈服了。1960年6月2日，肯尼迪成了争夺白宫之战中的民主党的惟一候选人。

针对尼克松的这场公开的激烈竞争跟以往的竞选活动一模一样。一场令人厌烦的吵闹。透过大合唱的吵闹声，冒出了嚎叫出来的词句，声音比意义更重要。那时，肯尼迪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这些字叫得更响亮。艾森豪威尔把美国搞得耸肩缩项，麻木不仁，为了唤醒它，肯尼迪抛出一个被命名为"新边疆"的口号，一言以蔽之，这口号是："必须重新使这个国家动起来。"他的对手认为，这个信条像鼓一样空空洞洞。然而，这个信条风行一时，使永远是寻找新空间的先锋的美国人高兴。"我答应给你们月亮！"肯尼迪补充说。果然，不出十年，在付出巨大的技术努力和巨大的费用之后，宇航员们踏上地球卫星的灰白色的土地。肯尼迪和尼克松举行了四次电视辩论，其激烈的程度是少见的，据民意测验者们说，这给肯尼迪带来了几百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帮了忙，选举结束时，民主党多得了10万张票。与参加选举的6 900万选民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被确认为总统。

1961年1月20日，美国人毕恭毕敬地倾听肯尼迪的就职演说。

他们松了一口气。威尔逊、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的衰弱所引起的焦虑似乎被忘却了,几乎烟消云散了。他们终于有了个年轻的总统:43 岁,他没有任何危险。新总统脸上的幸福传给了大众。但是,如果美国发现它被耍弄了,那种集体的、兴高采烈的满足将会如何呢?

看罗斯·肯尼迪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她的儿子给人的那种精神焕发的运动员的形象是一个假象。在她详细制作的家庭卫生卡片上写着:"3 岁前,百日咳、麻疹、水痘、猩红热;少年时代,盲肠炎、淋巴结炎、黄疸复发、慢性哮喘。"直到那时为止,尚无可担心。世界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得这些病。肯尼迪 19 岁时出了一场事故,似乎更令人担心。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参加了哈佛青年队,在一次美式足球赛中,他摔得很厉害,一个脊椎间盘破裂。对他来说,体育运动的结束标志着受难的开始,终生不得摆脱。

罗斯指出,1941 年,约翰·肯尼迪的背痛如何推迟了他的入伍。海军不要他。但是,珍珠港灾难发生后,它毕竟还是给了他一艘太平洋上的舰艇:PT-109,一艘快艇。快艇于 1943 年在所罗门群岛的海面上被鱼雷击沉。当时,他背部的疼痛加剧。经过七个月的治疗,肯尼迪拄着拐杖回国了。在他的血液中,已有霍乱的根苗了。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他获得了勋章,还被当成英雄。当他认真地投身政治而于 1952 年开始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时候,美国还装作不知道他出色地加以控制的痛苦。他的一个亲信,凯尼·奥多奈尔说,他平时离不开拐杖,当他进入听众等待他的大厅时,就把拐杖藏在车子里,从不使用。他笔直地站在台阶上,微笑着。他结束演

说时，紧握双拳，痛得闭上眼睛，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呆一个小时再睡觉。

病痛压垮了他。在与杰奎琳·李·布维埃结婚后的两年中，他实际上是躺着过日子的。他听说可以做手术，在受伤的脊柱间换一个人造椎间盘，他接受了治疗，1954 年 10 月进了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医院。那真是一场灾难。手术引起了突然的代偿失调。他的左右认为，他的状况令人绝望，该给他行临终涂油礼了。四个月后，发生了严重的葡萄球菌感染，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人们又认为该给他做临终圣事了。他艰难地恢复过来了。杰奎琳·肯尼迪眼看自己要当寡妇了，在他在棕榈滩长期疗养期间，精心地照料他。

从 1955 年开始，在肯尼迪家的圈子里，无人再谈论他的健康了。实行消息封锁。不过，医生们注意到手术过程中的代偿失调和不正常的感染。他们知道，这种并发症常常反映出一种器官的自卫机制衰弱。隐蔽的病？一次秘密的调查揭开了障碍的原因。

1948 年，在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肯尼迪被紧急送进太平洋上的冲绳岛美军医院。人们急忙把他转往波士顿他家附近的莱黑医院。开始时，给他治疗的是伯太尔斯博士；后来他又进了庇特·本特·布莱翰医院，接受世界有名的肾上专家乔治·魏德迈·索恩博士的治疗。

肾上腺囊罩住肾脏，正常地向血液中输送激素，主要是肾上腺素，氢可的松，皮质硬脂酮。这种流动调节血压，刺激心脏的效能，对血管产生一种收缩作用。它控制血液中的酸碱平衡，掌管糖、脂肪、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保证对各种感染、创伤、应激的抵抗力。它

起着极端重要的生理作用。如果这种自然的化学流枯竭了，得不到治疗，在逐渐的衰弱或恶病质之后，就会引起死亡。这种病叫“青铜色皮病”或阿狄森病，因为英国医生托马斯·阿狄森于 1955 年首次描述了这种病。

阿狄森注意到这种病的患者总是皮肤发硬，呈现棕色。这说明脑垂体活动加强，暂时地补偿了肾上腺的衰弱。这种现象被称做黑肤症，使皮肤呈板岩状的深棕色。据阿狄森说，这种病起因于结核引起的肾上腺囊彻底破坏。英美的研究者们承认结核杆菌对这种病的影响，他们也证明，肾上腺囊的机能萎缩也能引起障碍，这种情况占一半。

直到 1950 年，人们对阿狄森病还无可奈何。这一年，人们发现了工业化生产可的松的化学方法。这是个根本的成功。医学上广为利用，有时甚至滥用这种灵丹妙药。肯尼迪病中大受其益，因为潜伏了很久的病果然是阿狄森病，因此，他虽未晒太阳，皮肤仍呈棕色。他的痉挛、低血压、低沉而微弱的心音、隐约的腹痛、经常的疲倦、消瘦，也都得到了解释。如果他早罹此病的话，他就完了。他赖以生存的激素自身已不能产生。他每天早晨，白天，都要吞食这种制成药丸的激素。像一个糖尿病患者不能忘记他的胰岛素一样，肯尼迪也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这种治疗，当心用量过度或不足。他得经常带着指示路上出事时的注意事项的材料。突然的代偿失调和手术中出现的感染证实了疾病的存在：尽管有可的松，肾上腺功能障碍仍然很严重，影响了整个机体。

约翰·肯尼迪并非不知道疾病的严重。他心中不安。他不是

害怕其后遗症，他知道他得到了良好的治疗，而是害怕人们知道他的生命依赖化学药物。他害怕公众的反应，如果病情传播开来的话，疾病的性质展示了一幅死亡的图画，其原因会令人手足无措。因此，他禁止左右的人说出病的名称，他嘱咐他们说："如果有人追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肾上腺功能不足，用口服药就可补偿。"

皮埃尔·塞林格一直这样重复着，直到1975年在巴黎，他才向我们证实，确是阿狄森病。但是，西奥多·C·索伦森，未来总统的发言人，却在肯尼迪死后不久泄露真相。

"如果说他从不叫痛的话，那是因为他在全国各地走动的时候，服用和带着比一个诊疗所备用的还要多的药物。这种内分泌功能减退引起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散出种种流言，这是他多年内的一大苦恼。由于我在联系新闻记者和医生上所起的作用和我过于有利的位置，我知道约翰执意要公众不认为他身体过于不适、不能应付竞选运动的疲劳和总统职务的重担，或他一旦被选上，会在第一个任期内死去。除了他的脊柱手术外，他任何一次住院，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原因，都不公布于众，这使我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取消或推迟一些他得讲话的会议。这是我最讨厌的任务之一。"

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肯尼迪成功地欺骗了人们，甚至掩盖了复发的背痛。背痛常常使他不得不在一天的活动当中进入某个汽车旅馆，脱下金属背心，洗个热水澡，松弛一下。1961年，他发表就职演说时，一反常态，表现出一个担负着最高职责的严重病人的样子。

什么？有好的帮手，一个有病的总统难道不能领导吗？约翰·肯尼迪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吗？许多人认为他是杰出的。有些人跟着皮埃尔·塞林格这样说。后者的位置使他能很好地衡量这位波士顿人给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带来的重大变化。他写道："有了肯尼迪，长久以来第一次，政治又恢复了尊严。他曾是位带来希望的人。他理解公众舆论的性质及其对权力所具有的限制。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必须比舆论先行一步。他懂得总统职位可以成为一种教育的工具。"

显然，肯尼迪在白宫打上了他的短暂停留的印记。他顶了尼基塔·赫鲁晓夫，迫使他撤回秘密安置在古巴的导弹，这些导弹显然是针对美国的，被他的间谍飞机发现。他同样在经济上支持了希望独立于共产主义体系的欧洲国家，一面又加强了美国的中立。他并未低估他在发生核冲突时的严重责任："我知道数字。一天之内，欧洲要死1亿人，这里要死8 000万人。一场这样的战争可以毁灭人类。"

然而，他也错过了与中国展开联系的机会。无疑，中国还处于莫斯科的轨道上，并未准备与美国接近。最后，他还犯有两个严重的错误：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一小批古巴流亡者在猪湾登陆；使越南战争扩大，尽管他知道，他不能替与美国人一起战斗的越南人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他已考虑撤离他的部队。

谁能判明这两个错误不是他的疾病的不自觉的后果，不是他的治疗的后果呢？人们知道阿狄森病会产生什么后果，可的松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所有的专家都承认,阿狄森病的临床形态中通常都出现心理障碍,有时还伴有精神障碍。肯尼迪当参议员的时候,多次找乔治·魏德迈·索恩看过病,据他说,阿狄森病患者表现出冷漠或执拗的占 84%,表现出抑郁或变得易怒者占 48%。瑞士精神病医生威尔内·斯多尔教授也证实,他们常常表现出肌肉极度衰弱,感到多种功能不全,记忆力发生障碍,睡眠失调。总之,这些专家说,阿狄森病引起大脑障碍,有精神分裂和出现幻觉的倾向。因此,各种治疗都应该包括精神病科的治疗。

同样,长期使用可的松,常常产生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副作用,使肌肉萎缩,容易引起皮肤感染、肥胖症、骨骼缺少矿物质,有时还引起消化器官穿孔,造成出血。精神上的障碍也同样严重。美国和瑞士的医生认为,可的松起了产生幻觉的毒品的作用,乃至于在他们的医院中,可的松被称为"富人的鸦片"。

这些评论说明,全世界每百万人中有四个得的这种阿狄森病并不被认为是良性的病症。当这些评论集中到一个执行国家元首使命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在这一点上,肯尼迪效法许多权力人物,也忍受不了长期的治疗。他的私人医生珍妮特·特莱威尔夫人 1961 年暗示,他并不总是按照医嘱行事。例如,他不告诉左右就使用苯丙胺,说是可以提神,纽约医生麦克斯·雅可布森偷偷地给他打针,后来,他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

肯尼迪并非不知道他的生命在迅速地消耗着。也许他已感到有一种危险威胁着他。这是他给以赛亚·伯林先生的印象,此人是

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的教授，福特公司的研究员，1963 年 10 月 26 日在白宫进晚餐。晚餐中有甲鱼汤，用香槟浸过的炸龙虾。在饭桌上，肯尼迪不停地谈论他的父亲，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在心理上一直受他的控制。

无疑，那天晚上他泄露了他的行为的关键。有两种动机推动他投入总统竞选。并缩短到达白宫的时间。首先，是一种针对自己的速决战。因为他知道自己受到疾病的影响。特别是，他想给肯尼迪家的纹章重新涂上金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乔以为纳粹会得势而作了错误的选择，使家庭的纹章黯然失色。

他那时的确是东奔西窜，急不可耐。他不断地催促忠于他的人们，从不让他们休息。他们总是抛开家庭，跟着他东跑西奔。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竞选后期，不少人弃他而走。他们并不遗憾，他们帮助他原是出于志愿。像他一样，他们发现，权力是一剂春药。

谁也不知道，这种对统治的崇拜会把他推向何种极端，也不知道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国内，对于他强制推行的狂热的生活节奏，金融家们不是开始怀疑他所选择的经济道路了吗？在国际上，尽管他的“白牙”政治发出微笑，他不是也唤醒了冷战的萌芽吗？在欧洲，他看到它成为美国的前沿堡垒，他初期激起的热情慢慢在消失。人们在怀疑。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他就任总统第 34 个月的时候，他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该州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故乡。在车中，他坐在妻子杰奎琳身边，面对着州长约翰·B·康纳利，他很早就知道疾病损坏了肯尼迪的健康，预言他将在体力上不能担负权力的重

任，并试图使他1960年的竞选运动归于失败。人群聚集在路旁，在一座仓库的楼上，一个狂热的年轻人，李·哈维·奥斯瓦德，平静地将他的意大利式卡宾枪装上子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没能走得更远。

5. 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

权力的前厅类似旅店和赌场。在端坐的国家元首周围,既有白发的廷臣,又有渴望一试才能的侍从。机会主义者也大有人在。因为在鸟儿的舞会上,总能拾到麦穗。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一种信条。只有在他们长期的停职中,才能认出他们来。当他们消失的时候,他们很少留下痕迹。但是,偶然的空缺一下子将他们推上前台,掀起一阵冒险之风。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如此,对变为管理者的那些人来说也是如此。

林登・B・约翰逊就是这样。如果值得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就是"不可预料"四个字。约翰・肯尼迪留他做副总统,因为他因此可以为1960年的总统选举获得大量南方人的选票。他似乎可以平静地退休,似乎也满足于这一点。像体育运动一样,历史只留下冠军的名字,而略去亚军的名字。但是,也像体育运动一样,政治上存在着不可估计的因素。在1963年,当他主持约翰・肯尼迪

的国葬时，人们关于他知道些什么呢？知道他在家乡得克萨斯州和参议院中为民主党服务30余年。仅此而已。

习惯上，当一位新总统进入白宫时，总是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文件，前任的助手，统统被打包、分类和清理。约翰逊却只改换了外表。他留下死者的助手们。他只在政府中塞进三个新人：沃尔特斯·詹金斯，比尔·莫耶斯，杰克·瓦朗蒂。根据传统，选了一位没有色彩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美国从中看到了迹象，他将继续前任的做法。它错了。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它进入了充满惊奇的时代，紧接着就是沮丧。

如果说求助于肯尼迪的助手，那是因为他相当看不起人，不屑于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班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他很快就憎恨死者的影子了，因为人们常常拿他与波士顿人作比较。人人对他都低声下气。他认为他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他有他的想法，却是秘而不宣。

在白宫安顿下来之后，他立刻就显示出是一座火山，行事如同君王。美国已经知道他性喜辱骂和语言富有色彩。当他命令一个顾问剪短头发、派另一个去学美容课的时候，美国微笑了。它感到开心，他有强烈的电话癖，日夜不停地调动他的人。它嘲笑他的怪癖，他让人不断给他拍电影，好让历史记住他。它公开嘲弄他的裸露癖。他相信裸体游泳的好处，他不是强迫他的客人，甚至包括亨利·福特和几位重工业巨头，一丝不挂地跟他一起跳入白宫的游泳池吗？不管面前是什么样的客人，他都把手伸进衬衣底下，舒舒服服地搔肚子，或者随意露出肚子上留下的切除胆囊的疤痕。他复活

了一种南方的习惯，甚至坐在马桶上接见。道格拉斯·迪庸，一个南方的贵族，就受到过这种奇特的对待。

当今这个被权力弄得昏头昏脑的世界里，大人物中时有精神倒错的现象发生，约翰逊受到这种现象的驱使，从来也不想知道他是否超越了界限。他对合作者的不信任，他对贬低别人的不健康的兴趣，人人都在他对休伯特·汉弗莱所施行的精神折磨中看得清清楚楚，他让他陷入痛苦的不安全感之中，把他变成一个装潢门面的人物。这些屈辱抵偿了他声称在肯尼迪手下同一职位上所受到的屈辱。

不过，当有关他的过度活跃的回声透露出来的时候，美国开始认真地发出疑问了。问题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如何领导公共事务。没有一个文件，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文件，能逃过他的吹毛求疵的警觉。他独揽决定权。他授权予人时总是极不情愿。他总与别人的建议背道而驰。不幸的是，由于他不知如何控制满腹的狐疑，他总是翻来覆去地掂量自己的抉择。当事态紧急必须表态时，他从来只是在最后一刻，以挖苦的口吻说出自己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衡量他的看法的价值呢？

警报来自他对新闻界的态度。他确信必须每天卖给它一个想法，因此，他要它驯服，虔诚。它不服，他就恨它。是他在美国开始发展刺探他人的电话窃听。他的秘密行动的需要促使他将白宫变成了一座小堡垒。医生认为是不能控制的冲动和躁狂症发作折磨着他。他能以一种平板的语调，像机关枪一样地说上一个钟头。他对世界的看法也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他得了什么病？他的支持

者一批批地丢下了他。他的妻子曾长期地约束着他的冲动，现在也无能为力了。1968 年，约翰逊的任期快要结束了，仍不断地叹息无人爱他，那些出于消遣还来陪伴他们夫妻的人真是屈指可数。

总结一下他的短暂的总统任期，不是接近了灾难吗？他受制于五角大楼的某些将军，那些他赞同其专制倾向的"鹰派们"，抵抗不住越战升级的阴森魔鬼。冲突结束之前，轮番进入远东的美国士兵达 1 600 万人次。在美国，这是不能很快从记忆中抹去的。美国也同样不能原谅约翰逊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的选择。他是 1933 年罗斯福新政培养出来的，大量地将联邦资本投入经济上软弱的部门。但是，在 1965 年，这种措施并不正确。他慷慨地接受黑人的愿望，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的确，由于他，今天几十个美国城市的市长是黑人，公职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除了这些炸弹之外，似乎约翰逊点燃它们的方式也使他周围空空如也。

奇怪的是，这个人热衷于统治，似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却在 1968 年表现出一阵明智。他决定放弃政治，遁入牧场，一年以后，心肌梗塞连续发作，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被遗忘了。他没有朋友。然而，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件礼物。他为之开路的那个人在许多地方与他相像，甚至更坏。但谁能猜得到呢？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突颌鼬眼，蒜头鼻子。美国少有这样一位总统使历史如此惊骇。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总是藏起自己的牌，不断地瞟着别人的牌。在美国历史上，干涉主义是民主党的灵丹，保护主义则是共和党的妙药。20 多年中，共和党人尼克松

自然是个保守派，而且是美国所产生的最不好惹的保守分子之一。但是，登上白宫的宝座之后，他拿起了大棒和香客的贝壳，嘴上抹着和平的蜜糖，跑遍了全世界。这是个贾努斯[①]，有着两副面孔。像投机者和不老实的中间人一样，总是准备着好几手，以保万无一失。不让任何人早有察觉，让他们惊讶。谁能明白谁就明白吧。

当历史能就他的事喘口气的时候，它将不会忘记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打着他的印记。它无疑认为他是同苏联缓和的坚定的缔造者。他作为马可·波罗去中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历史来说，他也是一位知道如何止住在越南的可怕流血的外科医生。但是，他不是也下令往河内投掷可怕的子母弹，却又一面起劲地玩弄和平鸽吗？他不是亲自批准了在智利杀害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地下活动吗？他不是批准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火箭而加剧核竞赛吗？这种火箭每一枚可投掷好几个自动击中不同目标的弹头。谁能明白谁就明白吧。

在内政方面，只有美国人能说他是否有时候是位好总统：别人是不付他们的税的。但是，为了评断他，他们将等待他造成和加深的伤口不那么流血的时候。现在，他仍然是水门事件的厚颜无耻的主人公。他是企图在白宫建立一个法西斯机构的第一位总统，因为法西斯主义才发展内部间谍活动，动员政府机构跟踪那些不愿参加上面决定的弥撒的人们，法西斯主义才嘲弄为所有人，普通人和强权人物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这里还是，谁能明白谁就明白吧。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从他的过去发现了解释的端倪。理查德·

---

① 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

尼克松是美国为数极少的总统之一，也许是惟一的一位，从童年起就饱尝真正的贫穷。他的父亲弗兰克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开电车。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当农业工人，在油井上当非技术工人，当木匠，在尤巴·林达当农民而破了产，后来又当杂货商，在惠蒂尔当可怜的加油员。他一生只干成了一件事：一个印第安纳州的卫理公会和公谊会教徒，在那儿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1923 年，他把二儿子理查德租给农场当半日工，未来的美国总统当时 10 岁。他 14 岁的时候，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他为设在滑谷表演会的秘密赌场拉拢顾客。

虽然吃的是黑面包，强者还是锻炼了自己的性格。但是，不管善良的人们怎么说，贫穷使弱者却更加沮丧。因为它助长了服从和对生活的恐惧，更有甚者，它有时助长了对贫困的羞耻之感。在某些人那里，贫穷产生仇恨。仇恨所有的制度，有时仇恨所有的人。这最后的命运是尼克松的吗？他有一副罗马皇帝的下巴，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强者吗？应该承认，他早就不把父亲当做榜样了。他认为是他造成幼年的贫困。他尊敬的是母亲汉纳，甚至把她作为榜样。她不是管家吗？作为被征服的补偿，他想像自己是她的宠儿。当她离家两年，到亚利桑那州结核病疗养院当清洁工时，他感到十分嫉妒，因为她是为了给大儿子治病才去的，不过，大儿子哈罗尔德还是死于肺结核。回到惠蒂尔后，她又控制了理查德，每星期天带他去四次教堂。她想把构成她自己人格的精神灌输给他。但是，由于愚昧和笨拙，她衡量不出他将她的教育扭曲到何种程度。她说：“屈辱、软弱和需要相互争斗。”他理解为：“相互隐藏。”她喊道：“不

要回避!”在孩子的弯弯曲曲的理解中，这变成了：“采取一切办法抵抗。”不仅用词不同，两个人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汉纳因为无法分辨，进一步阻塞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发展，使他成为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他是个贪婪内向的人，他将运用他的意志自我发展，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要表现出自己的人格来。他很用功，得到了杜克大学法律系的奖学金。不过，年轻律师这条路并不是一块“敲门砖”，纽约各大事务所的大门对这位来自西部的冒险家还是关着的。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社会淘汰依然存在。金元上帝的选民坚定地保卫着他们的特权。您试试在他们的住宅区里搭个帐篷看!他感到心酸，即使为了更小的事，换一个也会这样的，他又回到加利福尼亚。那里总是阳光灿烂，他父亲离开俄亥俄州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他的思想变得阴沉起来。要用暴力，像浪漫的革命者那样面对社会吗？或者像社会所允许的那样，调转他的巨牙。他这时和一些与人异趣的人往来，他们不太主张进攻，而更主张玩弄诡计，于是，直到 1946 年为止，他一直都在秘密策划着什么。

当时与他来往的人把他描写为滑头、撒谎者、无礼之徒，说他是令人不安、城府极深的人。他们送他一个外号：“狡猾的迪克”，诡计多端的理查德，这是一面真正的旗帜。对于这只年轻的狼来说，剩下的只是找一块好猎场了。他四处游荡，遇上了也在四处游荡的一位银行家，此人正为共和党寻求年轻的众议院候选人。在已经感到无望的尼克松面前，于是展开了一种政客的外向的生活。真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好方法，令人飘飘然。然而，人们知道那些全凭经验

的药物是什么：有时有益，但久用则变为毒药。

他是以一种双重的精神欺骗进入政界的。1946 年，他设法谋求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的位置。一个候选人已经开始活动，此人叫杰里·弗尔希斯，四十五岁，是个温和的自由派，著名的反共分子。与其光明正大地与之对抗，尼克松更希望将他打倒。选择什么武器呢，如果不是久经考验的诬蔑？在他低沉的恼怒声中，可怜的弗尔希斯成了一个隐藏的共产党人。他否认，随后屈服了。他越抗议，越陷得深。隐瞒他们与党的关系难道不正是“潜艇”的本性吗？弗尔希斯一蹶不振。尼克松于是当选。

不久以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著名的捉巫运动，用的是同一种策略。传说中认为麦卡锡师承尼克松。但这应称之为“尼克松主义”，内容远较“麦卡锡主义”丰富。发明者正是惠蒂尔的加油员的儿子。

1948 年，为了再度当选，他的獠牙咬住阿尔杰·希斯，一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他在历史上的确曾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同情。他被一个狂怒的尼克松压扁了，被他追得走投无路，最后竟被传上法庭。尼克松不费劲就获得了议员的位置。

1950 年，他认为他可以当上参议员而越过新的一级阶梯，他这时完全知道如何扫除任何可能的对手了。再说，美国的政治环境更加有利于他。在冷战的冰霜之中，美国人的头脑都冻僵了。第三个牺牲品是个女人，海伦·加赫根·道格拉斯。她也是个温和派，并未被疑心同情共产主义。她甚至投票赞成美国给朝鲜军事援助拨款。在尼克松的攻击下，她成了“粉红色的太太”，虚伪的女贵族，肯

定是隐藏的赤色分子，而且没有勇气表明她的极端的观点。为了使她陷得更深，他在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和怀疑的情况下，把她的名字与阿尔杰·希斯连在一起。像杰里·弗尔希斯一样，加赫根夫人也垮台了。尼克松进入参议院。他不受惩罚地欺骗别人，他的对手和他自己的选民，这种不正常的乐趣使他感到极度兴奋。从此，"狡猾的迪克"对于搞株连和影射是成熟了。只要这些东西能为一种事业服务，他就有权加以利用。

尼克松脱离了孩提时代以后，其暧昧不清的人格更由于喧闹而可疑的从政而进一步发展，当人们冷静下来观察这样一个尼克松时，一件事实令人震惊：补偿的需要。宗教的训诫要他为父母增光，他却鄙视父亲，内心中将母亲视为榜样。他在兄弟的身上进行报复，在一个本子上，他写下了积聚了一年的怨恨。同样，为了辩护他个人的活动，他经常编造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并将其推到疯狂的地步。这并不妨碍他当了总统之后，不计代价地与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内心里，他难道不欣赏这些领导人在其国内推行的秩序和法律吗？"两端相接，"精神分析学家们说。在尼克松的头脑中，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战斗，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灵活性。

他因此而相信，在生活中，狡猾的人可以使应该发生的事提前发生。难以置信的骄傲，不是吗？他应该事先装备好，他还不知道反对什么，但他不停地准备着。这是他的狂热的公开理由，这种狂热给他的左右留下很深的印象。平静的艾森豪威尔也被迷住了。自1952年始，将军——总统就让他当副总统，并且留任八年。在白

宫占据的那间小办公室在尼克松的脑子里造成了一次短路，他从此有了一个目标，以便疏导他的分散的精力。接班。拦腰抱住肥胖的美国，和它的巨大的力量结合，反之，这种力量也渗透到他的细胞深处。他精细成癖，更甚于约翰逊。为了达到目的，他讲究姿态和说话，精心修饰哪怕最短的发言。但他有个障碍：他总是害怕群众。甚至他向记者 C·苏兹贝格宣称他很容易对大众讲话，那也是排除了个人与人们之间的联系的。他恨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1959 年 7 月，在莫斯科美国住房展览会的厨房部，尼克松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有过一次小小的交锋，他对此进行了过分的夸张，不过是想从远处向美国人民证明，他能与苏联领导人对抗。在 1960 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被肯尼迪一举击败，他发誓，不管未来竞选的赌注多大，他绝不对任何事情掉以轻心，以便取得最多的选票。这是一把不可忘记的钥匙，它将有助于解释后来的水门丑闻。

对于某些想当国家元首的人的人格如此不了解，真得有许多选民瞎了眼才成！以在小范围内耍花招开始的人，随着权欲的增长，必将玩弄更大的骗局。

加利福尼亚人及时地揭露了尼克松。1962 年。这一年，他还对败于肯尼迪耿耿于怀，他归罪于新闻记者，“这些专门搜寻倒霉事的家伙操纵舆论，扼杀了一个人的前程”，他瞄上了州长的职位。他遭到惨败。“尼克松主义”或“麦卡锡主义”，捉巫的时代在那边还未被忘记。人们想起了杰里·弗尔希斯和加赫根·道格拉斯夫人的命运。1968 年 11 月，尼克松又冒出来了。下巴比任何时候都更蛮横，眼睛盯住了远东的黄线。他又一次竞选总统。

他在穿越逆境的过程中有所变化吗？当然有，只是变得更坏了，以后的事情将证实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他当选了，尽管是很微弱的多数。他在竞选活动中，只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这句话："在越南实现和平，在越南实现和平。"这场战争，美国已不愿再打了。它厌倦已极。它甚至冷冰冰地委身于这个牧羊人，只要他能将它救出这个马蜂窝。但是，他知道东京湾、安南、老挝、交趾支那、柬埔寨在哪儿吗？他实际上关心战斗的结局、那些远方死者的命运吗？果然，从 1969 年开始，他正式与亨利·基辛格商谈停战。但他并不着急。人们据此判断：六年内建立起和平。批准此事的是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越南人是难对付的谈判者，把美国全权代表们的任务弄得很复杂，不过，尼克松本人也未拿出他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时间。压倒一切的忧虑只有一个：他自己的命运。

如果曾有尼克松之谜的话，那就是恋己癖何以损害此人到这种程度。三名医生跟着他。第一个是约翰·C·伦格林博士，20 年来一直给他看病，每日协助他的沃尔特·特凯奇少将和维廉·卢凯会中校。他们是什么时候看见他表现出强迫性精神神经病的迹象呢？

谁也逃脱不掉烦扰。P·谢若教授注意到这一点。对于一次失败，一次失望的反复回忆，能够扰乱好几夜睡眠，破坏工作和娱乐。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翻来覆去的老调总是纠缠不休。走路时，某些人试图踩在或避过路面石板的接缝。另一些则整理工具或文具成了癖。据医生看，这都是强迫性精神病的倾向。如不明显，还可以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严重一些，就成了强迫性精神神经病，有时可以致残。这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描述过的居焦虑、恐

怖、歇斯底里之后的第四大神经官能症。

它的解剖基础尚不清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疾患，损害人的性格，严重时，使其面目全非。由于受害的母亲容易使儿子染上这种疾患，就有人错误地认为它是遗传的。不过，它的确表现出一种针对父母的教育的被压抑的反抗。心理分析经常发现诱发它的根源是病理的。

造成幸福的心理生活的平衡取决于来自无意识深层的欲望和道德及社会的必要限制之间的正常关系。在强迫性神经病患者那里，没有和谐，有的是冲突。他的欲望表现为非实现不可。而可能的限制则变得残酷。争斗毫不留情。病人受着自卫本身的攻击。这是一场使人疲惫不堪的战斗。他关在一个恶性的循环之中。为了摆脱他的念头和冲动，他采用了某些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使人感到纠缠不休。

通过什么来辨认这些病人呢？通过妨碍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怀疑和顾忌。最微小的决定都反映出使他们痛苦的内心冲击。约翰逊总统领教过这种折磨。副总统汉弗莱在他身边扮演了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需要削弱他人的力量，这是证实强迫性精神病的一种征候。在为温斯顿·丘吉尔举行葬礼的时候，约翰逊表现出这种征候。世界上所有的国王或总统都前往伦敦。身患感冒的约翰逊让最高法院的代表厄尔·沃伦代替他，而汉弗莱却闲在那里。因为副总统将与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会面，也许还会谈到约翰逊，这是后者受不了的。

患者精神僵化，也反映出他们需要过分地追求尽善尽美。他们

搞咒语一样的神秘的习惯动作：有的人背诵乘法表或重大的历史日期，夜里起来20次去查看煤气是否关好，或者上百次地洗手。当他们的所谓"肛门虐待狂"的倾向越出他们自立的禁区时，人们就看到他们的指甲是黑的，他们在脏乱中自得其乐。脏话也充斥在他们的言语之中。他们由于仇恨他人而自我孤立起来，陷入忧郁，无缘无故地哭泣，这是新闻记者C·苏兹贝格常在约翰逊身上看到的。有时候，他们的冲动促使他们偷窃、自杀或染上裸露癖。有时他们真的付诸行动。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就陷入精神分裂症之中，这证明他们的自卫崩溃了。一幅可悲的图画。

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呢？

他执政六个月来，白宫的新风格有目共睹。同样，对医生来说，总统开始表现出精神神经病存在的严重征候，这也是很明显的。约翰逊把白宫变成了一座小堡垒吗？它现在变成了一座小掩体。一种可怕的安全机构将总统与美国和世界隔离开来。一个超级班底，一个超级警察部门，一群超级流氓，以防不测。尼克松在身边用了三个令人放心的人，他们既能忍受他的巨大的忧虑，也能忍受他的突然的恼怒，他们是：鲍博·霍尔德曼，约翰·亨利希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亨利·基辛格。后者为了讨好他，将外交的实施适应于老板日益加深的病态的阴郁孤僻。这种外交后来成为一种穿梭外交。他乘坐一架连机翼上都装满电子仪器的波音707，像个跳蚤似的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靠着机上办公室强有力的发报机，他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与白宫中的隐身人保持联系。尼克松并不知道，他正模仿着另一个有名的着了魔的大人物霍华德·休斯，此

人深居简出,极其富有,也极其忧郁,肮脏,胡子拉碴,从不露面地管理着他的工业王国。尼克松毕竟还有时走出巢穴,到世界各地去签署他的手下人秘密准备好的条约。或者跑去躲进另一座堡垒中,在美国的另一端,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的私宅中。

自 1940 年以来,每位美国总统都置美国的制度于不顾,给予自己越来越大的权力。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如此,约翰逊更是如此。在第一个任期的开始,尼克松就使行政权的优势臻于极致。这使他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像猛禽在自家的巢里一样,因为他自以为可以免受惩罚。霍尔德曼或亨利希曼把他们的指示摔给秘书们,一边嘟囔着:“干吧”,人们可以想像这是尼克松同意了的。基辛格在外面搞他的袋鼠外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俨然是决定的主人,人们也可以想到,尼克松是支持他的。但是,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也不敢问这些行动是否由总统指挥。自 1969 年始,白宫的政治生活就是这样。朦胧一片。下面隐藏着铁一样的专制。

这一年,以及 1970 年,越南战争扩大,并未如尼克松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减缓。大学校园燃起烈火,因为它们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早晚要提供士兵。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包围白宫。他们知道,窗户后面,总统发抖了吗?他是气得发抖,因为他恨群众。在与他人的接触中,强迫性精神病患者实际上不能使他的好斗性消解。但是这种冲动是他生命攸关的需要,它使他具有针对自身的防卫,它是他的禁区的核心。没有它,他将如何呢?于是,尼克松摸索着,茫然无措,不知道如何决断。事态紧急,决定还是做出来了。不过是错误的决定。发展秘密工作,官方的或平等的秘密工作,以便控制

内部的敌人，对全国搞间谍活动。一支地下无敌舰队，目标是美国公民。

一位新闻记者，名叫埃尔斯伯格，选择这个时候公布了五角大楼关于远东战争的文件。他立刻成为要打倒的人，一个新的杰里·弗尔希斯。有人撬开了他的精神病医生刘易斯·费尔丁的门，希望在他的病历中发现置他于死地的东西。徒劳的结果使尼克松暴跳如雷并立刻迁怒于整个新闻界。他的恼怒催促着他的手下开始触犯法律。几个星期内竟有五六次之多。

从外面看，一切都使人觉得他在支配着、协调着他发动起来的这架机器。因此，人们不知道，他的左右在竭力抑制他的脾气发作。他的三个医生不说话，他的助手们却看到他行为中错乱的一面日益严重。1970 年 5 月，当他命令武装入侵柬埔寨时，当天晚上，他向不同的人打了 50 次电话，谈话的内容使听者目瞪口呆。他谈到他的母亲，一位圣徒，谈帕特、他的妻子，谈南北战争，谈他的青年时代。他们不知道，这种多言癖给他以安全感。他也几小时地与他的副手们讨论他们办公室中家具的位置，窗帘的颜色，卫兵制服的颜色。

约翰逊让人给他拍电影吗？这种鞭笞派教徒的强制性也促使他录下他在那间著名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所说的一切。一切：政治决定、无意义的废话、脏话、流氓切口。这就是他在几公里长的磁带上堆积的证据，以为后世留名。但是，他不仅命令新闻记者，而且又重新开始对特迪·肯尼迪的调查，后者被怀疑在查帕奎迪克的一次车祸中杀了女友。他要求人家编造一份电报，在暗杀吴庭艳总统的事件中牵连上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幽灵。尼克松对他的豁免权和

特权确信无疑。他君临一切。

再度选入白宫的日子临近了。1972 年,他又拿起手杖,到美国各地去进行竞选活动了。为使他的胜利确保无虞,他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甚至跑到毫无用处的阿拉斯加去。这种细心并非出自政治的迫切性,而是出自精神病的必要性。一种一模一样的冲动使他下命令在华盛顿的民主党总部安窃听器。水门事件由此发端。为了胜利什么也别忽略,这种考虑产生了这个决定。实际上,这是一种躁狂症的行动。1972 年 6 月 17 日,他的愚蠢的“管子工们”被逮住了。

丑闻爆发了,愈演愈烈。这并不妨碍几百万美国人在 11 月份再度选举他当四年总统。生活在美国并十分了解美国的利奥·索瓦热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这样投票,不是拥护尼克松,而是反对麦戈文,出于知识分子的怀疑,认为无论如何,一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强盗要比一个正直的、愿望良好的和平主义者好。这个强盗这一次好像要打和平这张牌了。当然,他会说话算话的。但是,晚了多少时日啊!新的谎言是多么多啊!利奥·索瓦热补充说,到那时为止,虽说他要花招,弄骗局,他却总是倒不了。那么,为什么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倒了,而没有像一贯的尼克松那样再爬起来呢?医生们知道答案:由于神经病的加重。它模糊了他的智力。甚至那些袖子里藏着一把牌而总是赢的骗子也会如此。

实际上,一个清醒的尼克松是不会让如此有害的事情扩大的。1952 年,当人们正确地指责他贪污的时候,他不是成功地用令人感动得落泪的自我批评使舆论转而有利于他吗?他如果精神健全的

话，这一次他还会在公众的愤怒变成惊涛骇浪之前就使之平息的。公民们是非常喜欢大人物的悔恨和失误的。他们在别人供认的罪过中认出了自己。但是，1973年春，在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哈佛的阿尔希巴德·考克斯教授的压力下，着了魔的尼克松听不见理智的声音了。这个人沉没了。他的思想变得僵化而粗糙，像座冰山一样，非融化不可了。人们向他要证明他干的坏事的录音带吗？他反复地数了又数，望着它们。他摆脱不了，拿不定主意，甚至决定不了销毁还是不销毁。这是他的财产，他的生命。它们属他所有。那些人和他们的法律要干什么呢？他高喊无罪。人们应该相信，他什么也没有干。他超然处之，好像处于毒品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控制之下似的。

参议院委托参议员萨姆·欧文向全国说明情况。萨姆·欧文是个权威。他以博览群书出名，讲话总是引用新约。他的年龄和他的面貌都让人放心。也许他能从尼克松嘴里掏出考克斯教授没能得到的东西？希望落空了。恰恰是因为参议员跟他提起死去的弗兰克·尼克松，惠蒂尔的小杂货商，提起了他自己的无所不知，总统才不让步。他不愿与他父亲的影子进行讨论。为了逃避危险的谈话，他设法进了医院。“病毒性感冒，引起了肺炎。”他的医生们说。实际上，尼克松是进行了有益的精神的治疗。不幸的是，强迫性精神神经病是不大能治的，无论是用灵魂医生的话还是用化学药物。

然而，在约翰·西利卡法官的推动下，法律追究步步进入。尼克松手下的人一个一个地被逮捕，定罪。他们中间有约翰·迪安，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尼克松丢车保帅，把他们抛了出去。他们

为了自保,便开口了,控告他。

回头想想,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历史在其前进的过程中,从未考虑到发号施令的那些人的健康状况。美国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1973 年 10 月,危机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危机平息了。如果跟这个着了魔的却握着点燃核火之权的人一起的其他人没有在危险的陡坡上刹住车的话,人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里,当尼克松让越南战争毒化,拖延那么久的时候,人们可以问问尼克松是否很好地衡量过他的责任的后果。在他周围,一切都崩溃了。法院要与副总统皮罗·阿格纽算账,他因承认舞弊而被迫辞职。这是个庸俗的坏蛋。杰拉尔德·福特立刻取代了他。10 月,阿尔希巴德·考克斯教授一直坚持,他要磁带。尼克松反转来命令将他撤职。考克斯的办公室和司法部被联邦调查局封闭。

公众的反应给总统来了个措手不及。白宫再度被围。几千名汽车驾驶者愤怒地按喇叭,他们要求解除尼克松的职务。法律界起而反对他,事关美国法制的名誉。这一次,行政权力该屈服了。45 万份抗议电报涌向华盛顿。被要求表态的参议员们分裂了。1973 年 12 月 26 日,走投无路的尼克松逃之夭夭,躲进了他的第二个堡垒,加利福尼亚的圣可利门蒂。

人们曾经大肆吹嘘他性喜战斗和争吵。他的最后的支持者等待着他的反击。会有反击的,有人预报在 1974 年 4 月:一次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说。尼克松还不觉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摄影机前,天花乱坠地讲了一通。他指着身后一堆 38 卷订起来的卷宗,解释说他的谈话都记在上面,它们将证明他无罪。他撒谎,撒谎。他失

去了真伪的概念。这些录音充满了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粗野和下流，使他一蹶不振。一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坏了美国的名誉，应该赶走这个令人厌恶的、没有道德的家伙。

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个病人。然而他是。精神病学家很快就能诊断出他的病到了何种程度，因为他达到了进退两难的强迫性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自杀冲动的阶段。长期以来，他就感到左腿沉重。医生诊断为静脉炎。这是血管的一种急性、准急性或慢性的发炎。尼克松得的是准急性静脉炎。一个血块阻塞了血管。其尾部在血液中飘浮，可能分离，在别处引起栓塞。医生给尼克松用抗凝剂，使血液流动，用消炎药退烧、止痛，减少红斑和感染，用维生素 K 消除浮肿。他的腿上缠着一副松紧带。尼克松被逼得走投无路，要向命运挑衅。他决定 1974 年 6 月出访中东和莫斯科，但却没有真正的政治目标。随他旅行的是他在白宫的两位医生，沃尔特·特凯奇和威廉·卢凯什。他不理他们的指示，扔下药物，摘下了松紧带。他几个小时地站立和走动，忍受着一阵阵的痛苦。如果他这样死去了，这对揪住他不放的斤斤计较的美国法律和那些人该是多大的嘲笑啊。而且还是在国外。他为了最后进入史册，呼唤着死亡。死亡却不要他。

他的归来不怎么荣耀。他为逃避命运的努力付诸东流。7 月 24 日，法律委员会开会，辩论通过电视播出。27 日星期六，傍晚时分，作出了判决。27 票对 11 票，建议解除总统职务。尼克松只好辞职了。1974 年 8 月 9 日，他辞职了。他为精神障碍所产生的混乱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一切，威信，个人的地位，亲人和民族的尊重。

他成了普通公民，死亡的冲动并未离开他。他隐居圣可利门蒂，经受着夏天的冒失之举、埃及之行的后果。静脉炎复发。人们还可以给他使用药物。他要求手术，希望在麻醉中于手术台上了此一生。最后的非非之想，向敌人发出的最后的挑战。但是医学上精心护理。尼克松于 1974 年 11 月再次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外科医生的生意并没有丢。在约翰·伦格林博士的敦促下，尼克松被送进加利福尼亚的长滩的医院。埃尔顿·B·希克曼博士主刀。71 分钟内，他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手术。出色的工作。手术重新使血液畅通。几天以后，尼克松重返圣可利门蒂。回到了他痛恨的世界，人的世界。

6. 阿道夫·希特勒
本尼托·墨索里尼
内维尔·张伯伦
爱德华·达拉第
莫里斯·甘默林将军

美国现在有 1 700 万 18 岁到 21 岁的青年，占选民总数的 11%。然而他们之中有 92%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 年的经济危机在 82%的人当中不能引起任何反响，而 62%的青年说不出 1941 年在珍珠港发生了什么事，56%对朝鲜战争一无所知，40%根本不知道肯尼迪被暗杀身亡。十个里面有三个甚至已经忘记了 1969 年 7 月是一个叫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美国人第一个登上月球。这是 1976 年 5 月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人们于是明白了为什么美国政界的斫轮老手尽量少引证过去。对许多选民来说，他们讲的似乎是巴塔哥尼亚语或斯瓦希里语，一种陌生的语言。

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欧洲大陆，这块土地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的蹂躏。这一空前的血泪交迸的人间悲剧，弄得废墟处处。这次战争的受害者共有4 000万人，其中3 700万人在欧洲。1 200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哲学和不同信仰的人在法西斯集中营内被枪杀、吊死，被毒气窒息或被烧死。从恐怖中侥幸逃生的人，他们的心灵与肉体中还带着"黑色秩序"暴行的后果，没有忘记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之后的年轻人低估或否定有关那一时代的说法，虽然那一时代并不十分久远。这一点，在法国，墙上那些横涂竖抹的黑字"警察就是党卫队"就是证明。青年示威者与警察队伍发生冲突，把他们比做那些狂暴的杀人犯，虽然他们对后者的滔天罪行一无所知。实际上，这种比喻的轻率反映了希特勒主义已经不能再占据人们的思想，它不再使人愤怒了。即使是最可怕的罪行，随着时间的过去，也在不断地被人遗忘，人们似乎依此作为他们进化的代价。

历史学家却敏捷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绕过将国家秘密维护了50年的过时法律，提早发掘了恶魔的邪鬼，阿道夫·希特勒和本尼托·墨索里尼因为打开了地狱而犯的罪行的证据和材料。他们的研究同样使那些懦夫，那些胆小鬼和草包无地自容，他们本来可以但却没能及时控制灾祸的发生。对于深入认识这一可悲的闹剧的主角们，医学本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两个打着种族旗号播种死亡的法西斯暴君并不真正属于某一种健康血型，血脓既侵蚀着他们的血管也侵蚀着他们的精神。某些执掌权力的人，虽然他们拥有足够的手段和时间来阻止形势的急转直下，却在两暴君面前后

退了。他们之中有两个名声显赫之人，两个病夫，他们的病无疑也是他们没能经受考验的原因，他们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军队的首领莫斯·甘默林将军。他们都了解各自身上使他们的能力不断削弱的疾病，但他们依然抓住主要职责不放，虽然他们已经无法正确地行使这些职责。对他们之所以屈服作出解释，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为他们的不负责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到1939年，这一年世界失去平衡。法国把它的命运交付给爱德华·达拉第。达拉第55岁，一年以前就任总理。他又短又粗，背阔肩宽，低沉的声音里带着沃克吕兹的口音，沃克吕兹以盛产新鲜蔬菜瓜果闻名。他的父亲是卡彭特拉的面包商，培养他正直和一丝不苟的思想作风。他很早就开始了工作以便支付他的学习费用。在里昂他是爱德华·埃里奥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政治信仰者。他通过了历史教师学衔考试。积20年激进主义的活动经验，他熟谙公众事务，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鼓励小额储蓄，从来不盲目地投身于新潮流。他17次出任部长，经常是在国防部，他使达官显贵们感到放心。他已经任过第三共和国的两届总理。在此艰难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谁能是更好的舵手呢？希特勒有了对话者。由于他的作风，他的固执和他突发的攻击，人们不是称达拉第为“沃克吕兹的公牛”吗？

这是所谓的传说。而他的敌人丝毫不隐瞒地说这头公牛却长了一对蜗牛角。无精打采，迷迷糊糊，宿命论者，容易冲动，这些字眼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评论家的评论中。还缺少一个词：无能。

的确,这是一位危险的政治家。他对军人怀着一种恐惧的信任。

四年以来他对莫里斯·甘默林将军关怀备至,后者在 1939 年 67 岁。此人既矮又瘦,举止讨人喜欢,很会恭维别人。据说他是法国第一个战略家。1914 年获得成功的马恩战役的作战计划,那是他在若弗尔元帅的指导下制定的。他继承了若弗尔元帅的理论、才能和经验。这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头脑清晰敏锐,1935 年当了参谋长。他有一件秘密武器:离群索居。“一名高级军官应该避开细节问题,”他说,“否则负责人如何能逐渐成熟呢?”达拉第总理被他征服,对他言听计从,而法国则亦步亦趋。

然而,那些因为公务能够敲开他的家门的人却恐惧地颤抖了。他们透过外表似乎看见了另外一个人。甘默林似乎丧失了想像力和意志。他还知道行动意味着什么吗?那些军人不禁自问。他们说他好像一匹僵硬的海马。

第二个声名显赫的人在伦敦:阿瑟·内维尔·张伯伦。他在 1939 年 70 岁,两年以前当了首相。他的任职太晚了,并且似乎没有得到解释,他的前任是颇有性格的斯坦利·鲍德温。张伯伦身材高大,性格古板忧郁,他等待了 25 年之后才手里拿着伞出现在报纸上。在伯明翰,此地从 1876 年起就是他的家族的选举世袭领地,虽然内维尔生下来的时候嘴里含着金勺子,就是说生来走运,人们却没把他看成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他既比不上他的父亲约瑟夫,也比不上他的哥哥奥斯丁。他们两人都一帆风顺,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政界。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来得很慢。他当过卫生部长、社会事务部长,甚至财政部长,但他的形象没有感染公

众。走在街上，没人注意他，他于是埋头于他的文件，他是一个不辞劳苦、勤奋的人。

在各个部机关的走廊上，人们议论他是躁郁症患者，然而没有谵妄，议论他是一个过于严肃爱教训别人的摩尼教徒。他反对战争，鼓吹虚幻的全面裁军。他不喜欢集体协议，孤立主义对他更为合适。可是1937年，一切都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平衡。张伯伦狂热起来，他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使他自以为是救世主和反战的斗士。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被任命为国家的领导，谁知道呢？

搞政治如同体育比赛一样，了解对手是最重要的。而1939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张伯伦、达拉第和甘默林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应全然不知。当然他们了解希特勒极会表演，他有操纵群众的本领，他能做令人吃惊的性格表演，由愤怒而轻蔑，而谩骂或傲慢无礼，甚至产生幻觉的冲动，涕泗滂沱，兴奋至极。他对讲话是否符合事实全然不放在心上，只追求对听众产生的一时的效果。他的下巴好像要咬碎一切，而只要看看他的靴子，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他要把一切踩在脚下。

人们还说他是近视眼，但因为对此感到羞耻而拒绝使用眼镜，他要求人们在一台特殊的机器上用大字打他看的东西。他经过14年的密谋，在1934年取得政权，有关他的生活的传闻很多。他讨厌坐办公室，宁愿相信直觉而不去研究，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起床很晚，中午召开一次人数众多的汇报会，然后在下午2点吃一顿简单的午饭。他有睡午觉的习惯，大量地吃糖，每天例行地会见过客人之后用晚饭，随后一直高谈阔论到早晨三四点钟。他既不打猎也

不钓鱼，既不游泳也不运动，默默笼罩着一片令人烦闷的气息。但只凭这些杂乱无章的说法还不能真正地对他的行为作出判断。

直到1943年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才完成了对元首精神病面貌的刻画，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弄懂第三帝国的首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可能反应并对这些反应提前作出估计。精神病分析专家沃尔特·兰格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发现希特勒有恐癌症。因为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所以他对这种病比什么都害怕。他觉得胃部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1935年以来他不敢大吃大喝的原因。接着他又觉得嗓子受到了威胁。柏林有名的专家冯·艾希肯教授给他动了手术，割下了块息肉，这块息肉使他失音。兰格还特别指出希特勒是癔病患者，他总是怀疑自己，否定所有前人的榜样，总之他无法从事任何需要智力的职业。他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1918年，当他拒绝承认德国战败的时候，他的短时间的失明可以从医学角度证明他的癔病。心理与智力之间的矛盾被他以一种不稳定的意志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巨大力量表现得清清楚楚。

他的怀疑和恐惧集中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的邻国身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他对传统医学的畏惧使他被江湖术士所包围，他只接受惯用邪术的提奥多·莫雷尔博士，后者给他灌满了肠菌簇并让他吃素以便消除他所说的“先天缺少细菌覆盖的状况”，这真是一个大笑话。只有效力很广、发现于1948年的抗菌素才能暂时引起这一现象。希特勒对医学及其作用的恐惧还表现在他的一个丧失理智的决定上，他禁止他的部队进行预防破伤风的接种，结果这种古老的、在别处已被控制的疾病引起了大量死亡。在这个癔病患者的影响

下，第三帝国也如同着了魔，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铁蹄已经准备愉快地踏上欧洲的道路，他的狂妄自大的野心将要同时发出怒吼。

这就是张伯伦、甘默林和达拉第1939年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别的迹象，他们能够看到的政治迹象本来应该引起他们的警觉。希特勒成为元首后，便着手准备实现他的罪恶计划。每年都有出人意料的事情，每每出现在星期六，因为他知道每逢周末，伦敦和巴黎的政府便中断了工作去乡间休息。他于1935年初就在德国恢复了义务兵役制，这是帝国对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次打击。他于1936年重占莱茵兰，1937年建立罗马—柏林轴心，1938年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然后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变为他的保护领地，两次吞并梅梅尔，和斯大林在1939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把格但斯克划入帝国版图。疯狂的扩张。每次，只要运用警察就能阻止希特勒，也许能够挫败刚刚诞生的还缺乏军事和物质手段的法西斯。这一点，只有为数不多的英国人其中包括丘吉尔懂得，而盲目的盟国方面一再推迟力量较量，他们不承认希特勒病态的贪欲。

希特勒日益骄横，在他的庇护下，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事业在意大利获得巨大发展。法西斯主义是他于1919年创造的，所以他比那位奥地利人更早地信仰了法西斯主义。他从1922年起就驾驭了意大利。1939年正当他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他56岁。果然名不虚传，他表现出一种自我表现的歇斯底里。这个滑稽可笑的暴君把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变成他的大剧场，他在阳台上大肆自我卖弄。他为未来的军人留影，剃光了头，扬着下巴，转动着一双怒目，摆出

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的性格基础是由渴望行动、喜欢暴力和成功的野心组成的。他驾驶赛车和飞机，他光着上身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他自己并且还强迫他的部长参加越野赛跑。但透过这种种外表，他心里隐藏着一个对孤立的巨大恐惧。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很容易泄气。

他是否感觉到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像希特勒主宰德国人那样地征服了意大利人？这个语言丰富多彩的论战家，这个讲话简捷富于形象的优秀演说家，倒像是为了让那些被他的人集合起来的人海开心。但是意大利仍然很固执，除了那些动听的言词和马戏一样的表演之外，它并没有真正听人摆弄。它从幅员广大的帝国开始，已久经沧桑。宣传总归是宣传，墨索里尼政权的经济成果——小麦收获和彭丹沼泽的治理——微乎其微。领袖想继续欺骗它，于是又把它推上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艰苦道路，希望在地中海沿岸能恢复几分昔日的威风。实际上他使兵力分散，并耗尽了他强行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贷款。除了季节变换他容易患黄疸和伤风之外，除了胃溃疡自1924年使他严守饮食制度外，还有什么病使他的行为和有幻觉的人一样呢？

几名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的医生知道他有神经梅毒。

墨索里尼所沾染的性病大概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正在阿尔卑斯山猎步兵中服役，是和拉赛尔·吉蒂同居的很久之前，他和她最终正式结婚是1925年。当他从弗波波里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艾米利亚的瓜尔蒂里当小学教师的时候，似乎已在请人治病了。此后不久，因为鼓吹社会主义的活动被通缉，他于是躲到瑞

士，在那儿临时当了泥水匠直到1908年。在日内瓦的皮肤医学院的联合诊所里，人们听到过对这位有名的唐璜的疾病及医疗档案的谈论。

在青霉素发现之前，治疗梅毒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效果没有把握。为了消灭引起传染的因素，即螺旋体，人们求助于注射以汞和砷为基本成份的以及含铋的药剂。对此种病的首次进攻长达四年之久，包含有许多并发症的可能。汞和砷有时会引起严重问题，最轻微的是红皮病。但是如果人们低估了这些皮肤病的严重性，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会影响全身。不间断地应用铋和汞，久而久之会引起牙龈疼痛，唾液过多，有时会引起肾炎，因此在每个疗程之前必须反复检查尿中所含有的蛋白。此病经常复发，每次都会造成更大的潜在的危害，最终导致所谓第三期梅毒。

又是瑞士的日内瓦，墨索里尼在1930年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忽觉不适。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他在经过洒尔佛散的一个新疗程之后表现了赫克斯海默反应，洒尔佛散是一种含汞的抗梅毒的传统药物。不管用什么药，治疗初期都要出现梅毒病变突然和暂时加剧并伴有高烧和经常昏迷，结果神经梅毒的症状严重。就墨索里尼的症状而言，这种情形表明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或者他对医生的警告曾掉以轻心。人们肯定为此警告过他，让他认真服药。阿姆斯特丹的麦罗博士看到了领袖的旧病复发。他作为荷兰在国际联盟麻醉品委员会的代表，报道了他所亲眼目睹的这一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

希特勒本人也对他的冒险事业的伙伴身体是否有病表示担忧。

他让自己的医生莫雷尔去证实。但这工作并不容易。必须取血和对脑脊髓液穿刺，因为领袖身上的梅毒开始侵蚀大脑和脊髓，这就要求意大利的元首甘心情愿地接受检查。然而墨索里尼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干预，莫雷尔博士无奈只好放弃。

1939 年夏末，元首还在为别的事情操心。虽然他知道有引起全面战争的危险，他还是决定空袭波兰。他并非不知道波兰和两个强大的盟国，法国和英国，保持着友谊，甚至法、波之间还有一个互助条约。进攻波兰，希特勒便使英国和法国被迫参战。不过，他曾用四年的时间来衡量他们，虽然并没有借助于心理分析。他只不过估量了一下他们头领的软弱以及他们的政治平庸。果然，张伯伦目瞪口呆，达拉第窘迫无措，甘默林垂头丧气。

下面的事情证明了元首看法的正确性，它发人深省。上一年，一场严重的危机使希特勒和同盟国对立起来。那是 1938 年 9 月。帝国的主人成功地并吞了奥地利之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自动放弃苏台德。显然这是引起冲突的酵母。法国和英国可以动员起来将希特勒摧垮，它们拥有这种能力。但希特勒预见到达拉第和张伯伦会犹豫不决。他们的态度超出了他的希望，他们主动到慕尼黑来拜伏在他的脚下，他们在他及墨索里尼面前，为了所谓和平而卑躬屈膝。交易的结果是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这块希特勒所觊觎的土地。除了这个可悲的决定使希特勒强化了他的霸权主义扩张之外，这次会议召开的环境也使人不能忍受。

实际上是内维尔·张伯伦自己要求进行这次屈辱的会见的，事先他既没有征得内阁也没有征得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更没有

征得英国议会的同意。他通过私人电报打往柏林，急切地要求这次会见。他在9月19日写给姐姐的信里说："我就这样发了一个决定性的电报，第二天早晨我才把我的行动通知内阁。"希特勒不理解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为什么愿意前来，曾建议亲自去伦敦，但张伯伦坚持要去。他又向姐姐解释道："他放弃了可能使我感到不快的计划，否则我这一着便失去了它所有的戏剧力量。"

的确是戏剧性的一着，然而却打在和平事业上，打在人们身上。张伯伦的老年性冲动使英国的外交战略陷入停顿，也加剧了欧洲压力的不平衡。与英国首相相反，外交部以及英国的许多议员在丘吉尔和艾登的带领下却希望尽快对希特勒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后来对丘吉尔说过他曾空等一场。如果西欧能对希特勒的阴谋进行抵抗的话，斯大林说，苏联无论如何不会在1939年和德国签订协定，苏联甚至可能和英国达成一项协定，我们之所以转向德国，因为德国在我们的边境过于活跃了。但是"如果"并不等于政治。张伯伦十余年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现在忽然大发幻觉，他的一番胡言乱语解放了希特勒的手脚，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同时，1939年9月，刚刚对德国宣战之后，世界上所有有头脑的战术家都认为法国军队肯定会毫不迟延地渡过莱茵河直扑柏林，并且最近的法波条约已经规定了这一行动，条约说："在总动员的15天之内。"军事情报证明纳粹不足道的抵抗，它既缺少装备又兵员不足。从此之后，它所赢得的每一个喘息都会增强它的力量，而甘默林给了它这一时间。在这一点上，同样，如果法国将军当时没有莫名其妙地一拖再拖，事情的面貌将是另外的样子。但是，"如果"不

等于历史。1938 年和 1939 年一样，执掌政权的是张伯伦、达拉第和甘默林。因为他们，世人认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

过去，是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使人一目了然。在伦敦，张伯伦毫不隐瞒他与时代难以协调。他为了证明自己厌恶战争而把英国军事力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这种现象长达两年。今天战争来临了。国家和丘吉尔及艾登一起同他算账。他吞吞吐吐。他想求助于美国，但美国正陷入孤立主义的包围之中。他的部长议员对他骂不绝口。他于是像一个精神盲目病患者，对批评警告无动于衷，成为更为顽固的摩尼教徒，他的内部世界倾倒了。

他没有估计到事情会发展得那样快，人们还守着秘密。当他 1940 年去职的时候，人们把他送进医院。7 月的一次手术检查表明他患有结肠癌。他死于 1940 年 9 月，死时确信英国将受到德国军队的入侵。

肠癌不是两三天就能形成的，当病人经常是通过出血知道的时候，它已经至少存在两三年了。张伯伦的肠癌在 1940 年 7 月被断定无法进行手术治疗。人们经常发现的不是初期的癌，而是已经转移了的癌，其中某些到了脑部，在那里形成栓塞，正像严重的动脉硬化所产生的阿尔瓦莱兹病引起的栓塞一样。它们将会影响运动和感觉功能，打乱人的行为。不管这种癌的表现形式如何，张伯伦早已经知道他的病，1939 年慕尼黑会议以前，战争尚未爆发的时候，甚至也许在他于 1937 年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当时他的部长们指出他有某些变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公民的荣誉，如果这句话对政治家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他就应该及时引退。

在巴黎，战争一开始，达拉第也同样证明他在危急关头不适宜担任总理。这头乡村公牛寻找篱笆的保护，为了溜走而寻求栅栏。他对运动战的发展一窍不通。他对那些为了拯救法国而向他献计献策的人们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那些政治心理专家，他们对他没有看错。

诚然，他们认为达拉第不乏敏锐和利用直觉作出判断的能力，但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漫长艰苦的过程。那些杰出的国家元首都能做出突然的决定，他们久经考验，不受外界骚乱的影响，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怎么能同他们一样呢？他让德国哲学家歌特弗利德·莱布尼茨所说的“细微的感觉”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因为他智力缺乏灵活性，他便等着通过一种隐秘的不断的工作让那些“细微的感觉”把他引向行动。这是丧失意志、精神不健全的人的做法。并且在此期间，只要他没有对周围的人的压力作出让步，他便朝令夕改。他怎么能在别人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呢？他不能。他的政策总是由于有矛盾的力量而难以保持一贯性，但是他用手段掩盖他政策的改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慕尼黑代表法国讲话，就是他应该挫败希特勒。

法国议会本身也很软弱，既然把权力都给了他也只好依靠他。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大权独揽的人，但他没有野心，虽然他权力无限，他却必须强迫自己使用全力，这时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内心缺乏热情，他没有计划。他自己缺乏意志，他认为这一点人人有目共睹。他不安，胆怯，重视自己的权威，却又多疑，寡言，他既没有独立的智慧又没有独立的性格，自然他对那些了解不深的人不敢轻易相信，

因此他的亲信，虽然人数有限，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钟爱甘默林的原因。当人们把等待中的八个月称为“奇怪的战争”的原因渐渐明确起来的时候，法国军队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在他们的阵地上过着假日野外露营一般的生活。这八个月大大帮助了希特勒，而对法国来说却是致命的。

榜样不是来自上面吗？1939年9月，法国军队的领导人甘默林将军在干什么？他跑到巴黎郊外万森的堡垒里躲了起来，把那儿变成了他的指挥部。希望来听取指示却空手而回的戴高乐将军说那是一座“修道院”，因为最高统帅在为数不多的军官的包围下沉思着，那些军官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喜欢沉默。最高统帅的皮鞋擦得光可照人，无所事事。他没有电台，没有电传机，甚至没有信鸽以便和那些按着他的意志留在一动不动的前线的下属取得联系。他讨厌这类快速的联络工具，他只相信电话。没有军用电话，而是民用线路。当希特勒发起战斗，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的命令要48小时才能到达命令接收人。

他从1935年起建立了这样一支一潭死水般的部队，部队不应该打乱他的习惯。那些经过重重困难得以接近他的人发现他的话和他的行动令人惊奇地漏洞百出。他的身体看起来不很好，但只要一开口，他便再也闭不上嘴。那些语言跟不上思想的人便有时会这样。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智力缺乏连贯。综合、明白、准确，对他来说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不断地自相矛盾，记忆中出现空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断了电路。那几名可以接近他的医生很快就指出他的智力严重的代偿失调。

他被一种憎恨折磨着，这就是法国军队的前任首脑菲利甫·贝当。每当他起草任何一个有关元帅的文件，他都要把元帅这两个字放在引号里，似乎他否定后者带有这一头衔的权力。虽然他与他在战略上观点一致，但他仍瞧不起他。坦克车使他高兴，同样也使贝当高兴，但 75 大炮可以挡住它们。峡谷和阿登森林足以阻止它们前进，他说。真正的力量是战壕中的士兵，他曾经这样写道。他搞错了时代，他还以为是 1914 年，因为他始终留恋过去。当达拉第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的无能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总理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德康将军对外交官乔治·博内抱怨说："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在他送来的报告中只有同意、反对，黑和白，从来也没有坚定的观点。"甘默林不能再控制他的思想了，他患有某种精神分裂症。他之所以继续留在指挥部里，那是多亏了达拉第的缘故。但他的保护者任政府首脑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1940 年 3 月 14 日，法国议会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批评政府首脑在德国面前的军事被动以及外交的无所作为，因为俄国刚刚侵入芬兰。达拉第透露如果不是英国的反对，他肯定已经向苏联宣战了。甘默林甚至准备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以夺取高加索的石油，这样就能把苏联巨人窒息。即使事情已经过去，这两个领导人，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竟然糊涂若此，使人不寒而栗。3 月 30 日，法国议会决定把达拉第解职。已经太晚了。他的后继者保罗·雷诺无法扭转一个难以控制的局势。

新总理立刻遭遇了甘默林。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很是有趣，虽然它预示着不幸：

"军队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总理先生。"

"它能干些什么?"

"干不了什么,总理先生。"

对卷入总是怕得要命。保罗·雷诺受不了这种态度,也受不了这位将军。他生气地说:"这是位省长,是位大主教!但绝对不是一个司令官!"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国人铺天盖地而来,侵占了法国。他们的坦克从阿登通过,无论是森林峡谷还是 75 大炮都没能阻止他们前进。甘默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根本没有进行反击。他怎么能呢?他把很大一部分队伍送进了虎口,派往北方的安特卫普,目的是为了支援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这次调动是他的重大错误之一,因为他破坏了整个东北战线的稳定。

丘吉尔不满地抱怨道:"甘默林在长达 800 公里的战线上没有准备任何战略后备军!"联络的可悲状况造成一场灾难。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军队的首领就下令电台保持沉默,他只用民用电话,没有任何安全可言。从 1940 年 5 月 16 日开始,德国的侦察兵开始剪断空中的电话线,从此甘默林与前线军官的联系被迫切断了。谁应该首先受到谴责呢?是他,最高统帅,他应该负责。他一动没动地等着这种状况的到来。

这表明他的智力衰退、他的判断错误以及他日趋严重的记忆混乱,使他比以往更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他正在进行的,确切地说,和他没有进行的战争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到最后才将

空军投入战斗的原因,因为他连飞机也觉得靠不住了。他陷入了一种麻木,默想着他的失败。最后当他于 1940 年 5 月 19 日被解职的时候,他以法国人和基督徒的良心认为他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地方。

有人说他是被出卖给了德国人,这些人是受了表面现象的迷惑。在这一点上,人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医疗档案中知道他行为的秘密。像墨索里尼一样,甘默林将军也是神经梅毒的受害者。

或许他也同样受着类似阿尔瓦莱兹病的全身血管硬化的影响,脑部接连不断地出现微量出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智力衰退,分析力减弱,叙述问题啰嗦,拐弯抹角,只注意枝节以及他判断力的丧失,估计错误,需要求助于贝当的保护,虽然他还同时批评贝当,最后还有记忆的混乱。然而有一件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他是在 1958 年死于麻痹性痴呆,这一神经梅毒的最后阶段。

病是 1930 年以前传染上的。甘默林将军在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神经精神病科住院治疗。开始医生们用常用的药物治疗,因为当时还没发现抗菌素,这些常用药物是汞、砷、铋,但是科学没能控制病状,神经纤维受到影响,引起潜伏性梅毒脑膜炎,即大脑及脑膜发炎。

像许多被现代医学所拥有的巨大的化学药品库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的疾病一样,神经梅毒及其后果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多年以来,自从青霉素广泛应用之后,并且由于没有患者,人们已经不在阶梯教室里向学生们谈这些危险的病例了。但是在上一世纪末期以及我们这一世纪的头几年,这种病是引起幻觉的主要原因。

像甘默林这样的病人表现出晚期严重的神经损伤，伴有一系列的精神病症状。例如行动反常，紧张度丧失，不负责任，性格变化，欣快症，怪癖，有时会出现过度活跃，但总有一种躁郁—自大狂谵妄，还有批评精神的丧失，行为严重的不和谐等等。概括这一切，医生称之为"麻痹性痴呆"，虽然神经梅毒患者依然行动自如。这种病有三种迹象，并且人人可以看到：病人面部没有表情，语言混乱，四肢颤抖难以控制。这些迹象表明大脑存在混乱，主要是存在于大脑正面，伴有脑室扩张。经过几年的演变，麻痹性痴呆可以致死。

证明神经梅毒习惯上的症状之一是病人的眼睛。病人虽然依然保留着调节和会聚反应，但是瞳孔经常是收缩的，这种收缩反映了虹膜的神经支配紊乱。病人的瞳孔对光线不能再作出反应。另外两种反应，踝和踵的腱反应亦不复存在，表明病势扩大。1932年，甘默林将军的麻痹性痴呆有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危险，例如偏瘫，耳聋，心脏受损，肝、胃和肺部受损。于是那一年以及 1933 年，医生们为了控制这种病，决定使用当时的一种新武器，即使病人受染疟原虫，也就是发热疗法。我们曾经就此询问过甘默林住过的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医生。

1930 年首先提出用人工控制的疟疾来治疗麻痹性痴呆的是维也纳的一名奥地利研究人员，瓦格纳·冯·约莱格博士。他同别的学者一样，已经注意到有梅毒病的疟疾患者很少有人得麻痹性痴呆。发热疗法似乎是通过热冲突而起作用。

冯·约莱格说，"应该应用间日疟原虫，而绝对不要用恶性疟疾因子。"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医生从一个疟疾患者的肘弯静脉

中取出三至五立方厘米的血然后立刻注射到甘默林将军的静脉中去。疟疾的潜伏期有时可长达20天，接着出现的是侵入性高烧，这一高烧可持续二至四天，温度可达40或41度。在两次发热之间，温度可以恢复正常。医生让病人发热10至12次，一边密切注意着他总的状况。他们通过每天注射1至1.5克的奎宁中断疟疾的发展。一个星期之内，高烧消失。剩下的就是用砷或铋等通常抗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了。发热疗法的作用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感觉到，但它很快地改善病人的体力，去掉精神症状。谵妄停止了，记忆恢复，感觉复归稳定，理智与智力活动也得到恢复。但是这种改善持续不了多久。当严重的混乱再次发生的时候，必须再次应用疟疾疗法，久而久之，发热疗法就会失去效力。

这种办法使甘默林将军得以在1935年成为法国军队的主宰者，它长期地掩盖了神经梅毒所产生的不适。但是随着将军的衰老，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这种精神分裂今天依然可以从甘默林三卷回忆录中看到。他的思想混乱令人吃惊，他是夸大狂与矛盾的混合体，意义杂乱令人感到难以接受。最高统帅病态的思维可以让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引为例子，用以证明苍白密旋体所引起的这种对思维结构缓慢的破坏。

读到他的回忆录，人们看到他是一个牺牲品，他本有运气夺取胜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德国，希特勒垮台，他的部队向柏林镇压那些对法国产生恐惧的军队。但是什么东西卡住了。甘默林于是耍了花招，把时间弄乱，否定他说过的话，虽然已经被别处录了

音，并忘记了条约。德国人之所以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法国的思想，特别是贯彻了关于应用装甲车的思想。而甘默林拥有最好的装备。德国人以他们的技术优势赢得了闪电般的成功。如果说他被战败了，那是贝当、魏刚和不听话的乔治将军的错误。他的话可悲，但更可恶的是他认为参谋部的软弱不能为战败负责，罪名应该由政治家们、工业家们，特别是应该由那些不相信战争的法国普通士兵承担。

这个头脑昏昏的已穷途末路的老者，当人们在他身边提起往日那些可悲的事情的时候，他却愤愤不已，他死于巴黎。

达拉第也于 1970 年死在他的床上，但 1946 年他又一次被选为议员。这一点说明人们仇恨并不多，容易忘记过去。墨索里尼在 1945 年 4 月 28 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员枪毙。他的尸体被吊了起来，绑着双脚，示众了多日，那些来看的人们，在他光荣的日子里，曾向他的夸夸其谈报以微笑。

希特勒的身体在 1940 年以前一直很好。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医疗卡可以作证。那一年的 1 月，他的血压是 140/110 毫米汞柱。糖尿病与梅毒的检查结果是否定的。元首身上似乎存在的潜在同性恋倾向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正常的性要求很少。这种性欲不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原因，并非因为他的隐睾，即他的阴囊缺少了一个睾丸。这种并不严重的畸形只能使一名少年感到自卑。希特勒与埃娃·布劳恩所保持的近于柏拉图式的关系外表看来对他很合适。他们在死之前的几小时才正式结婚。

根据莫雷尔的记载，希特勒有时血压高达 200/140 毫米汞柱。

1941 年，元首得了轻微的心脏机能不全，浮肿出现在脚腕上。从此之后，血压不断上升，也许因为希特勒的咖啡和去氧麻黄硷的用量太大，等于德国飞行员的用量。当时帝国元首以为自己真的得了心脏病，他曾对他的部长和建筑家阿尔伯·斯佩尔说过。

他于 1942 年最终有了高血压病，结果引起接连不断的头疼，记忆力丧失，同时出现了帕金森病的首批迹象，这是由于大脑受损引起的，其第一个特征是有一种特殊的颤抖，特别是表现在手指上，第二个特征是肌肉的不灵活，使病人行动特别僵硬，双腿微弯，身躯前曲，手臂半张半合。柏林医学院神经科的德·克里尼教授作出了这种判断。当他面前没有公众的时候，他靠着一根手杖走路。

元首这些严重症状的产生似乎与当时他在东方战线上所遭受的严重挫折相呼应，东方战线是他惟一关心的战场。那时候，每当他离开柏林，几乎总是到他东方前线的司令部去。人们知道 1941 年以后，他对德国军队最高指挥部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起初他想占领莫斯科，随后他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主意，又命令他的部队扑向南方的高加索。他拼命拉长他的战线，到了几乎难以联系的程度，他的部队虽然不断深入，他的后方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苏联游击队不断地进行袭击。按照他的命令，列宁格勒被包围，虽然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但他想摧毁它，自然是因为它的名字。正是出于同一原因，斯大林和苏联人在那儿进行了抵抗，决心不把它交给敌人。同时希特勒还把冯·鲍鲁斯调至斯大林格勒，这一次战术选择是有原因的：斯大林格勒封锁了东去之路。德国军队在这场疯狂的战役中丧失了它最精锐的力量，它在此地的失败标志着它全

面崩溃的开始。

很容易把希特勒这些灾难性的指示归罪于他因为生病而犯的错误，如果这样，则把他的这一面夸大了。在战场上，德国将军们依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们是败在苏联人手下，而并非因为元首生病。

从 1943 年秋开始，相反是他自己精神和肉体上对他的士兵在俄国土地上的失败感到痛苦。阿尔伯·斯佩尔的回忆录写道："他表现出智力僵化的迹象，痛苦的优柔寡断，咄咄逼人和经常发火是他的过度疲劳和与世隔绝状态的特点。过去，他无须费力便可作出决定，如今他要大伤脑筋了。"

1944 年，他右眼染病，玻璃体出血，但是视网膜没有受到影响，这表明血压虽然不断增高，却没有形成恶性。不过同年 9 月，希特勒患了一次黄疸性肝炎，身体受到削弱，医生给他做了一次心电图。心电图表明心脏左心室过于疲劳，其体积大为增加，似乎心脏肌肉要竭尽全力才能将血液送到血管。心脏专家认为冠状动脉组织硬化，心室难以充满。所有这些症状表明高血压的发展，使人感到有心肌梗死的危险。

艾尔文·基辛博士 1945 年 2 月也被召去参加会诊，他看到元首抖得更加厉害，他不能再使精神集中了，他的记忆力消失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复两遍，他被不时发作的癫痫一样的抖动所动摇。那时他 56 岁，他迈小步走路，拖着双脚，经常要坐着。他嘴里分泌大量唾液，直流到嘴角上来。这些表现更使人确信他是帕金森病患者。

显然，这个人的身体在愈来愈急剧地衰弱，这种衰弱对他毫不留情。很快他就将到这样一种地步，只要身体出现一点偶然的事故就会夺去生命。某些人也许会对他危险的疾病发展得这样快感到吃惊。沃纳·马塞认为是亨利希·希姆莱搞的鬼。马塞的看法是，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以及集中营的组织者，这位希特勒最早的战友之一，想要尽快地秘密地搞掉元首，其办法在由他指挥的几名医生的帮助下使用有毒药品，其目的是取而代之。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这一看法的佐证：对医学和药物畏之如虎的希特勒竟大量地服起药来。但是马塞又说："无论是阴谋家、疾病还是药物都没能消灭元首。他又活了数月然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不能忍受亲眼看到他建立的可怕统治瓦解，他认为它应该永存。

7.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男爵查理·麦克莫朗·威尔逊，更为世人所知的称呼是莫朗勋爵，在他轻松的时候暗示说，医道是他的家传，他总也摆脱不了。在他的故乡，北海之滨的约克郡的斯基普顿，他的父亲约翰·福奇·德·威尔逊就已经行医了。1914 年，他结束学业，应征入伍，当了军官，但还是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正驻扎在法国的皇家第一火枪团。1917 年，他被调至设在（滨海）布罗涅的英国第七野战医院。他一直在行医。

复员之后，他想松一口气。这时，伦敦的圣玛丽医院要找一位会诊医生。于是，他成了那里的院长。1919 年，他娶了多萝西，她的家庭亦出医生，其父即一位。皇家医学院从 1920 年起就在物色一位院长，请他去。他会让朋友们为难吗？此后 25 年中，他一直担任这项职务。当理查德·约翰·麦克莫朗传给他曼顿男爵领地的时候，同时把培养政治志向的客厅的钥匙传给了他，他以为命运屈

服了。然而，他的第一职务是当卫生大臣的顾问。不过，在他担负的使命中，医术毕竟多少退居外交之后。

尽管如此，艾斯古拉珀还是保持着警觉。1940 年，政府召见了他。张伯伦因病智力受到损害，他从中引出教训，认为此类事情不应再度发生。一位国家首脑不能没有医疗监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愈演愈烈，英国似乎受到德国登陆的威胁，这是一场灾难。于是，破天荒第一次，内阁负责给新任命的首相指定一位医生。当局开诚布公地通知了莫朗勋爵。一项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他。他要留神关照的病人将让他几乎得不到片刻的休息。此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命令难道是可以讨论的吗？有时候，一个人就这样成了国家元首的医生。这是大不列颠的原则！

这位医生和他的病人的第一次接触，对他们此后的关系并未预示出任何良好的东西。当莫朗勋爵到了唐宁街 10 号帝国首相府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让他在候见厅里等了足足一个钟头。看到人家强加给他一位这种性质的助手，他心中不悦。他终于接见了他，他低声抱怨着，从他那古式的、半月形的小眼镜上面看了他一眼。但要镇住莫朗勋爵，这样却不够。像许多英国人一样，他对这个他要与之休戚与共的人的生涯也知道个大概。70 年来，丘吉尔家族的名声远远超出大英帝国的疆界。

先是父亲兰道夫，伍德斯托克的众议员，他娶了詹妮·杰洛姆，一位纽约州布鲁克林的美国人，他们携手激烈攻击帝国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然后，他建立了托利党保守派政治运动，成为众议

院领袖。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家。随后是儿子，温斯顿。70岁执政。他喜欢风暴，如鱼得水。他是在伦敦郊区著名的哈罗公学的戒尺下，继而又在桑赫斯特军校培养出来的一把钟锤。他曾在西班牙的瓦勒里雅诺·魏勒将军麾下，在古巴打过仗；跟随基奇纳，参加过喀土穆远征。他作为临时士兵，曾在德兰士瓦服过役。他先是在奥德姆当保守党议员，继而又当自由党议员，曾以殖民地事务副国务秘书、商业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身份大吵大闹，震动了议会。他喜欢的是在行动中自我欣赏。他在镜子面前装模作样地背演说词。早在1902年，漫画家E·T·里德就在著名的幽默杂志《笨拙》周刊上画过他的这种姿态。

人们并不把他当成一个大政治家，认为他过于喜欢冒险。他哗众取宠，而不那么关心治理国家。何况他自己也这样写过：他喜欢追逐名声的响亮，一直追到炮口里去。他是个孤独的人，从未心甘情愿地服从过党派的纪律，而党派是要求尊重其指示的。他除了帝国之外，批评一切。他欣赏大英帝国。但是他对失败的事业过分地热情。例如对爱德华八世，1936年，他宁愿退位，娶那个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沃菲尔德，当了个普普通通的温莎公爵。新王乔治六世现在想到丘吉尔当了首相还颇不习惯，直到1941年才改变了看法。好在当时主要是打仗，而不是政治。而在战争中，丘吉尔感到驾轻就熟。他会动员群众，找出通俗的语言点燃人们的热情。他不是一直让国家警惕着希特勒吗？他刚刚在1940年痛斥过屈服于此的那些人："当你们想以屈辱为代价得到和平的时候，你们得到的是屈辱，而不是和平。"

丘吉尔对莫朗勋爵冷淡的日子几乎是一晃而过，他是一个外向的人，当他知道怨恨没有根据时，他心中的不满也就消失了。他甚至对医生产生了友情。即使是战时，他也一直保持着穿戴高雅的爱好，有时甚至流于怪癖。他那块爱德华式的怀表从不离身，一根粗大的金链横过华丽的背心。无论是什么环境，他总要每天洗两次澡，一次在早晨，一次在午睡以后。他说，午睡保证了他的活力。这使他有鹤发童颜之相。他胃口极好，望着开始发圆的肚子颇感满意。他酷好威士忌和套有印着他的名字的纸环的黑色雪茄，谁要说这些东西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他就赌起气来。他容不得第一流人物在他身边。他需要的是安东尼·艾登一类的二流人物。他也需要活跃的、令人兴奋的朋友。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他冲动，雄辩，擅长文字游戏，交替用恶意的讥讽和暴躁的脾气。他对于表露感情的渴望，他的令人惬意的发作，他的快活，构成了他的举止的第一个侧面。但他也有忧郁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他有他的"沮丧"。这两种形式的心理障碍是躁郁症患者的特点。在某些患者那里，这种障碍发展为精神病，亦即精神错乱，成为严重的疾病。在丘吉尔身上尚不严重，但一直是看得出来的。

障碍来源有三。首先，这个走红的贵族之家的金色果实过早地失去父母的关切。丘吉尔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就生了下来。他的母亲詹妮麻痹大意，不顾妊娠，竟参加了一次围猎，不幸跌倒。她太热衷于社交生活，经常陪同丈夫出远门，所以生下他之后也并未成为一个体贴的母亲。丘吉尔由一位奶娘养大，他一直到死都保存着她

的照片，常常颂扬此类“奶娘”。温情的缺乏助长了他的好斗性，过度的活跃和自我表现的需要。

他的抑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不可抑制的发音错误，总是把[ʒ]发成[z]，把[ʃ]发成[s]。这个欠缺使他痛苦，贬低了他。他的儿子说：“在晚年，丘吉尔受得了抑制，而受不了发音的缺陷。”第三个原因来自他从 1917 年军事失败中感到的自卑心理。至少，他在 1940 年执政时才将这次失败抹掉。

当时，欧洲在纳粹的压力下分崩离析。从 8 月 8 日开始，德国人占领了英国领空，疯狂地轰炸伦敦。12 月，他们摧毁了考文垂。三个月中，他们造成 1.5 万人死亡，2 万人重伤。他们也失去了 3 000架飞机。因为丘吉尔抵抗了。他实际上没有陆军，但他的海军和皇家空军还是强大的。他给了自己人希望，他并没有灵丹妙药，他只有言语，血和泪，这在他的同胞中激起了勇气和抵抗。他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解放了一种在多年的政治挫折中积聚起来的神奇的力量。他的文章，他的演说，出色地、令人难忘地表达了他对巨大事件的浪漫主义观点。他摸索着前进，直到 1941 年 12 月，终于看到了他的英雄业绩。他也拯救了英国。

12 月27 日，丘吉尔在他的军事内阁成员和莫朗勋爵的陪同下，到了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20 天之前，日本攻击珍珠港，使美国卷入战争。美国会合了英国和自 6 月份以来遭到德国人首次攻击的俄国。英国首相是去订购武器的，也是为了在战略上与俄国和美国协调一致。这是一场艰巨的考验，也是某种放弃。英国的战斗英雄承认了两个大国的霸权。在罗斯福身边，他扮演了副手的角

色。他玩弄词句的技巧将是最根本的，对大不列颠自认软弱也是一种补偿。但是，让步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应激的后果吗？那一夜，丘吉尔突然醒来，焦虑不堪，呼吸阻塞。胸部被钳住，疼痛向左臂放射。莫朗勋爵很快地诊断为心绞痛，如何演变，不可预见。可能再次发作，引起梗塞或突然的死亡。丘吉尔很镇静，立即判断出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严重性。谈论这次发作，将会在盟国中引起恐慌。询问美国的心脏病医生，靠他们做一次心电图，等于是发出警报。不谨慎总是可能的。他刚刚 67 岁。还是以旅途劳顿为借口，让他休息两天吧。莫朗勋爵同意了，给他开了止痛药平复疼痛，血管扩张剂疏导血液流通和减少心肌对氧的需求。48 小时以后，丘吉尔参加了会谈、宴会和拖得很长的晚会。他缩短了时间，他还是照常洗了澡，对他那样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知道他的习惯的主人会感到奇怪的。为了美国，也为了英国，一次心脏病发作就这样被压下去了。

显然，莫朗勋爵保持沉默帮助了盟国的事业。但是，他作为医生所承担的风险，他的病人所经历的危险，毕竟是令人战栗的。丘吉尔一生中的这次意外长期的秘而不宣说明了给大人物看病的医生常常要面对良心问题。人们就这样以国家的名义引导他们施行一种很恶劣的医道。从公共事务方面说，这有暂时的益处，但长此以往，这种决定对患者来说常常是灾难性的。一种器官被忽视，需要治疗时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总是要以加速损坏来进行报复的。

应该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引起的敬佩该是很强烈的，否则，根据政府的命令负责照顾他的医生不会违抗自己的职责。在他出版

于 1966 年的回忆录中，丘吉尔的魅力显而易见。莫朗勋爵在首相的所有旅行中都陪伴着他，是同那些在困难时刻缔造历史的人所进行的不寻常会晤的得天独厚的证人。他分享他的病人的痛苦和胜利。他看到他的决定如何产生，也倾听他的心里话和秘密。他给他诊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测度努力和感情对一个人的血液流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战争中的英国在他的手指下搏动。一个受伤的、吼叫的、抱怨的、重生的英国，至少，它的头还在转动。

最优秀的批评家们承认，在军事领域内，温斯顿·丘吉尔表现出带天才的直觉。是他，从 1941 年开始，将英国部队投入非洲，然后又予以加强。整个 1942 年，北非一直是地中海战役的主要舞台。这第二条战线，在等待诺曼底登陆的过程中，缓解了德国人在东部对俄国的压力。它拴住了第三帝国最优秀的战士之一隆美尔将军和他的精锐部队。这条沙漠之狐后来被打败。是丘吉尔推动和说服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士兵登上这块大陆。他因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给进入意大利打开方便之门，成为德国人的心腹之患。

首相总是下了这架飞机上那架飞机，颇不吝惜力气。1943 年 1 月 30 日，他从卡萨布兰卡会谈归来，得了肺炎。热度升至 40 度，心脏剧烈跳动，面部充血，咳嗽不止。莫朗勋爵用磺胺杀死致病的肺炎球菌。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同年 11 月，丘吉尔从德黑兰回来，显得疲惫不堪，他在那里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起召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议，宣布了雅尔塔会议。他感到出奇的疲倦，无论午睡还是洗澡都解除不了他的疲倦。莫朗勋爵拿不准。但是他并未叫专家来会诊。然而这正是动脉硬化的表现。它不会使丘吉尔的血管发生堵

塞吗？1941年的心脏意外、升高的血压都证实了硬化的存在。几天以后，一场新的肺炎发作了，伴随有心动过速。莫朗勋爵又一次求助于磺胺，他的灵丹妙药。

1944年8月，在法国北部，德国人在盟军面前节节败退。丘吉尔想去视察意大利战线，那里的第三帝国军队全线崩溃。但是，意大利疟疾蔓延。1943年在西西里，疟疾已经使盟军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失去战斗力。莫朗勋爵提请首相注意，要他事先用一些阿的平，一种有效的抗疟药。他没听从劝告，这说明他已经不再听被他征服的医生的话了，反而征求英王乔治六世的意见，这是第一个错误。接着他又问在意大利的盟军统帅哈洛尔德·亚历山大，后者通过密电回答他，最好是强迫医生吞下他们的药丸。他的赌气证明了军事长官常常蔑视人的健康。疟疾就这样摧毁了盟国在新几内亚的远征军的半数人马：95 050人中有47 534人住院，许多人终生不治。战斗本身伤亡3 140人。武器的命运使丘吉尔避免了这些长官们的愚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了。

1945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周围一片欢腾，而他却流露出困惑的心情。他71岁了，诡诈到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突然产生了无所事事之感。他对感到不安的莫朗勋爵承认，既然无仗可打了，他会觉得厌烦。另一种毒素使他心寒：即权力这块肥肉。当1940年5月人们召唤他的时候，他宣称，一旦冲突结束，他就辞职。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他却不愿意走了。1945年7月进行的选举使他震惊。这是重建国民经济、迎接艰难的新时期，英国人民感到他们需要新的领导人。他们记得，这个他们赖以生存下来的人在战前不是个好

管理者。因此,工党控制了选举。丘吉尔得对他们的领袖,当过他的掌玺大臣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拱手相让。这头专断的老狮子却有民主精神,将多数原则视为神圣。但是他感到明显地受了伤害。从此,阵阵"沮丧"就没遮拦地向他袭来。然而,首先使他泄气的不是精神,却是他的机体。

第一次警报是在1947年发出的。莫朗勋爵虽已解除义务,却依然跟随着丘吉尔,他第一次承认动脉硬化的危害。它逐渐地损害了这头老狮子的健康。视网膜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一只眼的眼底证实了这一点。医生认为是战争年代的应激所致。但他还是强迫他接受一种饱和脂肪低的饮食制度,服用降低血液粘度的药物。

1949年8月24日,丘吉尔正在蒙特卡罗休息,画海景以镇静神经,经受了一次脑病的发作。血液流动中携带的一个凝块,莫朗勋爵称为惰性的,突然阻塞了一根血管。幸亏诊治迅速,破坏被限制住了。

1950年,温斯顿·丘吉尔突然得了运动性失语症,说不了话了。这次意外虽然是暂时的,却说明在大脑的某处一定有一根动脉毛细血管破裂。医学上当时还没有诸如扫描一类的完善无痛的方法对此做出认真的诊断,真正估量将来会出现的危险。自从1927年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埃卡斯·莫尼兹发明脑动脉造影术以来,即在颈动脉中注入一种不透明物然后照像,神经外科医生一直使用这个方法,但是对于一个76岁的人来说,这种方法的偶然性太大了。丘吉尔可以休息了。肯特郡的夏特威尔不是有他一座美丽的庄园,他可以在四周的草场上饲养良种牲畜吗?然而,权力的魔鬼一直纠

缠着他。政治变动又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

1951 年 9 月，正是英王乔治六世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也很早就苦于动脉硬化，危及下肢，有出现坏疽的危险，1948 年 11 月 12 日，人们甚至考虑过截掉他的右腿。这一次，他住了院，左肺出现急性炎症，伴随有高烧和胸疼，医生决定进行活组织检查。检查结果是癌。不管病人血管状况所包含的危险——他于 1952 年死于大规模梗塞——普莱斯·托马斯博士还是摘除了他的病肺。大量失血的国王却还要面对一场分裂英国的政治危机。就社会冲突和建立国民医疗制度问题，国家闹得四分五裂。对外事务方面似乎并不更好。英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冷战方兴未艾，朝鲜也在打仗。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刚刚辞职。于是，乔治六世将选举定于 1951 年 10 月 25 日。保守党重新执政。27 日，行动困难、弯腰驼背、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威胁的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担任了首相。

他的第二次脑病发作是在 1952 年 2 月 21 日。莫朗勋爵掩盖病情严重性的天才是罕见的，他说此种意外没什么重要性。他解释道："此种意外反映出大脑中血液流动的某种不稳定性，而在过度的脑力活动中，血液流动是要加快的。"这是向外行人施放的烟幕。不过，丘吉尔还是被迫放弃了内阁中的日常事务。从 6 月 26 日开始，他不露面了。莫朗勋爵决定公布一份多少有些说谎的公告。他谈到血液流动紊乱，引起眩晕，需要去百慕大群岛疗养。实际上，是第三次血栓形成症，压倒了他的病人。

从此，首相控制不了他的大脑了。他估量不出病情的严重性，看不到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的口头表达不流畅了，用词不准，混淆

日期,记不住事。1953 年 8 月,莫朗勋爵建议他减少工作,考虑辞职。后来他又清醒了,明确地说,如果这样撒手了,失望和抑郁反而会加重。蜜和酸能掺和在一起吗?丘吉尔的顽固和恋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两个月之后,丘吉尔夫人看到她丈夫心理能力退化得如此严重,吓坏了,迁怒于莫朗勋爵,指责他丝毫未曾劝阻首相不要继续他的不理智的职务了。丘吉尔得知此事,只是点燃他那可怕的黑雪茄,一笑置之。

正是在大脑处于这种状态的情况下,丘吉尔决定再次去百慕大,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与苏联人的会晤,以结束冷战。但是他已无法实现这番宏愿了。因为美国总统身边有他极其好斗的朋友国务卿杜勒斯。冲突对丘吉尔不利,他后来对莫朗勋爵抱怨说:"好像一切主动权都在杜勒斯手上,好像总统并不比肚子发出响声的玩偶强多少。杜勒斯讲起话来像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血淋淋的话总是老一套:跟俄国人会晤不会有什么结果,有也是某种让人憎恨的东西。杜勒斯是个可怕的障碍。倒回去十年,我会同他辩论的。就是今天,我也未曾被击败。我是受了我自己的衰弱的欺侮。您,莫朗勋爵,您已经竭尽一切可能来延缓事情的演变。"医生们将注意到,丘吉尔远离亲人,面对一个不留情面的对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衰弱。在英国,他的大臣们中间,辨别力失调吞没了他。

读一读外国报纸,就可看出端倪。1954 年 4 月,他杜门不出,《纽约时报》谈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议院:"温斯顿先生对自己颇无把握,显得疲惫。这不再是 1952 年的丘吉尔了,仅仅是 1940 年那个伟大形象的影子罢了。在他的回答中,他的话前后矛盾。"一年

以后，他终于被人们抛弃，为他曾拯救于水火的那些人所背弃，但他们也向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当一尊偶像受到不可挽回的生物规律的作用而倾圮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留它在基座上的。1955 年 4 月 6 日，年逾 80 的温斯顿·丘吉尔辞去了帝国首相的职务。他的离去不乏庄严："现在我要回夏特威尔了，我从此不见任何人了，我有许多信要写。"

在他的庄园里，小城堡上飘扬着打上他的印记的旗帜，俨然一艘旗舰，与莫朗勋爵所说的相反，"沮丧"并未吞噬他。这无疑是因为他有颗坚如钢铁的灵魂。他那里宾客如云，否定了他放弃权力时所说的话。他对客人温文尔雅，礼貌周到。他一天之中只有几个小时是清醒的。当他感到麻痹或谈话使他疲倦的时候，他只是拔下助听器。他的手还是那样细腻，气色也令亲人们感到惊奇，还是红润的，仿佛并不受制于岁月。丘吉尔矇眬欲睡，目光茫然，等着开饭。吃饭的时间一到，就又给了他活力。他的充血的眼睛立刻表现出他又清醒了，眼睛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吃完饭，喝完白兰地，吸完雪茄，就拿起他的战争回忆录，为客人们评论某些章节。一下子，他那发出"Z"音的声音又使他领导英国卓越地度过的可怕而激动人心的岁月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1956 年 10 月 26 日，他再次发病。他不能说话，失去了记忆力。但是他又恢复了能力。然而，1959 年秋天对他是残酷的。10 月 23 日，他第五次发病，伴随有癫痫。精神病医生前来会诊，说是恺撒和拿破仑都得过的那"小毛病"。但是，他还是提出一种更为科学的假设：并发症可能源于脑脊膜受了刺激，是在发病时，由于血液侵入包

围着大脑和脊髓的薄膜中所致。1959 年 11 月 17 日，他的脑病最后一次发作，医生以为他完了。他竟活了下来。尽管肉体和精神都大大衰退。

这道强烈的光，知道如何给自由世界带来希望，它就这样，在浓雾中渐渐熄灭。衰落的过程长达 10 年，而且不为世人所知。温斯顿 ・丘吉尔是个无辨觉能症患者，从不相信来世。他只想像有某种昏暗的东西，一种冰冷而光滑的黑暗世界。1965 年，他 91 岁，对他来说，检验这一点的时刻到来了。

8. 安东尼奥·萨拉查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20世纪初，在布拉冈斯王朝统治下的国王们的葡萄牙，穷人和穷人的儿子只有一条出路：为天主教会服务。教会控制着学校、政治、商界和军队。总之，控制着生活。它给它认为有能力的信徒以知识，然后利用他们为它谋利益。请看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人是如何冒尖的。他于1889年生在圣孔巴·达奥附近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是贝拉省的一座城市，四周环绕着富人的葡萄园。

同一时代，西班牙还在波旁的没有定见的族人，阿尔封斯十三的治下，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只有一种职业：军队。军队保证了王国的大贵族们的特权，为他们服务，却不大能启发智力。但是它使人生活得好，有时还对它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真正的野心家打开了升迁的方便之门，条件是他们将自己受托的权力还给它。请看一个名叫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哈蒙德的人是如何树立起权威的，他于1892年生于海军部一个会计的家里，那是在埃尔费罗尔，拉科鲁尼亚的一个军港，地处加利西亚地区，濒临大西洋。命运热衷于推动和磨练这两个人，然后将其引入歧途。它使这两个古伊比利亚的同代后裔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中会合。它使他们成为国家元首，像国王一样，终生掌握权力。这两个专制噩梦的分发者，都统治了近40年。前者后来失去知觉，智力丧失殆尽。机体的大旋涡因无用的、流血的医疗活动而加强，毁灭了后者。

对于出于本能的年轻的苦行者，对于那些一上来就热衷于僧侣的孤独生活，甚至发誓要保持童贞的那些人，人们无论表示多么不信任都不为过。在信仰的外衣下，他们通常都隐藏着一种对女人的反常和病态的恐惧。这正是安东尼奥·萨拉查的命运，他瘦小，热忱，对快乐、对幽默都无法理解。他的眼皮总是低垂着，神情冷峻，活像托克玛达再世。看来他要当一辈子教士了。但是，驻在里斯本的卢西塔尼亚的总主教已经为充斥在寺院里的僧侣伤脑筋了。萨拉查在举行过下级神职教授任礼之后，就成了受教会控制的在俗教徒。他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薪水相当于1 000法郎，研究经济科学，打算日后在科英布拉大学当教授。他有一项使命：做好准备。时候一到，一经需要，他就在教育界为宗教服务。

本世纪初，葡萄牙的教育界恰恰动荡不安。就它自己的功绩而言，这个国家所能指望的，差不多仅仅是富有发现者的光荣历史，它的远洋航行家冒险的成果。今天，消极严重地压在这个国家身上。开发殖民帝国已告失败，这如何否认得了？在本土，重工业并不存

在。由于经营不善，农业还是古老的，并无进步。因此，王国于1910年崩溃，被一个疯狂而脆弱的共和国一扫而去。共和国狂热地反对教会，被自己的过火行为弄得醺醺然。自由派和民主派不听指挥，自相厮杀。16年中，他们发动了16次小革命，有过43个政府。教会弯下了腰，它要在暴风雨中顶住。它从经验中知道，他们是不会长久的。

在西班牙的托莱多，身着军校学生咔叽军装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是其貌不扬。他的相貌上没有任何特点可以预示他的前程。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骨瘦如柴、体质虚弱、西班牙军队中个子最小的士兵。他如何能够发号施令呢？他那狭窄的胸中有足够的气力吗？此外，一种过于奇特的声音对他也是个障碍。他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是由于上声带不能控制的震动，随时都能变得尖锐起来。他秉性忧郁，从不参加小胡同里那些姑娘蹦蹦跳跳的喧闹的盛会。有人想，这是加利西亚人的自然禀赋，或者是信仰，因为他经常祈祷，过分虔诚地信仰宗教。

人们还不了解他，外表脆弱，却内秉风雷之性。他感到自己随时都准备着去完成任何大胆的举动，以消除外表给人留下的可憎印象。忌妒心烧灼着他。他想当海员吗？这个行列接受的是他哥哥，而不是他。他向往着英雄业绩吗？那是他的弟弟，将成为西班牙空军的梅尔莫兹。一种强烈的仇恨暗暗地支配着他。他恨父亲，一个放荡的人，为了跟一个女人到马德里而抛弃了家人。由于一种感情的转移，他对顺从而高傲的母亲玛丽亚怀有一种近乎俄狄浦斯式的崇拜。

他是步兵少尉，装束起来一派孩子气，出发到了摩洛哥，西班牙一直在那儿的沙漠里与叛乱分子作战。死人很多。但是，胆子大的人就能晋升。他是不乏胆量的，这甚至还是他的主要特点，简直使他的上级瞠目结舌。他当了上尉、少校，乃至于中校，率领着外籍军团，可怕的“邦德拉”。他33岁被任命为将军，成为西班牙军队最年轻的将领，也是军队档案中从未有过的最无情、最冷酷的将领。

如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当时也正在炼狱中受着煎熬。骄傲的马德里王国长眠在旧时的岁月中。征服者的时代一去不返。古伊比利亚人的强盛一去不返。经济已经崩溃。暴动、阴谋、罢工和分裂主义却大行其道。阿尔封斯十三是个装腔作势的国王，统治不下去了。军队以米盖尔·普里莫·德·李维拉将军为首，其成员为大会本身的代表，由国王任命。但是，普里莫·德·李维拉也不能控制自由派和专制主义者之间的明争暗斗，被其他空谈家挤走，不得不辞职。国王逃到法国。好斗的共和国与以阿尔卡拉·查莫拉为首的左派重又取得政权。佛朗哥被召来制止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骚乱，他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打击得太重太狠，致使政府害怕了，重又把他流放至摩洛哥。他在那儿冥思苦想，等待着更有利的时机。

这样的时机首先对萨拉查发出了微笑。在软弱无力的葡萄牙，轮到军人对国家事务感兴趣了。人们知道，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最坏的结局。戈莫·达·科斯塔将军开始动手了，很快又被一个同党安东尼奥·卡尔莫纳挤走。国库空虚，经济奄奄一息。他们承认剑和马鞭创造不了奇迹。事情又交给了上帝，或者说教会，上帝的行进

翼。教会说在它的寺院正培养着一个国家事务的天才，他能使国家摆脱萧条。就这样，安东尼奥·萨拉查出面，于 1928 年担任财政部长，虽然他政治上资历不深。

人们看到，他是一个强硬派。他一出马就定下了调子，修补，筹划，拧紧螺丝。四年工夫，他就取得了成绩。事实上，专家们在放大镜下发现，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值不了一张兔子皮。没关系。秩序稳定，国家在前进，但不是抬起脚走路，条顿人才那样，拉丁人总是趿拉着拖鞋走路。他们的腰太柔软，习惯于伦巴舞的扭动，而对整齐的队列所需要的严格步伐却不适应。但是，姿势除外，马达毕竟是被神秘而严峻的萨拉查发动起来了。

他在自己的哲学沉思中发现了一位精神导师。他的确是在睡前阅读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他在玛丽亚面前自言自语，她原是一个神甫的女管家，是他准许留在身边的惟一的女人。他的老师——不，不是柏拉图——刚刚在意大利成功了。他叫本尼托·墨索里尼。他教导的是法西斯主义。这一奇观被六根支柱支撑着。领袖教导说："法西斯主义总是产生于危机。它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使军队放了心。它表面上反对资产阶级，实则与之同体。它动员起不满和拿不定主意的人。它利用民族主义。最后，它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当一个人会玩弄这些词句的时候，他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萨拉查很快就学会了。1932 年，卡尔莫纳将军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但其权力却有名无实，只是看起来威风，而萨拉查却借他的掩护，当上了总理，他终生都担任着这个职务。

几个月之后，年龄与之相差无几的佛朗哥也如法炮制，但他有独特之处。他毫不隐讳他喜欢力量，暴力和——为什么不呢？——鲜血。西班牙共和国摆脱不了分裂、空谈和精力浪费，它濒于崩溃。在摩洛哥，加利西亚的矮小的将军也在阅读墨索里尼，他的肚子已在指挥官的袍子底下变圆了。他喜欢领袖开列的方法。当然，思想方法似乎不大适合他所隶属的那个民族，那是一个痛苦的、因过分赞扬母亲而仇视女人的世界，它把对于怀旧的歌曲、美酒、舞蹈和遗传的爱好从自己的细胞中驱逐出去。但是，人们可以用铁和火，宗教裁判所的武器，使这种思想方法深入头脑中去，从大脑直到脊髓，直到这个民族走上正路。它犯下了大量罪孽，为了赎罪，这是绝妙的惩罚。也许世界会表示震惊？会发出抗议？但它敢走得更远吗？他没有在意大利干，没有在德国干，也没有在葡萄牙干。1936 年 7 月 18 日，得到本土的盖波·德·拉诺将军和莫拉将军帮助的佛朗哥发动了叛乱，他的摩尔军队和外籍军团“邦德拉”登上西班牙的土地。

很少有人不知道当时这场最为残酷的内战造成的损失。有人估计 60 万人死亡，40 万人背井离乡。内战使世人感到震惊。它作为支持佛朗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试验台，试验了现代战争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这些规则削弱了欧洲。自 1936 年始，萨拉查向加利西亚人打开了边界和国库，参与了他的政变，派去拥有两万精兵的维里亚诺军团。这在战场上是个不小的数目。8 000 人死亡，是外国人中最沉重的贡品。1939 年 3 月 17 日，作为这种支持的政治延续，佛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的葡萄牙签订了伊

比利亚条约，正式的期限是10年，实际上延续到两个国家元首逝世。

世界忙于自身的危机，后来就不大关心比利牛斯半岛南部的事了。大火熊熊的世界甚至很快就把伊比利亚半岛看做一个和平的孤岛。

和平？在葡萄牙，在西班牙，死亡在继续着，但那是在寂静的监狱里的死亡。毫无疑问，25万以上的人被处以极刑，或被枪毙，或被绞死。反对派受到追捕，地方主义受到攻击，新闻受到限制，自由这个概念被取消。为了塑造一个新社会，佛朗哥和萨拉查不仅正在连根铲除自由主义，而且还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战持续了他们一生，使他们的同胞麻木了。这是法西斯主义黑暗的背面。它反对改革，只能破坏，绝不能建设，因为缺少刺激，缺少它所统治的人们的彻底参加。它建立在恐怖之上，当恐怖消失的时候，它就要萎缩，直至消亡。希特勒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从1933年起就在德国设立集中营。在两个暴君活着的时候，这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从未蔓延至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过，他们只是不让老百姓看见罢了。说到底，酷刑在这两个国家里是家常便饭，在马德里和所有的西班牙省份中都在实行，在里斯本也实行着，在法院的地下室里，在卡西亚斯监狱的一翼，秘密政治警察国防警察的总部里。

由于他们对怀疑的真正无知，由于他们的僵死的宗教信仰，佛朗哥和萨拉查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们龟缩在神秘之中，卫兵们在他们的住处周围造成一片真空。前者住在马德里附近的帕尔德宫，后者住在俯视着里斯本的埃斯多里宫。他们很少旅行，只相会

过七次。此种国家元首总是害怕他们不在的时候被人取代。他们无时不在,他们知道应该让受到严密控制的人民时刻感到他们身后有教师和他的鞭子。

当然,他们的行为之间也有区别,但那是微不足道的。萨拉查穿戴俭朴,着黑衣,要求人们称他为“部长先生”。佛朗哥却相反,他有“大元帅”的称号,喜穿有饰物的军服,特别是海军元帅服,因为他没能成为水手。他要求他的助手只作口头报告。他讨厌工作、研究、阅读或写作。他的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如山,只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他从未翻开过,从未归过类。萨拉查却拒绝任何与人的接触。他要求记录和分析,真是荒唐的文牍主义。这使他安心。远离他人,他好冥想。

他们的政策毫无结果,这在以后才估量得出来。1960 年,第一批欧洲避暑者首次穿越比利牛斯山,涌向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金色的、空旷的海滩寻找阳光。他们通过颠簸危险的道路穿越两个国家,在 20 世纪发现了中世纪。两个民族在西方世界后面苟延残喘,人口增长率最低,与技术进步彻底隔绝,只能出口汗水和臂膀,去干那种人们最不愿干的收入菲薄的工作。

1960 年,也是严重的疾病开始使萨拉查和佛朗哥衰弱的一年,这说明两个国家为什么迟迟不能从他们沉浸其中的恶病质里解脱出来。佛朗哥第一个被打中。

他的家人常常夸耀他的铁一般的体质。他们在 1975 年时说:“自从他取得政权以来,他只卧床六次。1960 年以前,有两次感冒和一次食物中毒,1973 年有一次严重的牙脓肿,一次肠炎。1974

年，右腿得了静脉炎。"这是真的，经证实，大量地、不适当地使用抗凝剂引起胃出血，导致了静脉炎。司令官的亲信们不能原谅维桑特·吉尔博士，尽管他给佛朗哥治病达 34 年之久。内分泌科医生维桑特·波絮埃洛博士代替了他。司令官流了两公升的血。看来他是死了，但他又缓过来了。他们家不是有人活了一百岁才死吗？显然，遗传起了作用。不过，西班牙国家元首对这笔资本也是很爱惜的，他的生活淡泊而艰苦，他不允许人们当他的面吸烟。

然而——西班牙全国在 1975 年底才正式获悉———种严重的障碍使他衰弱已有 15 年了，那就是帕金森病，即掌管肌肉紧张度的大脑中枢逐渐退化。如果没有他每日使用的 L-Dopa，人们到处用这种药控制此病，佛朗哥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残废。即便这样受到控制，帕金森病还是要败坏患者的精神状态。它使头脑僵化，发展固定的看法，摧毁适应精神，阻碍想像力，阻止对于情况具有一种广泛的认识。这种情况对一个企图领导一个民族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佛朗哥精神上如此瘫痪，他也把西班牙全国推入帕金森病中去了。

自 1960 年始，折磨着萨拉查的那种潜伏性的疾病叫做类精神分裂症。1921 年，德国精神病医生克莱希麦尔确定了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某些人具有与环境隔绝、不相接触的能力，这是正常的，许多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有这种特点。如果再加上行为上的错乱，这种情况就成为病态。萨拉查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心一意研究过去的智力活动，加剧了他的精神分裂倾向，在他的自大狂中出现幻觉的、类精神分裂症的冲动。他与空间和时间脱了

节，总是像谈到一个殖民强国一样地谈到他的国家。他抓住葡萄牙帝国的残余不放。八年中，他进行了一系列昂贵的、无济于事的军事行动，镇压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损害了本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他生活在幻想中，把影子当成现实，越陷越深。动脉硬化加重了精神障碍，人们不知道这个生活淡泊的人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了动脉硬化。

1968 年 8 月，79 岁的萨拉查在房间里摔了一跤。医生们的诊断是，头盖骨下，血肿压迫大脑。葡萄牙政府立刻召请世界著名的美国神经科医生豪斯顿·麦里特。9 月 7 日，萨拉查成功地做了手术，十天之后，他的大脑中形成大规模的血栓，致使右侧瘫痪。他的昏迷状态持续着，使用了呼吸辅助装置。由于大脑供血不足，他的脑子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在医院里住了 50 天，才半死不活地回到府邸。有时候，人们用轮椅推他出来晒太阳。人们让他闪电般地出现在电视摄影机前，向葡萄牙人民表示他还在，尽管他已失去了理智。

他也偶尔有半清醒的时候，但他周围的人一直非常怕他，谁也不敢对他说，马尔塞罗·卡埃塔诺已经代替他，当了国家元首。他一直以为自己还在统治。只有同他一样老迈的女管家有时候谈到辞职和休息。他颤颤巍巍地说："我不能，没有人能接替我。"他不知道他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没有注意到他已经什么都干不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年。1970 年 7 月 27 日，一次严重的梗塞，肾脏同时发生感染，吞没了他。他扔下了 900 吨金子。一个葡萄牙人被从 20 世纪中抹去了。

直到此时，死亡还从未震动过佛朗哥将军。他年轻时出生入死，后来又避之惟恐不及，他从未具体地感到死亡的威胁和被它吓住。萨拉查死后，他感到惊慌的是，前者刚刚在圣孔巴·达奥被埋葬，其威力就如此之快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原以为被粉碎了的自由主义又在葡萄牙抬头。佛朗哥甚至还将看到它又在那边掌了权。他若走了，西班牙将会怎样呢？

这一天临近了，比他认为的还要快。1975年10月初，他在帕尔德宫中三层楼的走廊上，一边做着每日行走锻炼，一边哼唱着："我是死亡的未婚夫。"这支歌是他的外籍军团的护身符。在他的两名护士看来，在他的家人看来，他的身体十分健康。只有他的新医生，维桑特·波絮埃洛博士认为他太瘦了。他觉得他的脸苍白，像蜡一样，危险的征象。这个月的14日，司令官没有出屋。16日，他呼吸困难，吐了一点，一阵隐痛从胸廓放射到胸腔。在马德里，人们说是感冒，事关国家元首的健康，人们都说感冒，这在世界上已经成了惯例。但是，波絮埃洛博士知道，严重的麻烦已经开始了。他在病人身边已有15个月，很了解他的真正的力量和他的弱点。生命力旺盛，但血管受到损害，心脏和大脑受到威胁。随时可能发作，必须提高警惕。

德·维拉威尔第侯爵，佛朗哥的女婿，克利斯托巴尔·马蒂内兹·波尔迪乌博士立刻开出名单，马上召请西班牙最有名的六位心脏病科医生。西班牙医学界中所有在救生和严重品质性障碍方面最有资格的医生都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听用，可以预见到的并发症需要这样做。他自己负责在与佛朗哥的房间相连的一个房间内置

备急救的全套医疗设备。

佛朗哥半卧在一张静脉炎患者专用的大床上，蒙眬入睡，对身边的忙乱毫不在意，那种大床上有机器使之不断颤动，几乎察觉不出来，但足以促进身体内的血液流动。最后战斗的参谋部已经准备就绪，他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就可以给他治病。共有23名医生。世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将要签署100多份公报，无休无止地报告佛朗哥生命垂危，但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老调反映不出这一场马拉松式的治疗该是多么艰苦。1972年，在堪萨斯州，美国医生使前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末日推迟了两个月，西班牙医生也是一样，他们知道将面临一系列战斗，但最终还是要输掉。

一切都是从10月17日将近10点30分的时候开始，那时正在帕尔德宫的二层召开部长会议。佛朗哥贴胸戴着一个小巧的美制电子仪器，外人是看不见的，那是一种为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宇航员设计的心律无线电发报机。几十米之外，三层楼上，医生们在显像屏幕上注意着贴在国家元首皮肤上的电极传来的搏动。会议开幕十分钟以后，电极发出警报：心脏不适。但是，佛朗哥自己就结束了会议，进入他的私人电梯。他的心绞痛发作，需要完全休息。

五天以后，20点15分，左心室出现了急性的关闭不全。多年来，它一直把血液打入被硬化堵塞的动脉里，已经衰竭了，因为不能排空血液，就膨胀起来。随后的两天内，尽管治疗，关闭不全仍然在扩大。它引起了急性肺水肿，这是第一个并发症，随后将有一连串的并发症。由于心室衰竭，血液失去力量，滞留于肺的毛细血管中，引起肺的膨胀，血浆最后也渗出肺壁，形成突然的泛滥，侵入肺泡、

支气管和气管，构成窒息的危险。在氧气和药物的帮助下，佛朗哥陷入半昏迷状态。

10 月 25 日，电台播送一曲低沉的音乐，向西班牙人发出警报。司令官情况不妙。肺水肿虽然已被吸收，但其后果加重了临床病症。浆液通过病人的嘴侵入消化道，引起腹胀，大便滞留。同时，血流不畅减缓了肾的工作。血液中含氮物增多。尿毒症的发作为时不远了。

帕尔德宫中一片忧虑。二层楼上，政府官员们匆匆来去，电梯前上了岗，只有他的家人才能到三层去。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后的结局临近了。不过，医生们并未慌乱。他们还控制着病势。药物将很容易地克服便秘，缓解腹胀，控制尿毒症的发作。如果需要，为了净化司令官的血液，他们可以使用准备好的便携式人工肾。使他们忧虑的是，出现胃出血。他很容易大量失血，这是佛朗哥的致命弱点。他们步步为营，使用止血药，输血浆。在科学的武库中，武器是不缺的。他们分析着，像检阅一样地进行着。但是他们不能列出方程式的，是那种不可解释之事，即生活的意志。佛朗哥的生命力很强。他的脸色又红润了，神智又清醒了。10 月 26 日，星期日，他进入一个令人惊讶的复苏阶段。

友人们大喜，探视增多了，时间也长了。表面上好转持续了两天。但是，引起机体大破坏的心脏关闭不全仍旧存在，甚至在暗中扩大。它将冲出左心室，到达右心室。这是一条无情的生物学规律：一侧出了事，早晚要殃及另一侧。10 月 28 日，血液的滞留使右心室比左心室膨胀得还要快，因为它比后者的能力小七倍。它的血

液倒不出去，也就吸不进各器官流来的血液。血的滞淤快要发生了，这一次在腹部。内脏要受到威胁：肠，胃，肝，可能引起肝硬化，那是致命的。

医生们没有心思再写健康公报了。他们在风暴面前屈服了。严重的肠出血表明，凝块阻塞了肠系膜动脉血管。这个血管网通往门静脉，将肠的血液导入肝脏，血液四散。很显然，这是肠梗阻。这可以引起溃疡，演变为致命的腹膜炎。第一个后果就是腹水，即腹腔内积聚了浆液和血液。肚子膨胀起来。腹膜可能发炎。这时，人们可能认为，在这样的崩溃面前，医生们无能为力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退出去了。

外面，部长们和名流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帕尔德宫。宫门在萨拉戈萨大主教佩德罗·康特罗·瓜德拉多阁下前面打开了。他带来了一件圣物，比拉尔圣母的大衣。佛朗哥的虔诚闻名于西班牙所有的教区。他在一个圣人遗骸盒中保存着阿维拉的圣女泰莱兹的手。它被供奉在小教堂里，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大主教到时，他恢复了神志。他以为跨出那一大步的时辰响了吗？他以为是信仰接替医学的时候了吗？医疗设备被挪开，好让圣物能够在他身上展开。他妻子、他女儿、他的亲人们看见他哭了。随后，他闭上了眼睛。

从这一天起，人们尽可以对佛朗哥将军是否有许多清醒的时刻表示怀疑。健康公报的口气变了，非常珍惜细节，好像不再是一个人对死亡所进行的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紧张的医生对无望之事发起的冲锋，因为在教士们走后，他们又回到了佛朗哥身边。从 10 月 19 日到 11 月 3 日，心脏闭合不全的迹象继续存在，腹水和出血亦

然。由于出血，必须大量输血：输了 6 升血，比这时仅为 40 公斤的身体所容纳的血还要多。医学在节节败退。或者放弃，或者重新发起进攻。

在德·维拉威尔第侯爵的主持下，一个临时的、未经无菌处理的手术室匆匆忙忙地在帕尔德宫院内卫兵营区建立起来，距宫室 200 米远。佛朗哥被抬了进去。第一次手术是在胃部，目的在于制止出血。第二次手术也决定了，施行了，是在腹腔。一共进行了三个小时。医疗小组认为，"成功的希望是百分之一。"

成功什么？血液流通的衰竭继续恶化。左腿发生了血栓——静脉炎。胃重新出血。尿毒症再次发作，不得不求助于人工肾。医生们不情愿地将佛朗哥送往拉巴兹医院。他们还在手术，共输了 50 升的血，切，缝，探，冷冻，试用从设在托雷洪·德·阿尔多兹的美军基地弄来的药品。司令官只剩下一具皮囊，那些机器只要有电就能给他一种生命的迹象。长时间以来，大脑已发射不出波了，他已经死了。1975 年 11 月 20 日 5 点 20 分，狂乱停止了。

对这种医疗上的疯狂，对这种对常理的挑战，不大可能作出解释。政治上，国家的体制并不需要如此，已经采取了预防的措施。继承万无一失，是胡安·卡洛斯，与葡萄牙发生的情况相反，军队控制着西班牙。西班牙的医学从这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传统的、尽人皆知的战斗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但是，也许应该老老实实地让西班牙相信，他们有一位不可摧毁的国家元首？可悲的迷信。

他的亲信们这样做，不仅是偷去佛朗哥的死亡，也违背了他的一个遗愿。他本来愿意安息于距帕尔德宫两公里、坐落在乡间墓地

中的一座花岗岩小教堂内。地方准备好了。只剩下在一块两米长——总离不开自大狂——的石板上刻上他的名字。但是，人们却把他的遗体运到距马德里 50 公里的死人谷内的内战墓地。人们把他葬于一个仓促挖就的地下墓室内。死人的嘱咐，哪怕他是个独裁者或将军，对活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9. 康拉德·阿登纳

“我原本想在乡下当一个公证人，工作不太多，有足够的钱，使我的家庭免除衣食之忧。”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在他统治德意志联邦的最后的日子里，总是这样对他的客人说。当人们恭维他，在那么多人只是养养玫瑰花的年纪上他还工作的时候，他就再添上一句：“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欲望啊。”这番话透着假，他的令人吃惊的脸上纹丝不动，那是一张亚洲人的脸，像一副木头的面具，那不是天生的，而是很久以前出了车祸，骨头动了手术造成的。

认真思考一下，确是令人吃惊。他早年学过法律，如果他真愿意的话，不难当一个外省的公证人。再说，很少有人比他更能主宰自己的欲望。在纳粹主义猖獗的时候，他知道将自己的向往置于冬眠状态。后来，他在73岁的高龄掌了权。

他是在演戏吗？所有的政治家都同演员一样，具有舞台感，即一种表现不是来自内心的感情的能力，只不过一般说来，演员的谎

撒得更好些。然而,假设并不能服人。阿登纳与大部分莱茵人迥然不同;他从未表现出幽默的倾向。

这是否能说明野心从未指引过他的脚步呢? 仍然是个可疑的假设。利他主义者是不会在权势者的宫廷中迷路的。但他们是否如此,自己却并不在意。于是,阿登纳在波恩的绍姆堡宫中发号施令了十五年。

也许这番话并无深意。那个时候,在阿登纳的口中,此类言谈层出不穷。甚至总理 1962 年访问巴黎的时候,戴高乐将军都注意到了,他对他的国民议会议长说:"您看见了吗,沙邦? 您会看到我这样结束吗?"但是,康拉德·阿登纳已经估量不出他冒的风险有多大了,也想不到要由联邦共和国来承受这些风险了。当然,共和国原谅了他,它从他那里受益匪浅。他在 1949 年将它放进洗礼盆,并保证了它的繁荣。然而,他也使它的光芒暗淡下来,因为他未能做到急流勇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不知所措。它不仅已被夷为平地,而且失掉了身份,被分成了两部分。以从鲁贝克经杜德施塔特到霍夫的一条线为界,苏联人占领了东部,足有领土的三分之一。西部分为三个地区,分别由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但是,毕竟有给国家以生气的人从废墟中站了出来。因此,莱茵兰的工业堡垒科隆,发现了康拉德·阿登纳。

在已被摧毁四分之三的城里,本地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相反,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民都挤在临时房屋或某个角落里艰难度日。

大部分人不认识这个渐入老境的人。人们刚刚把他从纳粹的监狱中解放出来,他是1944年被关进去的。1933年,纳粹已经关押了他一年。这位纳粹执政前的科隆市长,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热烈的民主派,从来没有为希特勒效劳过。他退隐了,被软禁了。

当他重返科隆市政厅的时候,已经70岁了。他那张高贵的莫测高深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一望便知。从他年轻的时候起,狭窄塌陷的胸部就使他常常生病。呼吸功能不好,加上肺结核,使他得以免服兵役。周期性的慢性气管炎使他身体虚弱,很容易得伤风、支气管炎和肺炎。他的精神也受过打击。他很快就失去了第二个妻子。他的妻子比他年轻20岁,是白血病毁了她。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1916年,正好在他当科隆市长之前,她得的是肺结核。她很有钱,是她使他摆脱了法官的微末地位,是她使他投身公共事务,然后投身市政。

像他这样可用的市政官员似乎不多。但是,参加管理科隆的英国人不信任他。他们预感到在他身上既有查理大帝又有俾斯麦吗?也就是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疑虑重重。他们在战争中受的冲击太大,不能容忍一个德国人,尽管他出类拔萃,和他们平起平坐,或是想要教训他们。而他正是很快就这样干了,这是因为他的同胞也经受了战争的苦难。这一次,轮到他们尝到他们曾经撒遍欧洲的灾难了。饥荒威胁着他们,还有流行病。阿登纳和占领者之间冲突越来越多。他们终于把他赶出了市政府。

这时,康拉德·阿登纳本来可以退出政界。他不是已进入冷静的年纪了吗?但是,他感到他发达的时候到了。被纳粹恐怖压制的

优势,直到这时才被他感觉到。这样的机会从未有过。几十年中,他压下了自己的腼腆,掩盖了他与人交流的困难,甚至战胜了长期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可以回溯到他当穷大学生的那个时代。一种充沛的精力在他身上沸腾着。它终于喷射出来了,随后是他的骨头架子卡卡作响。他在莱茵兰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

热情的人,神秘的人,预言家总是能控制德国人。希特勒让他们在短笛声和鼓声中走了 20 年,一直到狂热,然后是崩溃。人们以为他们被粉碎了,打折了脊梁,倒了胃口,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个老人用他们早已忘却的字眼,民主和自由唤醒了他们。他命令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向世界证明,他们不仅能破坏,也能建设。于是,从 1948 这个战后最阴暗的年头开始,他很快就把他们动员起来了。

这一年,虽有法国人的某些保留,西方盟国还是把他们在德国分占的地区合并起来了。在东部,苏联人作为回击,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政府,把它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德国人。木已成舟。德国从此成了两块,由一道铁幕分开。在两条平行的陌生的道路上,各自朝着各自的命运演化。第一次危机在柏林爆发,俄国人封锁了柏林的通路。13 个月中,旧都靠着美国人维持的空中走廊为生。在这里,诞生了冷战,并有恶化的危险。但是,1948 年 9 月 1 日,西德各邦被选出的人会集在莱茵河畔的波恩,该地被定为临时首都。康拉德·阿登纳主持了这个非常的议会。这位老先生给新议员规定的时间不多。他们要起草新宪法,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承续旧德国。1949 年 8 月 14 日进行的第一次普选,使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微弱

的多数。自由派特奥多尔·豪斯当选总统。9月12日,他任命康拉德·阿登纳为总理。总理执政,是真正的老板。

四位阴沉的缪斯守护着这个秃头的新生儿的摇篮,他这么晚才加入政治家俱乐部。她们的名字是怀疑、谨慎、轻蔑、偏执。康拉德·阿登纳确实怀疑共产主义和苏联。他的谨慎针对着英国,他对它毫不妥协。据他看,西方的真正强国是美国,他的政策是尽可能与华盛顿接近。他猜疑,好斗,对赞扬和批评同样无动于衷,他蔑视他人的意见。至于偏执,他的家长式的不妥协很快就表现出来。因为他讨厌烟草,他就禁止部长们开会时吸烟。他很守时,也就要求别人遵守同样的纪律。他对礼仪很严格,他就让人在集会时着礼服。他很注意外表,当助手们的皮鞋不像他喜欢的那么亮,他就加以训斥。

这还是一些怪癖,是可以宽恕的,与他所做出的榜样相比,算不了什么。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把建设搞上去,因为有1 400万移民,他们从东部逃出来,缺少住房;要重建经济,改善同西方的关系,逐步取消盟国的限制,创建煤钢联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新的国防军。这就是德国的奇迹,而康拉德·阿登纳成为这一奇迹的灵魂。

有时候,他的左右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他将这种关心视为干涉他的私生活。他不是已从他的医生马蒂尼博士那里获得了全权,即他可以接受领导国家重任的保证吗?别打扰他吧。但是,某种衰老的迹象时或出现。他以为受了虐待:他想像他的电话受到了监视,要求邮电社长进行正式的调查。

同样，他厌恶瑞士，确信他在度假的时候，有人偷了他扔在纸篓里的复写纸，对他进行间谍活动。在精神病医生看来，这种不安是一种类妄想型状态。这是骄傲的人、多疑的人和过分严肃的人的特点。这种情况在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和狂热的改良主义者中很普遍，而在过去，前者会变成弑君者。

从 1953 年开始，阿登纳总理那时 77 岁，就表现出记忆方面的障碍。他常常自相矛盾。但是，他把错误推给助手。后者则抱怨说他很少看他们的材料。他喜欢闲话胜于部长们的报告。当他跨过 80 岁大关以后，他的左右发现他丧失了辨别力，也就是说他对明显的事实都不承认，比方说年龄和老态。他拒绝看到岁月的打击和压力。一些比他年轻的工业家们打算退休，他跟他们闲谈的时候，确信他们是有病了。摄影师们的好奇心使他很恼火，他就让人在他的住宅周围栽上树，但他没有实际的时间观念，他不知道这些树没有 15 年是长不起来的。有时，他命令把那些显出太老的正式照片从流通中抽回来。然而，他的这种半清醒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他坚信他能活 100 岁：上帝不可能把对他的怜悯的限度再往下降了。

但是，尽管他否认，衰弱仍然是日甚一日，逐渐波及到他的肌体和精神。这样，他的行为却近乎疾病的极期了。这是一种缓缓的、不可避免的演变。他的顽强变成了顽固，他的道德上的严格变成了道德上的僵化。他的小心谨慎变成了纠缠不休，他的好斗变成了恶毒。他的思想所遵循的那些模式渐渐地凝结了。他发生了智力上的代偿失调。

这时，他有了强迫型神经病的症状。开始时是悄悄地出现的，

因此他的生活还属正常。但这毕竟在吞噬着他的智力。后来，渐渐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举止的僵硬，生活中的幻想荡然无存。当然，他像许多人那样，长期地抑制自己的冲动。然而，冲动还是压倒了他。他不自觉地反映了出来，首先是在他根深蒂固的反共上面，然后是一个替罪羊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看见他：副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他看来，艾哈德抽得太多，喝得太多，吃得太多，不能继承他，他把他当成了出气筒，恨他，甚至把他当成"纸老虎"。

阿登纳总理很快就把这两种表现推到一种患恐怖症的程度，这证明了神经官能症的不可遏止的扩展。人们知道，恐怖症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纠缠不休的恐惧或反感。对每个病人来说，都是一遇到同一种特定的情况就发作。实际上，它是患者防卫机制活动在其精神上的结果，此种对不确定的焦虑的防卫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病人将其移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东西或思想上，但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病人一看到他所厌恶的人、所厌恶的事或思想，便立刻失去任何客观、合理或理智的分析。

另一种恐怖症患者助长了康拉德·阿登纳的强迫性神经病，此人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担任国务卿，一直到1959年死于癌症。尽管阿登纳一贯自诩在政治上没有思想导师，杜勒斯却一直当着这个角色。六年中，他是德国总理在华盛顿的真正盟友。他们共同反对苏联的外交，调子是美国人定的，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没有莫斯科的先决的更重大的妥协就不做妥协，顽强，坚定。政治上的任何灵活不过是幻想而已。"对共

产主义的恐惧和对副总理艾哈德的憎恨麻痹了阿登纳总理的大脑和反应，他看不出政治和外交中的圈套，他失去了精神上的力量，以挫败大国交易中常见的讹诈。这使他在 1957 年和 1959 年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1957 年 9 月 9 日，他应苏联的邀请到了莫斯科。他不能回避这次旅行，否则，人们会指责他忽视改善东德人的命运的机会，他并未绝了他们回到联邦德国的望。俄国人知道他对他们有一种病态的怀疑。但他们更知道他的新弱点。他们亲切地接待了他，让他在作家高尔基住过的别墅里住了一个星期。圈套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设下的。他说，苏联希望与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保证遣返尚在苏联的德国战俘。而阿登纳是应该知道莫斯科已经与东德有此类关系的。如果他接受，他就承认了东部德国是个独立的国家，确认德国最后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一个没有受伤的斗士将会反击，将会提出反讹诈，甚至向世界良心发出呼吁，以挫败对手。但是，康拉德·阿登纳在赫鲁晓夫的花言巧语下屈服了，他同意了这笔交易。这一天，他的行动真正表明他走上了下坡路。

一个月之后，他证实了他的衰弱。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成就使在波恩的总理大吃一惊，确信俄国人对美国人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他立即与莫斯科的新大使进行了认真的谈话。无疑，要预言这种空间霸权不会持续很久，美国科学会接受挑战，甚至终会在这一领域内居上风，得是个技术人员才行。这种专家在联邦共和国并不缺乏。但也得握有全权的总理肯召请他们和倾听他

们的意见。他不是注意到,在他的保护人福斯特·杜勒斯发起的危险的游戏中,是他最后让步了吗?

1959年,他又证实他的判断力丧失殆尽。这一次是对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憎恨。这一年,在波恩,共和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结束了第二个任期。他引退了。康拉德·阿登纳决定候选。联邦共和国松了一口气,可怕的老头有了最高的荣誉,终于要放弃权力了。两个月中,他准备着竞选活动,这没有任何困难。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他不再领导国家了,他要把接力棒传给他憎恶的政客了。路德维希·艾哈德将成为总理。于是,阿登纳放弃了总统职位,这个职位落到了海因里希·吕布克的身上。他自己关上了大门,这扇门将使他在尚清醒的时候进入德国的历史。

他不顾党内许多人的意见,参加总理选举。由于利益攸关,联邦德国不敢遗弃他,又在厌倦中将他第四次选为总理,这是在1961年。他已满85岁,开始了他最后的统治,这是充满敌意的、丢脸的统治。他卑鄙地攻击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提到他的非法的出身。他公开污辱路德维希·艾哈德。他破坏新闻自由。他多疑,易怒,令人难堪。他使最后一批忠于他的人失望,他们强迫他在87岁的时候在任期内辞职。一次没有光彩、失败的引退。这个偏执狂患者于是埋头写他的回忆录去了。不过,他最终使上帝厌烦了,并未活100岁。1967年4月19日,他得了病,无疑是脑血栓,时间不长便被夺去了生命,时年91岁。

10. 夏尔·戴高乐

1958年法国动摇了，它患了一种难以治愈的贫血症。这是由政治派别使机构陷于瘫痪所引起的。它的政府，由于缺乏空气而只能维持几个星期，无论在本土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后者依然是殖民地，四年以来，穆斯林起义军面对的是一支四分五裂无法行动的军队。国家权威丧失殆尽。

在这种情形下，历来如此，反对派便要耀武扬威一番。一小撮大肆鼓噪，使人觉得一场革命迫在眉睫。有些人则把国家的衰弱掩盖成白血病。而第四共和国觉得的确被深深地触及了。它只好听天由命，像大猩猩一样，生命的本能消失了，它们不再造屋筑窝并且把种族的繁衍放慢。它将接受死亡。然而在沉沦之前，它看到火炬转移到伟大的勇士、退役准将夏尔·戴高乐的手中。他从它1947年诞生以后就一直公开指责它的错误。

某些政治观察家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在导致第四共和国登台

的骚乱中看到了他的作用。他们认为他在上马恩省的科龙贝双教堂为使法国恢复生气所做的猛烈攻击中的预言与这场骚乱呼应得太好了。他们还说，在第四共和国垮台的前几个星期，无数人影在围绕着他的住所的花园里接踵而至，他的住所舒适宽阔，立于洛林高原之上。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假定而已。戴高乐将军是完全合法执政的。由7.6万名显贵组成的选民团以78%的选票选举了他。直到今天，共和国总统仍然由这个选民团选举产生。

重新执政，对他来说已为时过晚。夏尔·戴高乐实际上已经68岁。但法国对此却不以为然。毫无疑问，它看到他已经满头白发，臃肿笨重了，目光被厚眼皮上的褶子遮住，有时似乎显得失望。举止依然高雅，声音变大了。他随意使用那些别人不用的字眼，让人们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身后引起人们比过去更为强烈的崇拜和同等程度的憎恨。这种一冷一热激励着他，这是他的力量的表现。断送国家元首的是冷漠。他刚刚制定了新宪法并确立了第五共和国的存在。他领导法国达11年之久，在他的统治中，他将经历政治和个人的考验，但他战胜了这些考验。

他属于那些天之骄子，他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即医生所说的处于绝对的安宁之中。事实上，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完全逃脱身体的烦恼。他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从不过问自己的身体。伟人们，出于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功绩，正是在这种他们强迫自己身体保持的沉默里觉得与众不同。诚然，抵御疾病需要有一个特别强健的体魄。显然那些超人拥有这个条件。但是，那推动着他们到达极点的权力欲本能和完整的信念，使他们

与平静的人迥然相异,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保护。幸运的戴高乐懂得在身体衰弱加剧的时候抽身。正是在这种宝贵的意义上他的榜样是值得一提的。

通常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对国家元首作出判断而无须费力。他们的名声大小与他们的国家的威望成正比。可是用类似方法来套戴高乐定会引起估价上的错误。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在一个政党内部慢慢成熟起来的政治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人,虽然他一生中穿了许多时候的军装。历史之所以打上他的印记,实际上是因为每当海底波翻浪涌的时候,他便欣然地把自己置身于法国的权力岗位上。

1940 年,当法国在动乱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他虽然不为人民了解,却把握了领导权,并使法国摆脱了耻辱。1944 年,当法国经历过一场为时四年的痉挛麻木而虚弱地辨认自己面目的时候,当它的国土上依然在战斗着的时候,他把它推向了民主之路。由于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工业日益落后,帝国的统治权于 1958 年瓦解,他又一次执掌了政权。但在逝去的 18 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建立了强大的政权。美国被飞速的发展推动着,在西方世界发号施令。苏联发展重工业,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占领空间并在陷入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宣传它的理论。戴高乐将军这一次所承担的使命,更确切地说,是令人扫兴的:确保法国的退却,限制思想创伤,然后使法国再生。

这种时刻准备对绝望的邀请作出回答的精神使人大为不解。

悲剧比平静更富破坏力，并且，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搏击风暴的勇士。对遗传所作的考察肯定会使学者们惊奇不止。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不会在他身上发现任何一点喜欢悲剧的成份。

戴高乐是一个古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能说明他的这种本能。他的父亲亨利是个教授，他为那些准备投考巴黎重点学校的耶稣会会员工作。他教育女儿和四个儿子说，国王在过去给法国，一个历史悠久虽经世纪变迁却威名不灭依然如故的法国，一个夏多布里昂的法国，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他还向他们灌输严肃的道德和无私的精神。他们在这种原则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和他一样，留恋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以天下为己任。戴高乐对人文科学的喜爱得之于父亲，他父亲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除外语外，精通哲学和拉丁文。然而在这种传统式的精心教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具有一种献身动乱的态度。

他在军队中所受的锻炼也不能给人以更多的情况。他是一个十足的墨守成规的人。起初在圣西尔，这所培养军官的基地，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学校，兵营的生活，晋升的台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有价值的是平庸之辈而不是英才。

解释自然来自历史这位慷慨的母亲。有多少命运不在她的掌握之中？伟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直为戴高乐所关心。从青年时代起，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他长久地研究那些雄杰怎样获得政权。例如拿破仑，还有华盛顿、杰斐逊和俾斯麦。他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们能遇到一个事件然后控制它。他曾对美国

记者C·L·苏兹贝格谈过。他很早就仿效他们的行为,开始认真培养自己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以便成为一个坚定不动摇、严肃和具有光辉预见的混合物。

必须有一种水泥才能使混合物粘连在一起。戴高乐在哲学中,在亨利·伯格森那儿挖掘到了这种水泥。他曾在父亲家里多次见到他。对法国的这位唯灵论者来说,人应该把智慧和冲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实干家。他认为这两种动力如果分离则不能使人达到顶峰。纯粹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知识中不能自拔,终至一事无成。而一个全面冲动的人,如果大脑不能控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激动的话,必然会走向荒唐。这一教诲深入了戴高乐的思想。他拥有这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必将扫除一切障碍。

对这个决心获得权力的候选者来说,剩下的就是选择"音域"了,选择将使他的力量获得解放的速度。作为职业军人,他的应用音域很窄:或者利用政变之机取得政权,或者在发生一次深刻危机的时候自发而合法地掌权。第一种可能性需要崇尚暴力、专制和践踏道德。这是他的传统所不允许的。他憎恨党派,憎恨对任何组织的压力的依赖,他于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如果说戴高乐有什么阴谋的话,就因为他是一个离职而随时可以参政的人。他不比别人更命里注定要当国家元首,但这并不妨碍为达到这一目的做过准备。他还必须被国家发现,知道他身后没有党派,总是置身于党派之上。他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约束。他精心地维护着心甘情愿的孤独。一种神秘的气氛包裹和保护着他。

他的第一次机会等了很久,直到1940年6月6日才敲响。那

时他正在和他的第四装甲师,即他的装甲车,和德国人战斗。因为他的战略思想被戴着绣有栎树叶的军帽的同行们所排斥,总理保罗·雷诺把他作为国防部副部长召进政府,暂时领准将衔。他把他派往伦敦以便安定英国人,如果需要还包括海外,使他们相信法国抵抗的决心。拥有合法权力的戴高乐于是解放了他禁锢着的第一次冲动。他留在英国,在那里继续战斗,而继雷诺之后的菲利普·贝当却和纳粹勾结起来。

第二次机会是 1944 年,战争尚未结束。一种冒险的气氛袭击着法国。9 月,戴高乐在巴黎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个政府,这使他得以重建共和国机构。但他看到党派复起,和过去相比,名称和拥护者全然未变。"小锅底下的小火",他经常这样说,他懂得他必须让他们的制度表现出他称之为"危害性"的东西。于是他在 1946 年离开权力,独自穿越旷野,长达 12 年之久。

至于 1958 年的第三次机会,和许多注释家的看法相反,他无需播种风暴的酵母,它们本来就存在着,他只需收获而已。实际情况是军队被失望情绪控制,民族主义者急于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世人。国家柔软的腹部害怕命运的压磨。一队禁卫军人把他召唤到权力岗位上来,他被浪潮推到爱丽舍宫。但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神秘主义,没有给叛乱分子以任何保证。他就这样戏弄了他们。后来他将他们打了下去。他对自己将要消灭的人毫不留情,对他将要欺骗的人毫无信义可言。他并不理会极右派把他看做亲共分子,也不理会左派把他看做独裁者。飞短流长,他不屑一顾。他始终一贯地

孤独、超脱、高傲,置身于混乱之上。

他重新执政显然使多数人民感到满意。但某些人开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不是多次说过他晚来了十年吗?不是说过一个人超过60岁就不应该承担最高职责吗?事实上,他属于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永远闭口不谈的人。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不太注意身体。教养甚至使他强迫自己永远不要抱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上尉曾三次受伤。手、腿,最后是屁股挨了刺刀。但他从不谈及此事。同样,在布瓦斯里住宅,这座他1937的军饷勉强买下的公证人的城堡里,没人敢谈论他有病。他的病,只有一个人知道:安德烈·利什维兹博士,他的私人医生。这个纪龙德人,比他小九岁,来到巴黎,对治疗内分泌腺方面的病症颇有些名气,他是拉里布瓦西埃医院的助理医生,奈伊美国医院的会诊医生。每次戴高乐将军离开科龙贝去首都都要见见他,有时是专门去找他看病的。

利什维兹博士之所以中选并非出于偶然。他的专业直接关系到将军,将军正经受着轻微的糖尿病的折磨。他和100多万法国人一样,都是这种十分普及的疾病的受害者,其特征是尿里含有持久的不正常的葡萄糖。这是糖在尿里的调节功能混乱引起的。自然还有遗传的原因,三个人中有一个如此。

他身体里的这种新陈代谢紊乱,由于小心防备、注意饮食和借助于化学方法而受到控制。将军对威胁他的变性表现无一不知,像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样。这些表现危及周围的神经,引起血管并发症。其中一个是针对眼睛。当视网膜受到影响的时候,则会引起盲目。有时,只是使水晶体受到损伤,即那个每只眼球前面透明的、可

以把外界捕捉到的图像投到视网膜上的透镜。水晶体的变形引起近视、远视、老视和色盲。当透镜不透光的时候便产生了白内障。几乎总是两只眼睛同时受损。

高龄再加上糖尿病。糖尿病于 1956 年影响了戴高乐将军，他那时刚过了 66 岁。决定摘除两眼的水晶体。当时做这种手术还是很痛苦的。戴高乐将军难受了几个星期，虽然担心未老先衰，却也战胜了这次考验。从此他不得不戴上特制的大玻璃片眼镜，但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戴它，以便忠实于 1940 年 6 月 18 日的那个人的传奇形象。不过他不能再清晰地分辨他面前的人脸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些黑影。

做过眼睛手术一年之后，利什维兹博士严禁戴高乐将军吸烟，这使人不能估计血管破坏的广度和范围。他的确吸烟很多，每天三盒 Navy Cut，以纪念他在伦敦的日子。

这份身体检查表可能会使很多人要量力而行。戴高乐将军却由于和权力重逢而热情焕发。从 1958 年起，糖尿病、视力微弱均被他忘记了，权力给予他的快乐使他陶醉。这种快乐使他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紊乱，甚至即使潜伏性破坏还在继续。这些紊乱，由于没有感觉，一点也不妨碍他智力的使用。外表和行动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年纪，但思想的活跃、推理的精细使人忽略了身体的衰老。

他以每天 10 小时的节奏工作着，当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他有时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开始了使他的耐力经受严峻考验的马拉松。在他的第一个七年之中，他通过电台和电视向全国讲话 30 次，他和法国所有的法定社团及市长谈过话，他访问了 2 500

个市镇，作过 80 次旅行，接见过数千人次，举行了 8 次会议，至少与 1 500 万法国人见过面。

在他第一次任总统期间，他的政策的要点尽人皆知。曾经是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独立被确定下来。经过最初严肃地思考军队是否应该长期留在阿尔及利亚之后，他估计到法国的这个最后领地正在成为国家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开始并结束了导致阿尔及利亚获得解放的谈判。在世界和法国，人们对他承认人民中国，他对东南亚的态度，他和莫斯科交换的微笑，又是诅咒，又是赞赏。曾为他写过几本书的法国记者雷蒙·图尔努说他在外交上既无爱也无恨。他或者是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巧妙掩盖，脱身于这些可笑的反应之外。他在这个领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灵活而精明，狡猾地对盟友进行临时选择，使用威胁或者欺骗的手段，总之，他忠实于名副其实的外交传统。他什么也不会忘记，但又表现得不为感情及愤恨所动。法国在他的领导下，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只有它自己的利益。他在这点上颇与斯大林相类。他做出一连串的估计。他反对现代帝国主义并与之斗争，但在这场游戏中，他对美国人比对苏联人更为仇视。他回想起战争期间罗斯福给他的羞辱。他的意识永远不会欺骗他。对于压迫力量他保持着一种绝对自主的态度。在这点上，谁能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元首呢？他把自己永不动摇的勇气、尊严和思想献给了法国的独立和荣誉。

戴高乐夫人对政治的喧嚷漠不关心，暗中照料着她伟大丈夫的身体。她决定他的饮食，让人不要把他的酒杯和盘子上得太满。他没有受骗。当太太们不在饭桌上的时候，他则贪嘴直到满足为止，

例如在朗布依埃打猎午餐上便是如此。

两次暗杀几乎使他死于非命，一次在塞纳桥路上，一次在珀蒂—克拉马尔，此事说明他依然经常受到疯狂行动的威胁。他对此并非不知。他甚至私下对人说这样死去也并非不好。一种瓦格纳式的结局。因为他读尼采太多了，他感到了死亡不祥的诱惑。因此他对 200 名卫士、对 15 名便衣警察和保护他的 5 名保镖感到不能忍受。

他的随从担心他可能会突然死于身体的不幸，从而强化了为他服务的医疗工作。1959 年 12 月，他的弟弟皮埃尔在爱丽舍宫忽觉心脏严重不适而丧生。那是一个周末。利什维兹博士已经离开巴黎。在宫殿入口处门房附近的医务室里只有阿司匹林。两小时之后才有另外一名医生赶到，已经没用了。戴高乐将军亲眼目睹的这一悲剧推动保安部门负责人在军队医疗部门的实习医生中找了两名年轻的医生，每八个月轮换一次，在将军身边轮流守护，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在将军的房间旁边，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间屋子。他们总是携带着应急药箱。他们的任务是进行初步抢救，保证生命不死，等待主治医生的到来或转移至科尚医院，那儿始终有两间屋子专门留给将军。

那位主治医生，利什维兹博士死于 1963 年 7 月 19 日。死前，他向戴高乐介绍了他的继承人，他的朋友，路特维希基金会医院的会诊主任，罗歇·帕里耶博士。

1964 年起始，戴高乐将军的身体就多灾多难，虽然这一年在政治上来说是他的第一个七年任职期间最为平静的一年。他已经 74

岁了。他受着世界末日远景周期性的折磨。他的语调变为失望了。他的左右，虽然深知他会演戏，也不知道他是否是在以此遮人耳目。他使自己的身体硬挺着，这可以从他的身体变化上去估计。早晨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几小时后便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而第二天却又恢复了常态。从此，别人的长寿使他着迷。

他最为害怕的是衰弱和让人看到他那副惨相。像所有那些被一种道德禁锢久了而对身体佯装不知的人一样，他有时也有自己的幻觉。他很久以来就认为他将死于癌症，他把心事告诉了利什维兹博士。1964 年初使他越来越难以摆脱的苦恼是衰老。这种现象，由于他从 1925 年起就已经在菲利普·贝当身上研究过而非常熟悉。那里他是老军人的“代笔”，由他写书，而由老者签名。“我在他身边工作，”他叙述道：“我看到在他身上出现了两个同样强烈的矛盾的现象：老年人对一切的冷漠和老年人对一切的野心。”

老朽不堪的贝当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举止仍然是军人派头，其实不过是骗人而已，思想跟不上了。戴高乐写道：“他的智力没有了，但他仍然不肯罢休。他甚至野心更大。他像一个女人一样，遇到了绝经期危机。野心是老年人一种最后的欲望。”

将军有时能感到这一野心超出了他的智力吗？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他实际上是怎样地注意着自己的身体：他对左右施加压力，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他询问每一个敢于和他谈谈的人，什么时候走还为时不晚。但因为精神受着权力本能的哺育，他的身体所受到的损害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严重。他在 1964 年 3 月 15 日至 24 日对墨西哥进行的正式访问便是证明。实际上他身上有一个瘤子，在

前列腺上。这个男性分泌腺，状似栗子，位于膀胱下面，通常紧紧围绕着排尿的尿道。由于分泌有营养的液体，它对保护男子的精液颇有好处。当一种腺瘤——有时是癌——使它的体积增大的时候，它便使尿道受压，使排尿受阻。它可以引起完全潴留。当它的充血不能用药物和温水浴治疗的时候，则必须动手术。但戴高乐不愿推迟对墨西哥的访问。结果手术推迟，彼埃尔·阿布尔克博士，最有名的泌尿科专家之一，在他的膀胱中安了一根导管。

"在给他放置导管的时候，"这位外科医生写道："他几乎和我一样地了解病情。他对我说他想见见那位制造这种导管样品的医生以便向他表示祝贺。我回答说这大概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美国人。他顿时面红耳赤，向我大声说道：'别跟我说您给我放了一个美国导管！上帝，难道没有法国的吗？'我急忙向他解释样品是经过许可在法国制造的，它因此是法国的。'好，'他说，'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样品。博士，我不愿意让人们知道您给我安放了一个美国导管。您将把这个视为国家机密。'"

不管这种人造器官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更改的，即带着它有时会让人感到疼痛。将军周围的人捉摸着病况的严重性。人们暗暗地观察总统的举止。他毫不畏惧地迈着大步，忘记了痛苦。他的形象超越了自我，他所代表的是法国。

回到巴黎不久，他进入科尚医院。4 月 17 日，他把自己交付给阿布尔克教授的手术小组。让·拉斯内博士是后者习惯的救生医师，负责麻醉。医生扬起手术刀，他切开腹腔，通过下腹部，进入胳窝，切除了前列腺而保存了膀胱，活组织检查证实它并非恶性。

戴高乐将军于秋初恢复了体力，他肯定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9、10两个月进行了疯狂的旅行。25天内，他像冲锋一样，访问了拉丁美洲10个国家。电台和电视上的讲话，丰盛的宴会，飞机上很少睡眠，顶住抗议的喊声，握过数千人的手，在拥来的人群面前从不后退一步，没戴眼镜的病眼对着难以承受的太阳……他想证明什么呢？法国总统在政治上把拉丁美洲看做一个有前途的大陆。他不愿意让它和美国相亲，他希望它也不要滑向共产主义。自然这是虔诚的愿望。那儿和别处一样，由掌握权力的人来发号施令。但他跑到那样远的地方去保卫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民主观。

只就身体而言，他重新执政晚了10年一事——他曾与利什维兹博士谈过——自1965年便开始显露出来。对江河来说，即使是最雄伟的江河，必须有坡度才能流入大海，这是物理学定律。对人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必须有青春才能长期成长，这是生物学定律。而这些可用科学衡量的原则是不容怀疑的。戴高乐将军长期以来如同一条激流滚滚的大江，75岁的时候，进入身体开始瓦解的年龄，犹如有气无力的河流接近了入海口。然而他却开始了又一个七年执政。

他的第五共和国产生于动乱之中，毁誉参半。随着危险时代的结束，人们精神的逐步安宁，观察家们变得越来越苛刻。他们说，将军还要以他的方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几手漂亮的。恢复法国的威名，在军事上退出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努力建设欧洲。然而他无法与苏美对世界的瓜分和控制抗争。他们认为，如果说他在内政方面可以把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工业化，他却不能解决财富分配所

引起的经济困难。他的“合作计划”滞留不前。

在他的身后，摆脱的愿望开始出现在某些他最亲近的合作者身上，甚至包括乔治·蓬皮杜，这个他后宫里培养起来的人，也觉得解放的热情在他身上冒了头。有些人表面上依然礼数周到，心里却早已没有感情了。人们开始传播这位伟人怪癖的言行。因为1962年宪法改革之事而早已抛弃了戴高乐的比埃尔·絮德罗肯定地指出，将军自1958年以来让人监视他的部长，注意他们的生活并记下他们在家里或床上接待了谁。调查机关同时使戴高乐夫人对巴黎生活的内幕了如指掌。

在这些越积越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将军是否觉得要有他过去那样喜爱的风暴产生？如果风暴突起，他能控制得住吗？

他的记忆力良好，思想机器的齿轮涂了油，运转灵活。他还能举行盛大的长达9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还能发表一小时令人赞叹的演说而无须看一眼笔记，并且与记在心中的原文丝毫不差。

在外交方面，这是他真正的战场，他的好斗性格并没有减弱。关于金边，他对美国人表现得强硬、坚决，他不赞同他们在远东的扩张主义。关于以色列1967年发动的六日战争，他持反对态度，这使他的许多拥护者受辱，但他并不因此后退一步。同样，他还毫无遗憾地伤害了“统治别人而自负的”犹太人。在他看来，他是在保卫法国在中东的利益。还有，1967年7月，他在正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喊出了“自由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使加拿大甚觉难堪。

人们不应该对这种种立场感到奇怪，它们是戴高乐神秘主义的自然产物。然而某些人却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作出另一种解

释，说这是总统大脑不断衰弱的表现。这些流言并非起于反对派，而是来自忠实于他的阵营，这里野心四起，经过 1968 年 5 月的事件之后，竟至公开膨胀起来。

是学生的胡闹变得严重了还是合理的不满？是荆棘之火还是一场骚乱？不管怎么说，国家并没有去追随那一小撮在巴黎街头大肆鼓噪的年轻人，但它怀着惊恐之心看到政权摇晃起来。戴高乐将军那时在国外，正在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进行礼节性访问。他回国的时候发现了危机，他的政府没能够控制。工人们也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次，政府要干涉了。为了欺骗示威者，乔治·蓬皮杜总理决定使出一着毒计：同意增加工资的要求，然后悄悄地改变一下通货膨胀则可使财政重新像所希望的那样平衡起来。戴高乐已经掌握不住局势了，他正经历着一次精神危机。他同家属一起突然消失。他飞翔在法国宁静的上空，在高空净化自己的思想。24 小时之后，他又回到爱丽舍宫，重获力量和打动人心的字眼，他和国家“对视着”。1968 年 6 月，选民们使他以压倒多数获胜：485 个议员中有 358 人投了他的票。

但是勇气却没有了。一个人，78 岁的高龄，不可能再去和一个新班子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征服了，而这又是他非做不可的。虽然 6 月的投票在他的名字周围集合了那么多人民的选票，他却对身旁的许多干部失去了信任。他终于和蓬皮杜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紧守着自己的孤独。在他短暂的消失所掀起的流言之中，最令人不快的议论实际上出自他的部下。有些人坚守着岗位，有些则惊惶失措或突然露出了他们对总统宝座的觊觎之心。他们否认他天赋的能

力,不承认他有这种控制风暴的特殊才能。他们在他背后咬着耳朵:“他摇晃了”,“花瓶裂了”,“头头,完了”。

完了?疲乏,这倒是真的,比他估计的要来得早。他对女婿阿兰·布瓦西尼和儿子菲利普从未隐瞒过他将于80岁时抽身。他的医生,当然还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正在他身上发展,这是几年以前发现的。血管内壁受着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共同作用。某些固定部位的扩张,类似某种疝,影响了主动脉,这条联系胸和腹的大血管。毫无疑问,糖尿病对此病的形成也起了作用。医学院这样说:这些动脉瘤表明主动脉的内膜多数断裂,它们使中层膜及外壁膨胀,从而可以穿破血管。

对戴高乐来说,离开的时刻到了。外表看来是棵橡树,里面的汁液却涸竭了。他把舵一直掌到今天,没有动摇,克制自己,从没谈过身体的痛苦,这些痛苦本来可以使不止一个权力竞争者半途而废。在他的飞机里,人们多少次看见他端坐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睁大着眼睛,而他的部下却因为疲惫已极而大睡特睡?他对气候对疲劳全然不觉,当他代表法国的时候,他在世界到处都为人们做出榜样。接着侵蚀开始了。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跌下去的,这是不可想像的。

通过一次故意将经济与政治掺和在一起的公民投票,他自己打开了通往结局的大门。“反对”意见在1969年4月27日占了上风。那天晚上,午夜过了11分钟的时候,戴高乐将军辞职了。他立刻赶回他的家,他在科龙贝的避风港。现在大家知道他是在那儿等死了。他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怀着一种巨大的忧伤,雷蒙·图

尔努说。一种深深的哀愁伴随着他。

因为一种预见压迫着他：在他退隐之后，那些“小锅底下的小火”又要重新燃烧了。法国不会很快地在国际大家庭里恢复它令人敬畏的地位，它将缅怀它的过去。他对它从此无能为力了，他的身体使他永远不抱希望了。他整理自己的事情，手里拿着牌去进行那场震动人心的赌博的时刻到了。

1970 年 10 月，将军第一次说他背上隐约作痛，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动脉瘤扩张侵蚀脊椎骨引起的。1970 年 11 月 9 日黄昏之时，主动脉上的一个壁间瘤，大约位于心脏膜附近，破裂了。大出血使戴高乐突然谢世。

据几个专家说，这一由壁间动脉瘤所引起的死亡，可以使人联想到戴高乐将军身上带有马尔凡综合征，正是美国总统林肯也有的那种遗传病。这一病症曾于 1896 年被一名法国医生安多南·马尔凡描述过。它的特点是身材高大，漏斗胸，四肢很长，视力混乱，内分泌破坏以及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

人们按照将军的愿望安葬了他，在科龙贝他女儿安娜的旁边，穿着他传奇式的准将服装。没有举行国葬。他希望这样结束他的生命，正如夏多布里昂所描绘的那样：“陵墓属于那些渺小的人，伟人只有一块石头和一个姓名。”

11. 乔治·蓬皮杜

记忆犹新。1974年4月2日，在伦敦交易所里，黄金每盎司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北越，改组了政府。南斯拉夫正为意美两国在亚得里亚海北部举行的海上演习提心吊胆。那天晚上，巴黎下着雨。电视播送的是《基辅人》，作为关于苏联犹太人辩论的序幕。将近晚上十点的时候，警察悄悄地封锁了通向圣路易岛东端的贝顿码头的两条道路。一小时以前，共和国的19届总统，60岁的乔治·蓬皮杜在那里，在他俯视塞纳河的私人住所里逝世。他死于大出血。

国外最初的反应是：莫斯科怀念“积极而又不易对付的对话者”。“波旁王没有继承人而死”，伦敦补充道。华盛顿向“大西洋争吵的温和派”致意。布鲁塞尔哀悼这位“斯多葛式的基督徒”。法国，政治多数派在传统的讣告中间号召继续戴高乐将军的“被死者始终坚持”的事业。右派害怕选举，因而呼吁重振救国委员会。左派协同表示沉默和思考。实际上，没有人对此事感到大惊小怪。

一年之中，众人有目共睹，甚至包括那些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人，国家元首重病缠身。但正如每次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一样，部下公开宣布是流感。总统于是被拉进了这场无益而残忍的游戏，自己也声称他依然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可谁能相信健康人会在走路之间忽然停下来，会驼背、面部臃肿和声音低哑呢？可想而知，最荒唐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

没有人否认，蓬皮杜能够勇敢地承受苦难。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着死亡渐渐逼近。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他的命运只关系到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实际上并不属于自己。当他握有领导权的时候，宪法和法律要求人们尊敬他。反过来，他对自己所代表的人们负有义务。爱丽舍宫的总统超越了那高踞宝座的个人。他就是法国。既然蓬皮杜仍然在权力岗位上而又身体衰弱了，他使法国人不得不进行一番思索。与某些诚实的官员看法相反——这些人对国家元首的健康秘密抱有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敬畏——他们有权知道他们的负责人是否有能力进行统治，管理国家，保护它的外部得益以及能否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卫它。

像他的前任和后继者一样，他握有一种可怕的不容别人分离的特权：即依他自己的方式，无须事先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点燃核战之火。这种打击力量，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论在什么地方，是为5 000 万受害者——全国人口的总数——准备的，它是惟一有效的威慑武器。

远在病魔还没有使蓬皮杜衰弱之前，他就深觉此种责任之重大。以至于这个记忆力很强可以一句不错地背诵拉辛的人，却无法

记住为引起核战争而准备的六个密码数字。他的大脑接受不了。这六个数字被刻在一个金纪念章上，他总是把它带在脖子上。谁能肯定在他漫长的晚年，这位患病的总统还有原子控制时代所必需的判断力呢？

医生们知道，在所有严重的疾病中，患者的个人性格要经受压迫而变得狭隘。连最顽强的性格也难以抵抗。任何病人都会丧失对他人的兴趣。他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微不足道和摇摇摆摆。这一系列的迹象，当事关一位国家元首的时候，使人感到不寒而栗。

还须了解那些夺去共和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上边的人说是一种无害的病，这话说了 15 个月。让人们去判断吧。

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门向思想敞开，却严密地看守着自己的财富并对其使用持保守态度，它接替了帝国和国王，却从未立刻向一个从默默无闻中走出来的人张开过它的双臂。1962 年 4 月 16 日，它因此抖动了。戴高乐总统给它选择了一个它不熟悉的政府首脑。这个人从未当过部长和议员，甚至也不是市议员。戴高乐给他无限的职权并把他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这样自然应该有他的道理。法国接受了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它甚至出于利害关系而和它缔结了婚姻，但他们的结合缺乏热情。

蓬皮杜以这样少有的方式进入争取权力的跑道自然会使人民对他持保留态度，不过他的姓名却散发着乡土气息。他保留着他的奥弗涅高原农家先祖的固执、狡黠和谨慎。他从做小学教员的父母身上继承了对教育的热爱。他在亨利第四中学使这种爱好得到了

满足。接着他在行政法院和银行服务。15 年之中,他还在暗中辅助戴高乐,当后者穿越旷野的时候,他是他的秘密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国人,对拉丁文比对现代语言更为熟悉。他并不缺乏可以打动人心的王牌,如果他愿意一试的话。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还去增加国家的谨慎感。

也许国家预感到新总理与他的外表并不一致。他似乎是一个天真汉,圆圆胖胖,随和乐天。他运用着自己调门有力的喉音。但是那望着人群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有如金属的闪光,显示出他的冷峻和无情。他的外表依然是衣着讲究,像散漫无心和玩票的公子哥,这铸成了他在巴黎沙龙的名声。这样的外表下面隐藏的难道不是一个未来的独裁者吗?他应该是戴高乐主义者,既然将军成了他的皮格马利翁,虽然人们觉得他切断了与法国自由力量内部的运动领导人所组成的后宫的关系,这些领导人在战争期间被战斗联系在一起。

到 1965 年,职务使他注意到法国管理实践的一面,他作为舵手、司炉辅助和驾驶员,寸步不离戴高乐大船的尾流。“我们的满身是毛、温良无害、缩起利爪的拉米纳格罗比斯的老猫王”,尖酸刻薄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这样说他。“拉斯蒂涅克,恺撒·皮罗多”,那些怀念巴尔扎克的人又补充道。然而,当衰老的将军投身于他的第二个七年的时候,他开始露出了他的意图,总统却也对此迎合:他将作为继承人接班。

蓬皮杜从此开始铸造一个新的形象并安排他的雄图大略。他的野心之大竟使他在 1968 年 5 月的危机之中认为他的机会来了。

他采取的立场遭到戴高乐将军的反对，后者虽然日趋衰弱但依然是船上的主人。任政府首脑六年（这是本世纪的最高纪录）之后，他遭到失宠的迎头一击。但他没有全部输光，他还保留有康塔尔议员的职务，这是他根据一个古老的奥弗涅格言“火上总要有两块铁”而顺手得到的。

明显的事实是：权力使人兴奋。权力是难以抗拒的，它刺激人们的感官和精神。难道不是通过它所支配的人它才创造了历史吗？使人们服从于法律，有时服从于可理解的事情甚至最坏的事情，让那些受神灵启示的人沉迷，这如同服了兴奋剂一样地使人兴奋。

可以肯定的是：权力侵蚀着人的身体，即使人们被兴奋剂所麻醉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再比权力所强加于人的艰苦生活更为有害的了。人们不能超过身体的限度而不受惩罚，身体这架很好的机器不自怨自艾，但可以破裂。君主们几乎总是在一次疲惫不堪之后成为严重疾病的受害者。像那些成绩卓越的运动员一样，历史的巨人患病之后能够适应和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好，因为这些权力占有者同样拥有出色的身体和精神财富，可以使他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长期抵抗下去。罗斯福和戴高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相反，衰弱的常人便垮了下来，于是苦难重重。

对蓬皮杜来说，一切都始于 1968 年底。太早了，正是他应该集中力量准备为夺取最高权力最后一跃的时候。他在政府里的 70 个月使他的健康所受到的损害要比外表看起来的大。他在乡间基地卡雅尔克和伊夫林省的奥维里埃度过的为数极少的休假没有使他很好地休息，因为思想依然在奔跑。受屈辱的辛酸毒害着他的心。

他要复仇,便加紧活动和接触。他准备争夺戴高乐将军的继承权,他认为已为时不远了。他先在罗马继而又在日内瓦对此大肆张扬。虔诚的戴高乐分子们不能原谅他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他们认为他应对将军的离去承担责任。他对这些喧嚣不屑一理,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情:胜利。因此,他的身体受到了伤害,虽然他拒绝正视这一现实。疲劳存在着,而病还被掩盖在萌芽状态。

蓬皮杜患有轻微的贫血,有时鼻子流血,医生们进行了例行检查,无济于事。他们化验过血液,只发现血沉加快。通常血沉加快证明有感染存在。但感染尚未显露特点的时候到哪儿去找呢?人体不能像机器一样拆卸。大部分器官都无法进行表面的观察。蓬皮杜的总体状况似乎不坏,没有任何迹象需要人们进行一系列漫长而令人怀疑的科学调查。可是这些细微的迹象并不单单是疲劳的结果,它们有理由使人恐慌。前总理的新陈代谢发生了变化。在身体内部的造血领域里有某种不正常的现象存在。

血这种奇特的液体,人们了解它的宝贵作用。它供给肌体养料,给肌体带去它从肺部吸收的氧气。反过来,它收集废物和有毒的气体,把它们送到使之消灭的器官中去。这条有生命的激流,计有五六升之多。它的原生质,即血清,含有无机盐、蛋白质和氨基酸、葡萄糖、脂类和胆固醇、色素、激素、白蛋白和球蛋白。血清中还带有红血球,它是身体的总管,供应养料和新鲜空气,消灭毒素。红血球产生于骨髓,不断得到更新,一般存在 120 天,然后最终被脾消灭。在它们的流动中,它们与白血球同行,后者负责与身体的外来体进行战斗,确保身体的免疫力。白血球比红血球更为复杂,既在

骨髓内也在淋巴结和脾内产生。它们的寿命,根据其种类不同,短则几日,长则数月。最后还有血小板,主管动脉和静脉的血液凝固。

如果说医学开始确切地理解了血液的组成——那流在每个人体里由9.6万千米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组成的无法衡量的网络之中的血液——它却经常难以逾越造成血液混乱的疾病。有时血液会变得没有力量,失去它的性能,或者会被暴风雨动摇。有时它被血管固定在脂肪里,被血管缩小了流量。它也能凝固为使血管破裂的血栓。身体里的器官可以慢慢消磨,血液却不能。它一旦失去青春,有某种东西在它精妙的化学中改变,生命便会受到影响。人们知道它对病毒这个大敌颇为敏感。最严重的危险来自那些有时使血液生产陷于瘫痪,使制造血液成份的平衡遭到破坏的反常现象,这些反常现象发生于骨髓及淋巴结的中心。正是一种这类的病在蓬皮杜的身上发生。

他怎么能意识得到呢?他哪儿有时间注意自己的身体呢?戴高乐走了,他加紧争夺总统宝座的体力和智力的竞赛。他于1969年6月15日就职总统,却没有放慢速度。他的妻子,这个马延省贡蒂埃堡一个医生的女儿,辅助着他,他使古老的爱丽舍宫焕然一新,金器和怪诞的风格被现代家具和绘画代替。他重建政府,把领导权交给雅克·沙邦—戴尔玛这位戴高乐将军的忠实臣属,期望以此安定多疑的政界大亨,他们害怕他抛弃他们的原则。他尽量限制自己的行动,少发号施令,更不独断专行。人们猜测他正在警惕着那位又在科龙贝闭门不出过起隐居生活的大人物的沉默。可是作风变了,实际代替了荣誉,汤变稠了。人们谈的是政务、契约、福利、共同

市场的扩大。只有沙邦—戴尔玛出于对戴高乐政策的信念和忠诚，在梦幻着一个新社会。戴高乐将军的死使蓬皮杜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于是开始直线上升。他从沙邦手里夺取了领导权，从此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他了。但后者还有用，既然人们要巧妙地把1971年发生的金融房产丑闻归咎于他。这是和过去政权一刀两断的办法。蓬皮杜总统在1972年7月把沙邦的戴高乐主义的保证掷回到他的波尔多市政厅，从此抹去了自己在1968年所受到的冷遇。

他独自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个下面看起来是罗马人、侧面看起来是波旁家族的人，一切皆出于他，他不能容忍批评。他已经在国外进行了九次访问，从美国到苏联，到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非洲，他在那里访问了九国。在法国进行了11次旅行。他接待了14名部长和国家元首，其中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举行了6次国际记者招待会。日程是正常的，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如此疲惫。

三位医生看护他，其中有两名是巴黎医学界有名的大师。他们几个月以前就发现他只要出一点力身体就受不了。鼻子出血，贫血以及血沉加速继续存在。总统对冷的敏感使人吃惊。细小的感染不断发生。表面上，这些感染每次都可以用抗菌素治愈，但它们过一段时间会再次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令三位医生不解。一位医生回忆起在爱丽舍宫一直呆到1954年的樊尚·奥里约总统就曾经这样使医生为难了好几个月。当时连最出色的专家也一筹莫展。一位内科医生揭穿了秘密：樊尚·奥里约的苦恼来自牙齿感染。但蓬皮杜总统的牙齿没有病。医生们于是开始寻找血液异常的可能

性。深入的检查于1972年发现并证实蓬皮杜不寻常的病源于免疫球蛋白。

在血液的观察中应该下潜很远才能发现它们。这些分子包含在原生质里。它们是活细胞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具有抗体的能力，因为它们与抗体具有相同的化学结构，参加保卫机体对抗感染以及对抗某些可以引起癌瘤的病毒的斗争。它们同别的氨基酸一样，由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组合而成，这两种细胞是两种白血球，也产生于骨髓、淋巴结和脾。

有时免疫球蛋白的形成部分或全部受阻——科学尚未找到这种偶然事故的原因，机体便受到被称为革兰氏阳性细菌的控制。链球菌、葡萄球菌和肺炎球菌便大肆进攻呼吸道、大脑、皮肤和消化系统。1952年，奥格登·C·布鲁顿首次发现一个完全没有伽玛球蛋白的病例。从这个重要的日子以后，医学记录了二十余种由于缺乏伽玛球蛋白所引起的它能够给予比较成功的治疗的疾病。

但是在探索分子生物学知识的道路上陷阱连着陷阱。如果说机体由于部分或全部缺少免疫球蛋白而对大部分感染无力抗争的话，当免疫球蛋白全部或部分结构畸变的时候，机体有时却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这种自然之恶所引起的最平常的严重疾病是多发性骨髓病或称为卡赫勒病，此名得之于发现它的捷克医生卡赫勒。这种病先达骨髓，然后达于它侵蚀的骨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癌，系白血病的远亲。它能分散转移引起肾和血液并发症。这种病凶多吉少，它能使人很快地死于恶病质。

一时世界以为总统得的正是这种病。议论首先来自美国，那里有人说这是医生的诊断，他们把美国情报机关暗中获得的法国总统的尿样进行了化验。实际上，蓬皮杜患的是更为少见的第二血液病，即一种巨球蛋白血症。这种病于1944年被瑞典的医生扬·G·瓦尔登斯特罗姆于马尔默认定，遂以他的名字命名。

医学上没有清楚与简单可言：扬·瓦尔登斯特罗姆对此了如指掌。自从他的首次发现之后，他确定了好几种巨球蛋白血症。所有这类病的特点都是有高分子量球蛋白在血浆中存在。有些可以在化验中看到，很微小，并不发展，似乎不会影响健康；有些则长期无害。瓦尔登斯特罗姆在马尔默对一系列病人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它们有时同别的病一同发生：肝硬化、慢性肝炎、全身浮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或者严重的皮肤病。另外是一些上皮瘤、肉瘤等某些癌病的副产物。瓦尔登斯特罗姆称之为基本的巨球蛋白血症是大型免疫球蛋白引起的，它能引起贫血、出血，能增加血液的粘度，导致视力混乱，心脏充血并机能不全，听力减退。它使肝、脾、淋巴结肿大。这种可以使人致死的病发展缓慢。

蓬皮杜的医生们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复杂现象面前自然手足无措。但病要拖下去，这使他们有时间准备他们的战略。剩下的便是良心问题：是否告知总统。原则上，和一个无名的痛苦相比，患者更能承受一种确定的疼痛。然而癌的字眼——这种巨球蛋白血症，即与白血病相类的卡赫勒病，使人恐怖，使人经常会觉得无望。并且，大人物从来都不是容易对付的病人，他们惯于发号施令。他们的要求有时是荒唐的，他们还常常否认有病。与别人相比，权力占有者

受着自我陶醉这种最原始最强烈的倾向的更大的折磨。他们觉得自己便是一切,应该受人爱戴,不容侵犯,不可缺少,应该与世长存。三名专家于是约定对事实半藏半露。他们对蓬皮杜说是得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相反,他们对克洛德·蓬皮杜夫人和总统夫妇的儿子阿兰却将真相全盘托出。成为他们医学同行的阿兰不理解他们的沉默。

蓬皮杜总统受骗了吗?他于 1972 年 8 月写好了遗嘱。对所有的政治观察家来说,他的表现从此改变了。从此之后他表现得优柔寡断,这成了他晚年的特点。处理政务经常举棋不定或经常出现矛盾。“这是性格问题,”他的对手不满地说。这是健康问题,但人们还不知道。他在爱丽舍宫举行第七次记者招待会,组织巴黎的最高级会议,访问上沃尔特和多哥,然后和博杜安国王一起为巴黎—布鲁塞尔高速公路剪彩。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那一年的 12 月 8 日公众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总统缩短了他在爱丽舍宫每年一次的圣诞节晚会上的逗留时间。他向学校里的孩子们解释说他患了“流感”。26 天之后,还是在爱丽舍宫,他不得不坐在椅子上回答记者们对他的新年祝贺:“流感”。第三天,他无法接受家庭工作人员对他的祝贺:还是“流感”。是病的影响还是总统已经受着与治疗相关的第二期并发症的折磨?

这方面的专家很愿就今天怎样着手对瓦尔登斯特罗姆作出解释。有两个途径可循。

第一条途径是寻找可能的肿瘤,肿瘤是在这类情况下网状淋巴系统内部混乱的中心。网状淋巴系统这个学术名词是指淋巴通过

的导管及整个的淋巴结。检出可以通过连续的 X 光照相进行。事先注射一种 X 光不能透过的物质。这是一个缓慢的、常常使人难以忍受的过程。如果发现有肿瘤物,则用手术将其切除,然后用放射和化学疗法做补充治疗。

当没有肿瘤的时候,这种情况也颇为常见,瓦尔登斯特罗姆病则用一种化学加技术的手段来治疗。为了减少红血球化合能力衰退所引起的血液的粘度和贫血,专家们利用血浆除去法。他们提取病人的血液,将它进行离心分离,把粘稠的血浆和血球分开。然后将血球和正常的血浆重新注射给病人。平均两个月要提取和替换 10 至 15 升。与此同时,病人服用诸如抑制细胞生长的传统抗癌药物,它们可以使细胞的繁殖速度放慢或中止。只要血液中巨球蛋白的含量过高,这种办法就要不断地进行下去。

50 年代,当可的松出现而被某些医生视为包治百病的妙药的时候,扬·瓦尔登斯特罗姆对这种药的一种衍生物强的松进行了测验,他将它应用于病人。无所不试,在当时是正常的,因为科学还缺少治病的武器。瑞典医生的记录指出: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即以他命名的疾病产生严重的溶血性贫血的时候,他才能获得满意的治疗结果。在另外的病例中,强的松无效,即使人们大量使用:每天 40 至 60 毫克。在瑞士,E·卡普勒和他的同事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试验 21 名病人,淋巴结的体积稍有减小。然而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治疗效果。美国专家 B·霍格斯特拉坦也证实了这种试验,他认为,不论是处理卡赫勒病还是瓦尔登斯特罗姆病,都应该避免使用所有的皮质类固醇。“它们使骨骼失去无机盐,”他

说,“使骨头脆弱,从而为感染大开方便之门。”瓦尔登斯特罗姆决定只在他发现的有限情况下使用可的松,他自己只是用以血浆除去法和抑制细胞分裂物为基础的疗法来处理他的数百名病人。

人们知道蓬皮杜并没有住院,这说明他没有接受淋巴管造影和血浆除去治疗法。巨球蛋白血症似乎在他身上并没有引起严重的溶血性贫血。他本来应该一直卧床。他的病用大量的强的松来治疗。既然他的医生们没有被迫非去征求瓦尔登斯特罗姆博士关于各种不同疗法效果的意见不可,他们也就没有去问他。

小组里来得最早的一位照顾总统身体的全面情况。负责治病的第二个医生采取一种在专家的小圈子里颇有争议的治疗方法,在化学治疗巨球蛋白血症已获进步的情况下,他不是有意冒险吗?全世界的注意力将很快地集中在蓬皮杜身上,他的脸将暴露可的松的作用。最后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等着第三位医生:与长期使用可的松所能引起的感染战斗。

可的松在药典上的地位相当于炸药的发明。自从它的发明者美国人肯德尔和瑞士人雷斯坦因此获得医学诺贝尔奖金后,人们便把它遗忘了。诚然,它可以治许多种病,非别类药物可比。但是潜在的危险的代价是何等的巨大呀!说出来不免令人毛骨悚然:眼睛并发症,肌肉萎缩,糖尿病,水肿,高血压,骨质人为迅速的老化,被治理的疾病在治疗停止以后有重新活动的可能,保卫肌体的免疫力的丧失,肾上腺萎缩,大脑的假囊肿瘤,失眠,神经官能症,可逆性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自杀的冲动,一种类似硬性毒品所给予人的刺激,并不只是这些,还有很多没有列举的病症。蓬皮杜自 1973 年 1

月起所遭受的痛苦证实了这一点。

总统在那个月里所作的两次短暂的国外旅行使他筋疲力尽。11 日和 12 日,他在苏联的明斯克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法国是和苏联签订七年合作计划的第一个西方国家。15 日至 17 日,他以战斗的步伐,跑遍了濒临红海的干燥而贫瘠的阿法尔和伊萨的国土。但他不得不在阿尔卑斯滨海省的奥龙处延长他的假期,不过依然没有恢复。

2 月 15 日,"流感"使他卧床四天。5 月 24 日,他没有参加布尔歇的航空展览会并且取消了预定为母亲节举行的招待会。"流感",政府发言人勒卡先生面有难色地宣布。实际上当然比这严重。可的松愈来愈深刻地改变着它所侵蚀的阵地。身体的防护慢慢地崩塌,细菌和病毒的感染日趋严重。5 月 28 日,蓬皮杜总统发了一次高烧。一台 X 光机照相仪器紧急运往爱丽舍宫。尽管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秘密还是如同闪电传遍巴黎,被不着边际的流言所夸大和歪曲,据那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结果,一架普通仪器变成了利用辐射消灭恶性肿瘤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肺部 X 光照相的确使医生们看到在左肺下部有一个可疑之处。肺结核还是胸膜炎?蓬皮杜理应休息,长期停止任何活动。他没有这样做。两天以后他应该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见尼克松。医生们坚持让他休息,建议他取消会见。没有用。法国总统吞食了大量的抗菌素之后哆哆嗦嗦地登上了飞机。

从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冰岛首都,人们的眼睛再也离不开蓬皮杜了,人们观察着他,小声议论着,询问着。他紧紧地裹在衣服

里，身体臃肿，脸上线条沉重，皮质激素又使他面色铁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他顶了尼克松。法美两国对世界关系的看法依然没能一致起来。“这个人，不管怎么说，活不了多久了”，美国总统在回华盛顿时对他的人说。

他要顽抗下去，但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再施加统治了。谁会为此吃惊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他的病况的了解，人们甚至要问他究竟从哪儿来的这种决不自动下台的固执？被认为能够减少巨球蛋白血症的可的松依然大量地涌入体内，无疑，身体会继续遭到它的破坏。这个被折磨的身体到处发生感染，负责控制这些感染的那位医生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他不得不依靠全部抗菌素。

1973年6月26日和27日在朗布依埃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使蓬皮杜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从那时起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他的日常生活全部被打乱了。他接连不断地到卡雅尔克、富埃斯南、布雷冈，接着又上卡雅尔克去休养。没有作用，他愈来愈不能站立，他放弃参加庆祝活动和仪式。“人们对总统的病过于认真了”，他说，还想欺骗世人。不过，他的政治任务记事本上却只记载着为数极少的会见了。

9月10日至17日，他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一次无法回避的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了的访问。在中国，人们进行了特殊安排。他几乎不需要走路。如果说他参观了天坛、紫禁城和大同石窟，那是坐在供他使用的汽车上进行的参观。长城被排除在日程之外。在这个事事处处保全面子最为重要的国家里，他坚持着，喝威士忌，抽雪茄。他甚至还和自己人开玩笑说他觉得毛累了。那些在

正面、侧面和背后暗中观察他的人说他自己也同样累了。他向记者雷蒙·图尔努谈到自己的身体，对于他自己每周一次的“癌”，他诙谐地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烦恼。尼克松有水门事件，我呢，我却要死了！”他一边说一边大笑。但他未曾料到那一时刻却来得那样急速。

他成了地道的玻璃人。如果跌倒的话，他能摔断骨头。因此人们在他身边加倍小心。在普瓦提埃，1974 年 1 月 24 日，当他因国事非去不可的时候，他躲开欢迎的人群，窥视着在他的旅途中分段设置的安乐椅，异常小心地坐将上去。所谓的流感接连不断，每次都有更不易去的高烧产生。实际上，这是各种不同的感染在影响着他的身体。

2 月 11 日，在爱丽舍宫为政府成员举行的晚宴上，他为自己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怎样了呢？3 月 4 日和 11 日，他取消了两次需要走路的公开露面。12 日，他前往格鲁吉亚的皮聪大和勃列日涅夫会谈。一次丧失理智的旅行。总统是要嘲弄命运吗？他感到这场残酷的斗争接近终局了吗？一路上，在他的飞机里，他无法掩盖自己的痛苦。他到达的时候，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看起来让人可怜。勃列日涅夫殷勤地取消了外交礼节。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 36 个小时，气氛轻松。有用吗？谁知道呢。在苏联人的眼睛里，一个生命显然正在结束的对话者的见解和保证能有什么用呢？他本人也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一个亲信说：“我害怕死，死得毫无价值，离家那样远。”

最后的阶段开始于 1974 年 3 月 21 日，在爱丽舍宫。总统为外交使团举行首次历年都要举行的盛大宴会。展开了豪华的地毯，来

宾服饰灿烂。但他们的宴会桌上却没有法国总统。在二楼，他满脸痛楚，紧咬牙关，正在任凭医生们摆布。只有两名医生签署的健康公报说："肛门—直肠部位一次血管无害的病变，有间歇痛觉过敏。""痔疮"，几个熟悉内情的人解释道。于是无情的嘲笑传遍巴黎。

实际上崩溃开始了，令人恐惧的可悲的崩溃，可的松并不陌生的死亡。它不是会毁坏身体吗？它此时不是和它完全不起作用的巨球蛋白血症一样地会致人于死地吗？感染所引起的并发症将穿透胃部及肠子的多处地方，在结肠的第一部分盲肠的位置上。它们将破坏这个结肠及直肠憩室并使之穿洞。它们会引起胰腺发炎，会在那儿引起导致悲惨结局的综合征。

1974 年 3 月 24 日，蓬皮杜取消了他应该为外交界举行的第二次宴会以及到东京和波恩的访问。3 月 29 日，他躲至奥维里埃。在那里，人们一直担心的病势严重显露出来。几天以前曾发生过一次视网膜出血并引起几次鼻子出血。现在，一个脓肿在直肠上形成。

蓬皮杜受着巨大的折磨。人们用救护车把总统运回巴黎他在贝顿码头的住所。医学界还没有服输，他们还认为似乎可以考虑进行一次手术。然而热度突然上升至 41 度，病人有了败血症，这是集无数次感染的必然结果。病菌大量增加，抗菌素已无能为力。

4 月 2 日，星期二，晚上 6 点的时候，蓬皮杜开始不清醒，不久就昏迷了。他的身体里掀起了风暴而意识却已经不在了。到 9 点钟，血管发生连锁破坏。

继 1894 年被暗杀的弗利索瓦·萨迪·卡诺、1899 年逝世的费利克斯·富尔和 1932 年被暗杀的保罗·杜美之后，蓬皮杜是第四

个死在任职期间的法国总统。没人知道，如果条件不那么残酷的话他是否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疾病妨碍他大显身手。“只有疯子才能想像有人愿意在戴高乐将军之后担任国家元首，”他在任职七个月后曾对一个亲信这样说：“这是我的命运，我没有推却。我感觉到了命运的重量，我无权抱怨。”还有更为可怕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对这些考验，当他从医生那儿得知他们刚刚发现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的时候，他一定是考虑过了。他于 1972 年 8 月写的遗嘱很短：

“我愿意被葬在奥维里埃。我不要鲜花，不要花圈，当然更不要纪念碑。我只须一块方石，上面写上我的名字以及我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在圣路易岛做追思弥撒，弥撒上要用单旋律圣歌。”

12. 朱塞佩·莫塔—庇护十二世

手帕大的一个国家，那里聚集了最为混杂的居民，他们介于三国文化和大量的方言之间，这本身就是对理性的一种挑战，然而它存在着并且还给世界上了一堂民主课，它就是瑞士。它因为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获得了力量。维克多·雨果说："它挤着自己的奶牛，过着平静的生活。"它的安宁来源于它对它自己机构的尊敬。相反，它从不给人以盲目的信任。从各州议会到联邦政府，各级干部都是可以撤换的。不管他多么伟大，他只能起表面上的作用。

正相反，天主教教会虽然也希望存在到世界末日，但它却把存在的理由建筑在对他人的爱上。它没有边界，统治着世界各地5亿人的灵魂。它自己选出的领袖被安置在罗马一座面积为44公顷的孤岛上，教谕立刻宣布他永远正确并终身任职。

宏大的教会和渺小的国家。给人以信任的教会和对人不能信任的国家。历史的机缘不断地加强教会和瑞士各自的信条。它们

都被各自的领袖——梵蒂冈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和伯尔尼的朱塞佩·莫塔——卷进了一个困难的局面之中,前者被它卷进考验之中的人拉了出来,并且得到加强,后者被它的机构所拯救。

1939年3月,欧洲缓慢而确定无疑地进入了动乱时期,希特勒正把德国军队指向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将停止存在。德国元首加强了他的压力。由于奥地利业已倒向帝国,他把目标对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促使它爆发的因素抬头了。

那个月的第二天,在罗马,数千名天主教教徒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目不转睛地看着梵蒂冈屋顶上面的一个烟囱。一股轻烟出现了,它是白的。这是信号。红衣主教团为选举教皇举行的会议按照传统方式表明他们刚刚选出了新教皇。人群跪下来祈祷,祝愿261世教皇万寿无疆。63岁的派契利接替了戴了17年三重冠的拉底,他取名为庇护十二世。

此事在瑞士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相反,人们感到不安的却是在国家的北部与东部边界愈传愈甚的战争谣言。而瑞士的外交负责人莫塔已经不在伯尔尼的领导岗位上了。医生在他的床前忙乱着。他刚刚经过一次打击,身体衰弱,69岁的年龄已经显得很老了。人们尚不知道是脑血栓形成症还是内颈动脉被血栓堵塞。他至少六个星期不能活动。

莫塔是高血压的受害者,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打倒。他的高血压似乎是遗传性的。他的父亲在患栓塞症之后就死于高血压,使他在12岁上成为孤儿。他的同胞们不知道,多年以来,每当

他的心脏跳动一次，即每 24 小时跳动 12 万次，他血管的内壁就要受到高血压一次猛烈打击的伤害，使它们更加脆弱以致无力抵抗血液中某些脂肪向血管内层渗透。血管失去了弹性，硬得像烟斗，却又不像烟斗那样结实。联邦政府外交政策负责人的医疗顾问并非没有向病人指出他所面临的危险。他像大多数高血压患者一样地不听劝告和无忧无虑，他没有理会他们，既不按规定饮食也不接受关于节制的建议。

他有性格，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对瑞士的政策做出裁决，他控制了很大一批清醒而谨慎的选民。人们称他为“主席”。他已经好几次担任国家的领导。但 20 年以来，他真正的领域仍然是外交。实际上，他在公众事务、州议会和联邦议会里已经周旋了 44 年。他在国外也同样知名。他的名声可以追溯到 1920 年 11 月 15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开幕式。那一天，与会的 42 位国家元首被他热情虔诚的演说迷住了，他号召建设一个正义和和平的世界。

他来自特辛的埃罗洛，埃罗洛是座小城，位于圣—高达尔大隧道的南端出口，像整个州一样，与意大利文化联系甚多。他的祖先有神职人员、军人、官吏、教师和历史学家。他选择了法律。虽然他爱意大利，把它作为第二故乡。他却在德国，先是在慕尼黑而后又在海德堡获得了学位。人们知道他对证书上的评语学业优良很是自豪，已经五年没有这种评语了。

某些人否认这位保守分子、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分子对历史有任何的预见。他像一个外省的公证人。他的朋友说，在他身上，理智使感情平衡。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突然的冲动会使他发作。在

海德堡,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一场政治争吵他便抄刀追赶他的一位同学,后者躲藏起来,他把刀插在他躲藏的屋门上。他对工作难以遏制的热情开始于他孤独的少年时代,出于一种自我放心的需要。他对自己的文章、讲话和发言都琢磨再三,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当他登上讲坛的时候,他可以抛开他的讲稿。这个领导人并非只有朋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是他政策的基石。

如同许多瑞士人一样,莫塔的这种仇恨起源于 1918 年。那一年,苏联外交使团在瑞士组织了一次全面罢工,结果他们被驱逐出境。作为报复,第二年瑞士驻莫斯科的使馆受到洗劫,一名使馆职员被杀身死。苏联当局没收了瑞士人在苏联的财产。拥有苏联银行支票的瑞士人的债权未被支付,结果引起两国外交关系破裂。俄国公使沃罗夫斯基在洛桑被暗杀,接着凶手孔拉第和波鲁宁被洛桑的法官在 1923 年宣布无罪,分歧严重化。莫斯科因而对瑞士的全部工业产品进行了抵制。

莫塔主席并不局限于瑞士内部为反对苏联而战,他把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带到瑞士的声音能起作用的机构,即国际联盟中去。他以道德的名义张牙舞爪地反对苏联进入,虽然苏联是主权国家。“这是个野蛮之国,”他说,“它的边界尚未确定。”他指责苏联奉行奴隶主义,像埃塞俄比亚一样,后者在他的压力下也被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但他忘记了国际联盟是个国际组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反对战争的根源。

毫无疑问,瑞士既无须要求排斥苏联也无须要求接受苏联,它

的全球政策允许它弃权。莫塔置此于不顾，致使这一政策左右为难。他对中立政策所作的二元区分恰好无视了联邦借以存在和保证其生存的理论。人们在伯尔尼对此颇有感觉，有一种意见鼓动议会拒绝赞同外交首领的意见，某些议员甚至曾两次建议联邦议会和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但在联邦议会里忠实于莫塔的人太多了。而在国际联盟里，他无法再反对英法两国了，英法两国大肆鼓吹限制军备竞赛并希望有苏联人参加，以便挫败希特勒。1934 年，虽然遭到莫塔最后一次激烈发言的反对，苏联还是进入了国际俱乐部。

从历史的角度，应该指出莫塔的容忍是有倾向性的。瑞士左派不无道理地指责他被法西斯太阳所迷惑，那照红了柏林、照亮了罗马、使西班牙开始燃烧的法西斯太阳。在国际联盟内，1935 年，当墨索里尼的部队侵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这位容不得任何污点的人却没有投票赞同给意大利以经济制裁。在伯尔尼，在他的推动下，瑞士毫无保留地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还是在国际联盟内，莫塔从未谴责过希特勒在欧洲推行的霸权主义。再回到伯尔尼，他与联邦议院的意志背道而驰，让冯·比贝拉男爵在外交豁免权的掩护下成为瑞士国社党人首领。当时，他对那些对他"选择性"的中立感到惊奇不解的人回答说："我们不干涉别人的事务。"

在人民当中，在议会里，瑞士的反对派抬头了，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种顽固不化、这种思想僵化以及这种只打替罪羊的倾向表现了高血压所引起的大脑损伤。而莫塔不得不迎战议员斯波雷什掀起的争取完全中立的运动。人们最终接受了完全中立。如果没有这一倡议，虽然它没有更早地提出来，莫塔将把国家引向灾难。

这就是1939年伯尔尼的形势，而他则慢慢地从病魔袭击中恢复过来。5月，他大病初愈，又重理政务。那个月的21日，在一次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他的表现完全缺乏现实感，非常幼稚可笑。他还相信意大利和德国愿意和平。他的随从们终于开始权衡他对政治抱有怎样缺乏理智的看法，他是怎样无视或者缩小与政治不协调的事件。这是衰老症的典型特征。

几天之后，接着又在6月，两次旧病复发使他再次卧床。但他在6月15日重新站立起来，虽然他刚刚可以勉强走路，他还是去部里上班。他的样子使人害怕。1939年8月27日，当联邦议会觉得战争逼近西欧，准备选举一位将军，亨利·居森的时候——只有战争临近边界的时候联邦议会才这样做——莫塔强硬地建议不要对瑞士军队进行总动员。他认为和平的机会是大的。他声称信任德国。他说："当瑞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第三帝国当成一个可以准备讨论用何种方式援助我们的国家。"如果是在今天，医生们可以断定他这种思想糊涂和这种行为乃是阿尔瓦莱兹病的深刻影响所致。

1939年11月3日，第二次麻痹症又使他辗转病榻。在一次联邦议会会议上，他觉得麻痹从左腿上升。一个月以后，当重新选举议会议员的时候，他还是报名参加了，被如同他一样盲目的无条件支持者选中，继续任政治部的部长。然而此次病势已无法掩盖。他不能再握笔了，这表明大脑的两个半球均已受损。他面色蜡黄，眼神不宁，声音微弱。他使人感到震惊，但他仍然不了解自己的状况。他怎么能知道1940年1月19日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会议厅呢？他

走出来之后，向对他致意的记者咕噜着说："先生们，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有劲，这样精神饱满！"四天之后，一次新的危机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留给瑞士一笔债务，当战争的混乱结束的时候，它是要偿还的。它将为恢复与苏联外交关系而努力。尽管丘吉尔本人找斯大林为之斡旋，莫斯科还是拒绝了，俄国人并且反对联合国设立于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旧址，他们宁愿联合国建基于纽约。瑞士的一种思想和那违背它古老的民主传统的人一同沉沦了。需要过好几年，瑞士才能使这一思想在各个机构中复活。

恢复和平之后，当盟军各大国首都兴高采烈地欢庆军队获得胜利的时候，人民议会复生，算账的日子到了。教会却毫无笑容。一言以蔽之，它感到难堪。它和柏林一起得到了臭名，它对墨索里尼表现得热情洋溢，它在西班牙帮助了"上帝的战士"佛朗哥，赠给他基督勋章，得到的是使西班牙收复四分之一的领土并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而将其他宗教一概排斥。对纳粹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一事它保持沉默，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它支持所有屈服于前德国占领者的政府。例如它保护乌斯塔奇的刽子手，他们参加了对南斯拉夫50万东正教教徒的屠杀，它支持维希的菲利普·贝当，只有法国的几个高级教士除外。它因此把目光转向自己的领袖，他曾经赞同其政策的领袖。教皇庇护十二世因此将给教会上一堂战略课，连以谨慎著称的克劳塞维茨也要为之震惊。

大炮停止轰响的一个月以后，1945年6月，教皇召集红衣主教

团的70名红衣主教,即梵蒂冈政府,举行会议。他的说教立刻传遍了五大洲,他用一种极为尖细和带有鼻音的声音谴责残余依然存在的法西斯,说它"狂妄地背叛耶稣的宗教,否定他的信条及赎罪的事业,崇尚暴力、种族和血统,毁灭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埋葬失败者的人不害怕胜利者。那着白衣的君主,挺立在他那古老高贵的教皇领域,从来都很会选择时间和盟友。

一个人要是在一个小教堂深处传经布道,哪怕嗓子叫破,也休想成为教皇。应该生于王侯之家,或者先人多在教会内任高级职务,还必须有人提携。派契利的导师是红衣主教加斯巴里。他是一个天资聪颖、智力过人的学生,能说多种语言。他受到教廷特别事务部的锤炼,后来成为教廷大使,在德国任职12年,53岁成为红衣主教,他作为秘书(相当于总理)辅助教皇庇护十一世九年。1939年,选举他做接班人是很自然的。

在混乱不断扩大前途未卜的时刻,在红衣主教团内部,难道不是他最了解德国吗?他爱这个国家,他曾在慕尼黑和柏林生活过。他的亲信都是德国人,包括他身边的四个修女和他私人秘书处的耶稣会教士。他甚至给到他桌子来觅食的金丝雀起了德文昵称。如此明显的亲德倾向对教会有好处。派契利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这一点无人不晓,也使罗马的墨索里尼和柏林的希特勒感到放心。

派契利红衣主教还有另一个条件使红衣主教团把教皇的职务给他,即他对商业事务的兴趣。大手大脚的教皇庇护十一世,因为救济穷人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不惜血本地援助某些国家,甚至包

括俄国,已经使梵蒂冈的内囊上来了。由一个节俭的人任职会重新填满国库。派契利正是这样的人。每天晚上,当神职人员走后大殿一空的时候,他便开始关闭那些依然大放光明的电灯。但他有更为严肃的事情要考虑,要使他的人中间有银行家。支持他的有加来阿齐伯爵,他被任命为教会财务负责人;还有诺加拉,一个才能罕见的在俗教徒,他能把他所触及的一切都变成金子。派契利将为巨大的梵蒂冈金融帝国打下地基。正是教皇庇护十二世于 1942 年创建了梵蒂冈的第一家银行,位于信理部的院内。正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工业和商业中进行了投资。还是他为使圣·彼得的金钱带来利润而规定了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这位将近五亿人的世界宗教领袖只用短短的几年就在他们主宰的领域内建立起一个卓越的世俗权势,他的天才不能不使美国人注意,并且他在那儿拥有一个幸运的联系人,他私人的情况报告者。他让他负责广告工作,此人便是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他是美国军队随军神甫的总管,系世界上天主教派出人员中最为机灵和最为不能安静的人,可以直接进见罗斯福。因而美国早就知道它在罗马有一个盟友,这个盟友在未来与整个世界对抗的斗争中能够给它有效的支援。

而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确在政治上表现得最为活跃。1946 年,他就任命了 32 名红衣主教。他们之中一大批首次选自传统基督教的欧洲民族之外,如在古巴、智利、秘鲁、中国、亚美尼亚。他预见到某些事件将震撼这些国家,因此他事先派出了大将。同时他所主宰的教阶制度已经把他的观点强加于那些庇护他们的国家,如哥伦比

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1951 年 2 月,出于同一种预见,他号召亚洲的人民向共产主义开战:“我们正处在这种形势下,即蛮族侵入罗马带来了迅速腐败的萌芽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你们要加倍努力,消灭这些萌芽,像奥古斯丁时期一样。”

他本人在意大利做出榜样。意大利推行了 20 年墨索里尼主义和不积极参与国家生活之后,从 1945 年起开始自寻道路。为了击败那些他心目中的极权主义者,这些极权主义者觉得受到了在罗马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体的诱惑,教皇庇护十二世选择了一名斗士,这位斗士是他的铁手,手套上印有他的印章,他叫加斯贝利,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梵蒂冈前图书管理员。于是,忏悔神甫、讲经神甫和教会各级组织的领导人便动员了军队。贵族和资产阶级进入了思想战。“天主教行动”,这个拥有无数成员、原则上只是为了推动基督教教育的队伍,负责黎民百姓。花钱如流水,梵蒂冈银行的窗口从没数过。因此加斯贝利在 1945 年成为总理,成为意大利新政治的主宰者。他组织了第一次选举。1946 年,意大利人民和他一起赞同共和国而不要君主政体,但赞同一个基督教民主共和国。为了 1948 年的选举,梵蒂冈出于排斥共产党的目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后者有微小可能取胜——取消了最后的禁令,打开了所有修道院的大门。那些被禁闭的年轻修女被解放了几小时,她们十分引人注目。1949 年 7 月,信理部宣布教谕,开除共产党人及所有投共产党的票的人的教籍,这一教谕,教皇保罗六世在 1976 年还拿来在类似的情况下加以运用。梵蒂冈的支持最终使基督教民主深深扎根。加斯贝利成为废物被抛弃,他于 1953 年下台。左派长期受到排斥。

如此紧张而有吸引力的活动使人认为庇护十二世大概有一个钢铁般的身体。事实并非如此。帕斯夸利娜嬷嬷便为此事烦恼甚多。她是自1917年开始照料他的巴伐利亚四个修女中的第一个，被意大利人戏谑地称为女教皇。他并且还使加莱阿齐—利西博士的学问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者自从他登基以来便成为他的私人医生。

他又高又瘦的身体使白袍子显得空空荡荡。他的两手，他印着金十字的红鞋里的双脚总是凉的，还时常青紫。他是一个永久性低血压患者。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缓慢。他的心跳有杂音出现，犹如一个打火装置失灵的马达。他经常昏厥，这是轻微的一贯性贫血的结果。他不是吃饭而是在一点一点地啃。他的胃似乎使他不断地感到疼痛。上呼吸道感染的结果使他疲弱不堪。一个这样的人，大家知道他经受不住疲劳，他的精神力量在定期减弱。

他自以为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便在信仰的背后掩盖起对科学及其作用的深深恐惧。他害怕注射，害怕X光检查、灌肠和药物。他对如何医治自己的病有自己的看法。他宁愿要顺势疗法而不要官方的医学，因为顺势疗法让人服用秕谷，这比大胶囊更容易下咽。长时间细心的诊病使他如坐针毡，他和自己的健康顾问却没有这种烦恼：加莱阿齐—利西博士是眼科医生，除了眼科之外，他的内科知识相当肤浅。

有时有人说庇护十二世是肺结核病人。加莱阿齐—利西早就驳斥了这一点："我用听诊器所进行的检查不会欺骗我。"然后罗马大学别的医生在1954年所做的X光检查暴露了结核杆菌严重侵扰

对左右肺顶部所造成的巨大后果以及无数钙化点，但已经无法确定这些钙化点形成的时间了，可能已经存在 15 年以上了。上帝的恩泽存在，教皇庇护十二世没有料到他竟然已经碰到过了。

1948 年，教皇 72 岁，正当他想方设法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基督教民主国家和为击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赤贫之国的扩张而艰苦战斗的时候，他身体衰弱的首批可见的迹象出现了，从此之后他的身体每下愈况。

首先表现为前列腺肥大，排尿困难。一般地说，这种病可以用消除静脉充血的药物、镇挛剂、镁和饮食卫生规则来治愈。庇护十二世因此要求运用顺势疗法，加莱阿齐—利西博士同意了他的要求。

随之而来的是胸骨疼痛并且伴有心跳加速。心脏病医生诊断为老年性心血管硬化。心肌供血不足，心脏提前发生的补偿收缩破坏了正常有节奏的跳动，心脏变大，大血管，特别是主动脉，产生粥样硬化，无定形的脂肪在血管内壁聚集。“我又让教皇庇护十二世进行了顺势疗法，”加莱阿齐—利西说，“正是在教皇本人的推动下，我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医学这个特殊领域中理论的大胆和所引起的争议有兴趣。我成为这一研究小组的支持者。”

这些病症拖了两年，同时又出现了别的表现，教皇的医生束手无策。不断的呕吐，含有血痕及大量的酸。加莱阿齐—利西博士感到难堪，便说是中毒所致。奇怪的结论。这些症状伴随着整体的衰弱，引起各种功能的不足。同时，庇护十二世的记忆力减弱，他无法使精力集中，他自己主动放慢了脑力工作。接着，气管炎不断发生，

颈关节痛使他的胳膊、肩部和头部隐隐作痛。最后还有牙齿脓肿。但谁也不说。基督教徒，在这定为圣年的1950年，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皇的看法上。犹如法蒂玛的三名葡萄牙儿童在1917年9月有同样的启示一样，圣母四次向教皇显圣。好运气，人们清醒地接受着奇迹。

庇护十二世的胃疼却没有停止，随着时光的流逝，胃疼日趋严重。1954年初，又产生了连续的呃逆。加莱阿齐—利西博士应该进行一次X光检查，为此他本来应该强迫他伟大的病人吃钡，尽管他要反对，但钡是无害的，又是检查所必需的。他却没敢这样做。他的检查几乎和谨慎的触诊相差无几，他认为可能是癌症，便向教皇的德国侍从透露出来。在他们的建议下，他没有请专家相助，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却请来了一个江湖术士：保罗·尼尔汉。

尼尔汉居住在瑞士沃州的克拉朗，人人把他看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私生子，他钻研医学，但使他大赚其钱的是一种特殊的妙药，把从动物身上提取的细胞碾成碎末。他用这种合剂治疗百病，包括凡是科学所不能的大灾小病。这种合剂据说可以消灭皱纹，让组织重新年轻。这位魔术师急忙赶到梵蒂冈。

在罗马，特别是在教廷内，当尼尔汉将要进行的离奇治疗计划传出来的时候，人们一阵骚动。红衣主教们不赞同有人想给圣父注射他们所说的“野兽细胞”。但他们在宫廷最高一层说了不算，那里有教皇一套19间房间的屋子。这是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私人领地以及可怕的强有力的圣母帕斯夸利娜嬷嬷的私人领地。既然教皇愿意，尼尔汉就注射吧。通过对尿的阿布德霍尔登反应检查之后——

这种检查可以断定是否怀孕，1954年1月26日，瑞士人注射了一个含有下丘脑及肾上腺活细胞的混合溶剂，呕吐变得严重了。“我的细胞注射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保罗·尼尔汉说。痰及大便中又有血了。

应该相信，教皇庇护十二世尽管有病，体质却异常地好。几星期之后，他起床了，重理教务。7月，他感觉是那样良好，由嬷嬷帕斯夸利娜有意传出去的他已痊愈的消息在整个欧洲不胫而走。保罗·尼尔汉战胜了教皇的胃癌……

遗憾的是9月疼痛复起，教皇要求再注射细胞，尼尔汉又来了。12月，他给教皇注射了他在这中间经过改良的试剂。“使我非常吃惊的是第二天又出现了呕吐和呃逆，还有血。”他说，“这一次，除了通常使用的症状疗法之外，我还对他运用了我的‘生源疗法’，这种疗法会产生一种强健和恢复的功能。它以蜂王浆为基础，再辅之以各种顺势疗法及有机产品。”

身体的损伤扩大着，加莱阿齐—利西博士的思想里竟产生了疑问。这时，他在考虑另一种诊断，但还是没有对病人作深入的检查。“我自问，”他写道，“他身体状况如此严重是否因为中毒所致，因为他背着我和口腔科医生在齿龈上使用铬酸。这可能对胃造成伤害，甚至可以引起溃疡。也不能排除有另外的可能引起胃病。”真是莫里哀笔下的杀人庸医！

庇护十二世虽然处处小心，身体还是非常虚弱。他不得不同意吞钡，终于可以进行X光检查了，因为他实在太痛苦了。但保罗·尼尔汉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说X射线会杀死他注射的细胞，可能

会使治疗失去作用。嘲弄继续下去，变为技术讨论。加莱阿齐—利西博士保证说他可以巧妙地在圣父的肚子里抹一层铅而使那惟一的一部分消化系统暴露给 X 光以备检查，活细胞因此会受到保护。1954 年 10 月，检查在滑稽的情况下进行，缺少名副其实的诊断。但检查却证明了既没有癌也没有溃疡。“也许是一种胃炎”，加莱阿齐—利西说。

一直感到疼痛的庇护十二世只要求注射细胞。于是尼尔汉 11 月进行了注射。呃逆依然存在，同时还有上腹部的疼痛、虚弱和呕吐。此次教皇似乎是要死了。11 月 7 日，他叫来自己的医生，喃喃地说：“我们询问了您的德国同行（他忘了那位是瑞士人）尼尔汉博士。他对我们说我的生命今天晚上还没有危险，这表明明天可能有危险。我们因此想为这一伟大的过渡做准备。”

这次教廷感到不能再忍耐了，他们主宰了教皇的左右，坚持要叫真正的医生来了。罗马不乏真正的医生。会诊医生将限定为两人。教皇只接受君主主义者。两位被选中的医生 12 月 2 日来到梵蒂冈。

他们发现病人处于可悲之境。脉搏每分钟 140 次，血压很高。庇护十二世面色苍白，实际上已经脱水，他渴得要死。然而他不能通过嘴来吸收水分了，因为胃已经不能承受任何东西，但可以通过静脉进行补液。加莱阿齐—利西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两位医生进行了最为简单而又极为重要的补液，教皇因而重获生命。大夫在发布给公众尤其是发布给尼尔汉的拥护者的一项公告里指出：“没有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12 月 15 日，圣父恢复了体力，他可以正常地

承受一次胃路了。X光摄影这次使人们看明白教皇多年以来之所以胃疼的原因："食管裂孔疝。胃的顶端透过横膈突出于腹腔之外，同时使食管也穿破横膈。消化器官的这一小部分被夹住了，于是形成凸出。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做出诊断并不困难。这种病大部分情形并不严重，多为老年人所得，可以采用普通的化学方法治疗，例如胃敷药、镇痉挛剂和胃药。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需做手术，那是当疝病复发引起并发症或它所引起的贫血长期存在的时候。

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病好了，但他所经受的考验弄垮了他的身体。他79岁，性格变坏了。他现在表现出脑动脉硬化的传统特征，他的个人行为和在政务方面的表现比过去更为僵硬。他甚至对加莱阿齐一利西博士的治疗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当后者要给他用药的时候，而这次是意大利医生建议的药物，教皇却经常跺脚上楼而去，后面跟着他骂不迭声的医生。有时，这位一直根据简单逻辑作出判断的伟人，奇怪地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延续了三年，似乎在这个时期，1955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辞职，到某个修道院去了此残生。

但他的思维还常常是清晰的。1957年，科学发明了医学可以使人复苏的新技术后，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积极无痛苦死亡和消极无痛苦死亡问题发表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声明。直到现在，这一声明还常常被人们所提及。但他的远见到此为止。教皇甚至已经感觉不到直到1954年还继续存在在他心中的显圣。身体组织的破坏过于严重了。

1958年对教皇庇护十二世来说是严峻的。当然他先前在寸步

不离的医生的监护下可以增加一点重量和力量，但这种好转只不过是表面的、短暂的。呃逆再次出现。似乎不是食管裂孔疝引起的，因为此病并未复发。难道这是脑血管遭到破坏的迹象吗？医生们已经没有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答案了。10 月6 日，一次大脑袭击打倒了教皇，他丧失了说话能力和视觉。吞咽系统似乎被堵塞。初步检查表明整个右半边身体已经瘫痪。下午，形势安定下来了。病人似乎又有了一点意识。他极为困难地说了几个字，问他是怎么了，这是他最后的话。间歇的时间并不长，新的呃逆又像海浪一样淹没了他。他的呼吸只有全靠供氧了。正是这个时候保罗·尼尔汉这个无耻之徒，竟然带着他的注射器和细胞又来到了梵蒂冈。人们毫不客气地将他拒之门外。从此，对教皇庇护十二世来说，无论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还是寡廉鲜耻的江湖术士，均无能为力了。1958 年 10 月 9 日，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去见那惟一可以要求他汇报的人——上帝。

13. 列宁—斯大林

当罗斯福总统在美国逝世的时候，他的夫人禁止医生们对他的遗体进行分析。当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的时候，因为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检查他的尸体，肯尼迪家族遂把医生们的检查只局限于使总统身亡的伤口，他们不能解剖大脑的其余部分，更不能对他的肾上腺功能进行研究，他因为肾上腺功能衰弱而患有阿狄森病。西欧也采取同样谨慎的做法：当一个伟人死去的时候，他的亲友总是反对尸体解剖。原因似乎非常明显：有宗教传统的禁忌，有在某种类似亵渎灵物的行动面前所感到的不安。在某些情况下，亲友以这种办法来驱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死者有病，同时还出于对保护伟人所留下的形象的担心。传奇便是这样形成的。

然而国家元首们直到死的时候还始终主宰着别人的命运。他们生前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把历史打上他们的印记，因此他们应该把一切有助于对他们的统治作出判断的因素留给历史，自然包括

政治文件和政治秘密，甚至包括他们的疾病可能引起的反响以及他们的生命所结束的背景。

尸体解剖曾经有助于解剖学的进步。通过对疾病内部反应的研究，尸体解剖发展了医疗技术，它不仅对一个人的正确评价必不可少，并且经常有助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布隆施坦因，即托洛茨基，是苏联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列宁死后，他被排斥于政权之外并被流放国外。长期以来他坚持认为接班人斯大林毒死了列宁。斯大林去世之后，托洛茨基的对手们猜想潜在的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加速了斯大林的死亡。两份医疗资料证明这些看法纯属无稽之谈，列宁和斯大林的尸体解剖结果均保存在档案材料之中。

列宁享年 54 岁，医生们发现他脑部的动脉血管普遍硬化并且有许多梗死现象。血液流通已经停止向大脑，尤其是左半部分供血，四次脑溢血发作所产生的深刻痕迹一目了然。接近头颅的动脉已经硬化得非常严重。脂肪板堵塞了左颈动脉。人们在硬化的血管周围发现脑组织中间有许多不规则的小沟，这些小沟是脑软化的迹象。心脏也受到了影响。冠状动脉上有大面积的硬化迹象。

德国的神经病理学者奥托·伏格特研究过列宁的大脑。他发现有为数颇多的所谓锥体细胞，他将这些细胞与成绩优秀的运动员的肌肉细胞相比较，发现它们结构相同。伏格特在他的学术报告中两次提及苏维埃主席为增强智力而锻炼大脑的方法。他的看法反映了当今时代学者们所耿耿于怀的事情。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在大脑中测定何处是才能中心，何处是数学中心。但今天的看法是，人类所特有的思维现象关系到整个大脑。

九位医学巨擘对斯大林的尸体也进行了检查。人们因此知道苏维埃的第二任国家元首由于器官发生突变而丧生。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出血中心，它位于大脑左半球内部。血管的破裂破坏了很大的区域，引起呼吸和血液流通不可逆转的紊乱。

除了脑溢血之外，医生们还注意到心脏在左心室的位置上发生严重的膨胀。大面积的出血漫及了心肌、胃粘膜和肠子。大部分硬化的动脉在它们的内壁都附着着无定形脂肪，这是严重高血压的结果。检查的结果表明了斯大林所患疾病的特点，表明他的病不可救药。对他的照料并没有推迟最后的结局。

这些材料明确地告诉人们列宁和斯大林死于天然病症，像许多人被疾病夺去生命一样。但从人们所观察到的疾病损伤的广度来看，这两个病人拖延了很久。

1918 年 7 月 10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长吁了一口气，他终于登上了权力宝座，主宰了世界上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他刚刚公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一个宪法。他执掌着政权，和他一起执掌政权的有共产党的政治局及年轻的红军，还有暗中的警察机构契卡。六天之后，在俯视乌拉尔煤矿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个地方苏维埃枪毙了关押一年之久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庭成员。自从伊凡雷帝开始的帝国统治最后一任代表的被杀宣告了新俄国的诞生。

这在他的思想里只不过是一个阶段罢了，他着眼于更大的事业，让世界地覆天翻，创造一个没有国界没有阶级界限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像神圣的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各尽所能地工作，每个人都可

以吃饱。但他要小事休息,他已经奋斗了28个春秋。人肯定是一台奇妙的机器,只要他规定了一个目标,他就可以承受一切。疲劳、奔走、打击、苦役、流放、恐惧和饥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停下脚步。

要证明吗?他,列宁,一年以来,身上带着两颗子弹,一颗在肩膀上,一颗在胳膊里。向他开枪的是一个女人,卡普兰,社会革命党的铁杆分子,在莫斯科城外,米赫里逊工厂集会结束的时候。必须尽快地打击这些极端分子。医生们给他做了检查,他们以他过于衰弱的身体需要恢复为借口,不愿意立刻动手术。实际上他们缺少正当的办法,缺少有效的药物,死一个人太容易了。细菌到处皆是,感染病人成倍增加。俄国还必须发展科学。

俄国有哪一方面不感到缺乏吗?沙皇们将俄国破坏殆尽,使它饿殍遍野,满目疮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他们的皇宫附近自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农村,甚至就在俄罗斯,在边境上的那些遥远的非俄罗斯省份,便使你一目了然。28年里,不正是因为人民处于绝境,他的鼓动工作才得以成功吗?自从他离开故乡,伏尔加河中游上的辛比尔斯克以后,他所看到的只有穷困。

他的父亲乌里扬诺夫是教育视察员。这个末等贵族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他心目中的乱党。他抵抗着50年以来由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另外一个因素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弃了他的法律学习而参加造反者的队伍,他的哥哥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7月16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处死的那个人的父亲——的警察处以绞刑。他曾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勒拿

河陡峭的河岸上，他在那里探讨革命的奥秘并用了列宁——“勒拿河上的人”——这个别名，从此他的事业取得了进展。

首先是在基层，他鼓动人们在工厂里举行罢工，暗杀沙皇政权的帮凶。接着是在革命团体内，然后是在这些团体的司令部里。艰苦的争夺。头目多得不可胜数，上百种势力你争我夺，加之还有一些只为自己的腰包而抢劫的匪帮。为了能被人接受，列宁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还拥有一种才能，神学家们称之为上帝赐予的才能。

他谈起问题来开门见山，清楚，集中，他总是能抓住听众。无论是民众的公共集会还是秘密代表大会。他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别人。某些人说他似乎具有一种神力，他的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就这样他在 1918 年 7 月登上高位，但并不只是他自己。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相助，他上一年不可能推翻揭竿而起的自由党人和贵族，他们逼迫尼古拉二世退位，自己也想来统治一番。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农革命是让资产阶级革命火中取栗。资产阶级倒也不无办法，他们利用沙皇军队的残余。剩下的只是把资产阶级革命改头换面而已。在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下，力量对比失去了平衡。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建立。但托洛茨基要求国防委员的职务，这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因为他几乎就是红军的代名词。

列宁自问他的革命战友究竟怀有何等的野心，这自然没错，然而他的严重苦恼并非来自政治。正当他经过长期奋斗终于要享受首批胜利成果的时候(他当时 48 岁，这一年龄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人生的道路还长)，他的身体却突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他苍白的面容,他眼睛周围的黑圈,他慵懒的神态,都没能逃过他的左右的眼睛。他的秘书,当她们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经常发现他衰弱不堪。晚上,当他走回住处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警卫负责人在走廊上碰到他,他看见他步履蹒跚或者靠在一件家具上喘气。他的妻子娜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出身贵族的革命者,他与她20年前结婚。她可以证明1918年夏天他什么也没有写,他夜里不能睡觉。"我保留着他8月份拍的一张照片,"她说,"他好像病得很厉害。"

她了解他的病。在他暗中进行的漫长的分裂主义斗争中,在侨居外国特别是侨居瑞士的时期,她已经见过列宁类似的虚弱,然而不那么明显。医生们断定是高血压。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不遗余力地企图发现动脉血压增高的原因。他们发现了某些有利于高血压形成的因素:生活紧张、烟草、盐、脂肪,并且他们还可以进行基本正确的医治。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获得了不断的增长,他们却还没有完全弄清何以远离心脏的小动脉对正常的血液流通有时会进行过于强有力的抵抗。血液循环现象的复杂性证明探索是正确的: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烟草、肥胖、缺乏运动和血液中脂肪比例的改变容易引起动脉硬化,这种破坏血管的祸害;也有的时候,高血压是动脉硬化的结果。

列宁身上早就发现的高血压对动脉硬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粥样硬化的沉积使血管内部的直径缩小,所以受损的血管直接威胁着生命。要是血液凝固使血管堵塞那就是血栓形成症;要是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而随意停留,那就是栓塞症。要是血液流量的

减弱供给器官的氧气不足，器官就会过早地衰老。最后，这些受到损坏的血管膨胀、破裂，这就是内出血。这类事故打击的最好目标是眼睛、耳朵、大脑、心脏、主动脉、两肾、肠子，甚至还包括腿上的动脉。

当时，俄国的医学无法应付这些灾难。因此列宁知道自己面临着双重的危险。首先是他的身体，然后是他的岗位。人们刚刚赋予他最高权力。他的患病不能过早地公布，否则暗藏的欲望将立刻在他周围的人们中间增长起来。他只能独自私下放松一下。讲话和办公事的时候，他要强颜欢笑以掩盖他的病痛。他终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什么也不能动摇他的统治权。

恰好历史作美：沙皇政府的几名前将军纠集起队伍，在波兰、法国、英国等外国远征军的支持下，向新政权发动了进攻。托洛茨基于是不能脱身了，他率领年轻的红军进行抵抗。红军将被削弱，将经历种种磨难，但绝不会被战胜。有了红军，新生的俄国在 1920 年经受了考验并变得更加坚强。毋庸置疑，他懂得了首先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俄国，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谁敢保证暗中侵蚀他身体的疾病不会起作用呢？

假如说他有办法控制他身边的人的热情和欲望，他却对日益加重的疾病束手无策。某些微小的卒中（现在人们称之为阿尔瓦莱兹病）开始侵袭他的大脑。微量的出血破坏了向大脑供血的细微的动脉。但由于发生机体本身的自卫现象，由于血液中的凝固剂形成小凝块可以止血，损失因此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这些损伤存在着并使列宁感到疲倦。

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患病是在1920年12月30日，在第八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闭幕式上发言。但他竟难以坚持，要求首先讲话。他对与会者抱歉地说："很不幸，但我非常痛苦，我不能不这样做。"两天后，他到下诺夫戈罗德去休养，这个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的汇合处，后来改名为高尔基城以纪念诞生于此地的伟大作家。

必须做出医疗决定：这一决定在政治上也是可行的，因为约瑟夫·斯大林，这个列宁忠实的追随者的权威，在列宁的赞同下日益增长。他刚刚被任命为民族人民委员，特别是还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列宁因为安排了斯大林可以松一口气。

他比他年轻九岁，1920年41岁。他来自格鲁吉亚的哥里，即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一带。他母亲叶卡捷琳娜在别人家里洗洗缝缝兼做厨娘。父亲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给穷人缝鞋。他虐待老婆儿子，以至于儿子不认他。最后，他的生身之父在一场醉汉的斗殴中死于刀下。那一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10岁，他被一辆车撞倒，昏迷了10天，加上由于伤口没有洗干净引起血液中毒，使他最终左肘有些僵硬。

他母亲把他送进梯弗里斯的一家神学院，祷祝上苍能使他当上一个大主教。大主教们不是能赚大钱、吃好饭、有权有势吗？他20岁上脱下僧衣搞起革命来。这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和优秀的宣传家。列宁1905年第一次见到他，那是在芬兰的坦默福斯，当时是沙皇的封建领地。那时大家已经把他看做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信徒。他过去曾叫过柯巴，用以纪念高加索一本小说里的民族英雄，最后

他选择了斯大林,“钢人”,这个名字读起来声音响亮。和列宁一样,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很久以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坚强。

列宁感到很高兴,他并非不知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都认为斯大林成了他的助手。自1917年他从瑞士流亡归国,他就让格鲁吉亚人负责保卫他的后方。斯大林刚刚结束了西伯利亚的四年苦役。如果说在布尔什维克们的说法里他不是一个善于演说和论战的人,他们却对他的工作能力、他的注重实际以及他的非常谨慎众口一词。他组织了党,自己主宰着它,从而结束了他作为第一流政治家的学徒生涯。

列宁休息了一个月之后觉得恢复了气力,他认为可以抛开医生回莫斯科了。他在莫斯科看到的是一个困难的局面。俄国农民背离了政权。托洛茨基,这个一贯轻视农民的人,在农村大搞横征暴敛,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开始是秘密的,只是此起彼伏式的对红军的袭击,接着,这种反抗公开化了。国家中部,伏尔加地区和西西伯利亚,起义不断发生。托洛茨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结果在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起而造反。这一次政府慌了手脚。列宁不得不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修改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更加关心俄国人民的经济命运,放弃托洛茨基欣赏的战时共产主义,实行自由经商。

列宁被解决这些问题累得筋疲力尽。大脑疲劳和失眠随之而来,思维结构也失去了控制。高血压与他形影不离,他对自己身体的软弱十分恼火,但不得不又一次放弃指挥,重回他的避风港高尔基城。1921年12月15日,斯大林的老友,被他选中担任党中央书

记的莫洛托夫收到正在养病的国家元首一个简短的字条:"请按医嘱延长我15天休假。"

列宁政策的转变虽然使国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大为不满,在国外却受到欢迎。人们认为他抛弃了革命扩张主义。而戴维·劳合·乔治以英国的名义邀请苏联参加1922年4月份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会上将讨论欧洲的经济重建问题。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建议。西方对年轻的苏联的封锁将不攻自破。英国首相说,"列宁本人的出席将有利于会谈的进行。"

列宁于3月6日在冶金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人民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他说:"我要去热那亚。我希望我的病不会对此行造成妨碍,虽然几个月以来我无法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完成我所肩负的政府职责。"

几天过去了,医生们认为他的健康情况很坏,他们禁止他进行任何脑力劳动,只允许他在3月27日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短暂露面。他不可能去热那亚了,甚至不可能派斯大林去代表他,因为他要在克里姆林宫替代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日常工作。这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元首的疾病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危及了制度本身的发展。

最后选派去热那亚的苏联代表由于缺乏经验没能说服西方立刻取消对苏联的封锁。在1922年的4月里,列宁不得不接受另一个约会,和外科医生们的约会,他们企图取出他从1917年一直在身上的子弹。他们只取出了一个。苏联国家元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手术延长。

他头痛甚剧,失眠、呕吐、腹部疼痛。他有时丧失说话能力。领

导医疗小组的组长德国专家弗尔斯特预感到严重时刻的来临。他陪同列宁去高尔基城以便对他的身体状况就近监视。

这种谨慎是明智的。1922 年 5 月 26 日,大脑疾病的发作使病人休克。血栓堵塞了一条动脉血管。触及皮肤和注射可以证明身体还有反应。这是一种偏瘫,影响到身体右侧,这说明被破坏的血管在大脑的左半球。因为左半球里有语言中枢,所以问题显得更为严重。结论是列宁可以恢复功能。

7 月,国家元首部分地恢复了功能。弗尔斯特允许他接见几位客人,但禁止他谈政治。列宁听了这句话不禁大动肝火。10 月,他觉得能够回莫斯科了,他必须严格地注意自己的饮食,每天的工作不许超过五小时并且要每周休息两整天。

每周休假两天,像贵族老爷那样悠然能建设国家吗?列宁于是重新开始了权力赛跑,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马拉松赛跑。他动手准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定于 11 月举行,在会议上他将作俄国革命五年的总结报告。为了照顾国外各代表团,他的报告将用德文,长达一小时。但他将为渴望工作的疯狂呼喊付出代价。12 月 12 日,他倒在办公桌上,医生们闻讯而至,第二次打击。

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的血栓形成出现在大脑的左半球,由此而引起的瘫痪似乎并不比 5 月份的那次严重,但此次的后果却不能自行消失。列宁被固定在床上或一张轮椅中。他不能多写什么了,但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话含含糊糊,使人无法理解。但他可以口授,于是他通过秘书继续着他的政治,他不愿意自动放弃,不愿意引退。

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对斯大林冷淡起来。是对助手有健壮的身体感到不快吗？一个久病之人经常会对他身边的人做出这样的反应。他是否感到他的助手已经准备接班了？的确，斯大林现在已经掌握了可怕的权力。他是否因为觉得他的革命滑落别人之手而痛苦？斯大林善于要弄权术，他通过摆布别人，对他们封官许愿，而企图把党变成个人的政治工具。可列宁此时是否对格鲁吉亚人在政治局内的反对派听得太多了？1923年1月，他写了一份说明，说明里隐约地透露出他对斯大林的疑心。他好像对他的战友能否继续正确运用权力失去了信心。他说他在多次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粗暴使他不安，他考虑采取什么办法能使他离开他的岗位。

可是他的动脉血管不容他腾出手来。3月9日，第三次发作使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从此沉默了，心衰力竭。3月15日，他被送至高尔基城，在那儿，他毫无知觉，犹如一颗蔬菜，面临大限将至。

政治局里权力欲膨胀起来。托洛茨基急不可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追随于他的左右。人们于是又开始大谈国际革命的输出，大谈夺取全世界。党内这些所谓纯而又纯的分子公开声称政权过于右倾。斯大林懂得他必须为捍卫他的战略思想而战斗。他认为那些拚命鼓吹革命的人只想在世界上放火。他也曾想到了革命之火，但他认为必须首先建设一个强大的俄国。他不能让别人损害他已经开始的事业。加米涅夫有一天问他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他便给了他一个明确的警告："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窥视敌人，做充分的准备，复仇，然后去睡觉。"

列宁勉强支撑了八个月。1924年1月21日，第四次打击夺去

了他的生命，时年54岁。人民对于他的逝世并不感到意外，却也十分震惊，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悲伤为证。各处纷纷举行自发的追悼仪式。列宁的遗体被运到莫斯科，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停放。城里冰封雪冻，成千上万的人举行了游行，有些人几乎痛不欲生，滚在地上恸哭。

斯大林不顾其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反对，决定保留列宁的遗体，并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建了一个陵墓。开始是木结构的，1929年改为花岗岩建筑。对列宁的神化使极端分子大为恼火，托洛茨基尤甚。但斯大林比他们更接近人民，他知道人民会赞同他的决定。列宁虽然死了，但他将继续为俄罗斯服务。他留下的是未竟的事业。他身体急速的衰弱使他宏图难展。虽然他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办法贯彻他的理论，但他毕竟给穷人带来了希望，在他们看来，他便是这希望的化身。因此，希望是不能埋葬的，不能让希望腐烂。

1952年12月21日，在美国，当新选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庆祝胜利的时候，白宫有一份最新的卷宗在等着他：朝鲜战争。战争恶化了。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各不相让。应该制止战争，不要让它酿成世界大战。在伦敦，选民们又把温斯顿·丘吉尔召回到权力岗位上来，他已77岁，但这头老态龙钟的雄狮却颇不服老。在莫斯科，这一天正庆祝斯大林的73寿辰。

他已经不是官方画家笔下的那个慈祥的巨人了。他显得很小，只有1.65米，自从他的体重超出限度之后，他显得更为腰弯背驼。肚子鼓鼓的，脖子后头布满皱褶。裤子难以系住，他也就只好听之

任之。年轻的时候因为生过天花，一张麻脸变得干枯了，并且有块块红斑，那是血液循环不好所引起的后果。

他对到克里姆林宫来向他祝寿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医生们给他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使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坚持要使他变瘦，却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因为他弄虚作假，不遵守他们给他规定的办法，他们禁止他吸烟，不仅是纸烟而且包括烟斗。由于习惯，他的口袋里总放着一只烟斗，有时他就空着抽它，但他很快就拿下来了，他感到不快。

斯维特兰娜和所有那些为数不多的能见到他的人一样，觉得他脸色不好。她没有说，因为这是犯禁的事，以后她写到了这一点。她没有在他身边逗留很久。她怎么能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呢？他没有温情。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喜欢叫她小麻雀、小斑鸠，随着她的年龄渐大，他远离了她。

斯大林没有家庭，只能说某些人像是他家里的人。三个孩子？那是三个陌路之人。在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眼睛里，斯维特拉娜的哥哥瓦西里，一个空军将军，只不过是一个一事无成的酒鬼，他根本不再理他。这两个孩子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日达·阿里露耶娃生的，她后来自杀身亡。大儿子雅可夫是第一个妻子生的。斯大林一生中似乎只有这一次爱情，雅可夫便是这次爱情干瘪的果实。格鲁吉亚人 1902 年在梯弗里斯与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六年之后雅可夫出生。但叶卡捷琳娜产期患病，死于数月之后。有人知道他对她的死痛苦异常。他站在棺木前，手放在胸口，低声说道："我心中是那样悲伤，那样难言的空虚。"的确，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见他动过

感情。雅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于德国的一个俘虏营内，斯大林对此无动于衷。

这个自己斩断情根对旁人毫无情感的人，使许多人甚至包括那些盖世英雄在精神上感到可怕。戴高乐将军即是一例，他曾向专栏作家雷蒙·图尔努谈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统治下的苏联产生并笼罩着一种巨大的恐怖。阴谋、压力、奴役、监狱、苦役、刽子手。有多少人无辜地牺牲？谁也不知道。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有一个无辜受害者，良心也应该感到不安。任何人也无权杀人或指使别人杀人。

由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斯大林也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再举密切注视着苏联的戴高乐将军为例。法国总统说他“集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于一身”。历史上，建设的沙皇所见不多。斯大林像他们一样进行了建设。大堤和工厂组成他的金字塔。诚然，他留给后人的不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富埒欧洲美国的社会。但后来者继承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

1952 年 12 月，虽然他已 73 岁，他能完全享受荣誉给他的快乐吗？除了他通常那几个政治伙伴来听候命令或恭维他一番之外（并且总是那几个人，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加宁），没有人再到他奥索沃附近的私人领地去。他生活在那里，而不在克里姆林宫，那里离莫斯科不远。他只有白天才到克里姆林宫去，但他的屋子总是灯火通明，给人以夜里工作到很晚的印象。在他 1919 年获得的宽敞别墅里，他不再大宴宾客了。他经常和衣睡在他那间斗室的窄床上。他不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包括人数愈来

愈多的警卫。斯大林不论人多人少，只要有人在场就觉得受不了。他被一种可怕的病折磨着，即对人的憎恨。

此病时间不长。苏联三年以来曲背拱腰，心惊胆战。国家安全部只要看到克里姆林宫主人眉头一动便会采取行动。他身边那些不无恐惧之感的医生知道问题的所在。他患有严重的动脉硬化症。血管疾病对大脑的影响自然会反映在精神上，故而感情冲动会不由自主地爆发。

斯大林听凭一次心脏或大脑出血的摆布，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包得很紧。他自己在 1945 年就已经知道了。四五年以前，他根本不理会医生的警告。你劝他节食吗？他愈要在饭桌上暴饮暴食。你劝他注意休息吗？他愈要加紧工作，以至于打乱生活节奏，日夜颠倒。当人人可得的那些小病他也没能躲过的时候，他拒绝服药，却以农民的办法应付：往水里倒几滴碘酒，这是他的万灵神药。其实毫无用处。

在雅尔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开过最高级会议之后，他那格鲁吉亚人的强健的身体垮了下来。在克里米亚进行的这场三人赛并没有使他的脑子感到很大的疲劳。行将就木的罗斯福无法自卫，只好向他的大部分要求让步。丘吉尔隐约地承认大英帝国已经完全失掉了它过去的威风。因为有盛大宴会，加之过去疏忽日久，斯大林开始感到头痛，继而是恶心、呕吐、耳鸣和轻微的眩晕。几天之后，病势趋向严重。胸口像被钳子夹着，前后都疼痛难忍，还有阵阵的隐痛。闻名全球的心脏病专家之一米亚斯尼科夫教授给他做了听诊，没有发现异常。但一量血压他就清楚了。血压降低，这是一个

常见的信号。心电图证明了他的判断：心肌梗死。虽然并不严重而且只局限于心脏的顶端，却不容易治疗。当时俄国医学还没有有效的抗凝剂。从此斯大林必须时刻小心，必须把镇静剂总带在身上。

第二次心肌梗死和第一次一样范围很小，也和第一次一样只有俄国医生知道。第三次的后遗症虽然也秘而不宣，1945 年 7 月却没有逃过美英两国执政者的眼睛。五个月内，心脏病三次发作，不管一个人多有力量，也总要给他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战争在欧洲刚刚结束，在远东正是尾声。哈里·杜鲁门总统取代了逝世的罗斯福。德国的战败需要做出某些决定，需要占领和控制它的领土，需要对战犯进行惩处，需要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还需要划定波兰的新边界。因此必须进行另一次最高级会晤。它将在普鲁士波茨坦的太子夏宫中举行，红军为此把这座宫殿布置得极为豪华、美观。这次会议始于 7 月 17 日，拖到 8 月 2 日结束。斯大林没能按时到达。他身穿礼服，蓝裤子上两条红道，白上衣，金肩章。蜡黄的脸色以及不寻常的迟到使杜鲁门和丘吉尔大为不解。斯大林只是一边苦笑一边指指胸口。他们懂了，他们把此事记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

事情的不可预料竟到了这种地步。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斯大林是个健康人，他捉弄坦白的罗斯福，而丘吉尔却眼睁睁地看着，只能对自己被迫扮演配角暗自生气。150 天以后，在一个衰老不堪似乎决心从此默默无闻的丘吉尔面前，斯大林突然变得渺小起来，他很少说话，很少动作，承受着杜鲁门的进攻，后者是个一刻也不能安静目光冷酷的对手，他因为没有受到真正的抵抗而惊诧不已。当然免不了要争论几句，但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杜鲁门因为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而变得非常自信。他等了七天。24日,他只是这样说:“美国终于有了一种高级武器。”这种武器在新墨西哥州的不毛之地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不久,它所展示的可能性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原子弹。第二颗原子弹正在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货舱里,经过太平洋运往提尼安岛。8月6日,它被轰炸机扔在广岛。美国人又制造了第三枚原子弹,三天之后,爆炸于长崎。美国总统预感到会有特别的反应吗?斯大林没有任何激动的样子,他希望“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来反对日本人”。

政治评论家认为苏联国家元首之所以表现那样冷漠是因为他通过间谍已经掌握了美国的秘密。医生的解释是,一个患动脉硬化并对自己病状的严重性了如指掌的人对外界失去了兴趣。他关心的只是他的血液凝固时间的变化或者血液中是否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的因素。斯大林1945年初开始的闭关自守在克里姆林宫里有目共睹。正是这种状态导致他可怕的内心冲动突发。

最初的迹象?他批评精神的丧失。满足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种自卑感。他在格鲁吉亚从事政治鼓动时期的青年战友可以作证:“柯巴从来不能接受别人的玩笑。”1920年,他在政治局里成为《真理报》的漫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惟一不敢讽刺的人,虽然后者连托洛茨基和列宁都没有放过。1945年在雅尔塔,当罗斯福告诉他他和丘吉尔称他为“约大叔”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从1945年7月1日开始,嘲笑和讽刺在克里姆林宫内成为一种亵渎君主罪。

斯大林思维功能衰退的第二个迹象是他对科学特别是对医学

所采取的态度。自从他心脏发生危机以来，他意识到只要有一条动脉顶不住自己就会垮台。俄国的命运因此和这些细微的血管紧密相关。身体的脆弱使他成为医生们的奴隶，他们比他更有权威。因此他对整个医务界的仇恨日益增加。

他早以捉弄真正的科学名士而提拔江湖骗子为乐。因此农学家李森科想像出一种科学界认为奇耻大辱的遗传理论。他认为后天的性格可以像先天性一样的遗传。尽管这是一派胡言，也许正因为是一派胡言，李森科荣获斯大林奖金并成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而亚历山大·博戈莫列茨呢？一个惯于在生物学界胡说八道的家伙，长期以来在基辅搞科学上的以假乱真，他声称发现了战胜衰老的办法，每个人都可以活到 140 岁。为了在动物骨髓的基础上试制酏剂，他收到了无数贷款。斯大林本人将服用他制造的酏剂。他是俄国自伊凡·巴甫洛夫以后最伟大的学者，而后者已有定论，他因为发现狗身上的条件反射而获得 1904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金。1946 年，这个博戈莫列茨的神话便破灭了，因为这个斯拉夫浮士德尽管泡在他的长生不老药中，却在 65 岁上不幸死亡，但神话依然存在着，当然只存在于斯大林的脑中。

一个国家，当领导人飘忽不定的时候，怎么能前进呢？连本来一帆风顺的五年计划也中途停滞了。从此一切都驻步不前。1949 年，寸步难行的局面处处可见。俄国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斯大林时代的第二个黑暗阶段。

斯大林的头脑，由于动脉硬化——阿尔瓦莱兹病的一种隐秘形式——的发展，变得混沌一片。随之幻象在思想中的产生，他的生

理状态也起了变化。常常感到舌头不甚灵活。这些幻象使他过去如此敏捷如此专注的思想穷于应付。谁要否认他的天才呢？人们不是说他的判断和他的行动永远正确吗？各部接连不断地收到指令，这些指令只能引起混乱。新形势实际上把苏联引向一种虚无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连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不会赞成。苏联成为一个反基督教、反犹太人、反美、反西方，一切都反的国家。斯大林自己主宰着脑力劳动领域，科学、哲学，尤其是医学。它们屈服于他的面前，追随着他的脚步前进。

根据他的命令，科学院证明了俄国学者在医学的一切领域内优于外国学者。历史学者们肩负的使命是修订这个问题上先辈及国外的论述以便使俄国研究工作者的科学成果取代世界其他各地医学界人士的研究成果。全世界通用的法国人克洛德·贝尔纳和德国人海尔曼·海尔姆荷尔茨及鲁道夫·维肖的教材因此被轻视，被抛弃。

甚至在苏联学者如何工作及如何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的问题上，也能感到斯大林所施加的压力。禁止同外国互通消息，通信联系必须受警察的监督，只允许引证苏联现代或俄国古代的研究成果，禁止援引国外的学术报告。苏联医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由于与外界的隔离（外部源泉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它有僵化的危险，并且迟早要陷入绝境。

那些不热烈拥护这些敕令和敢于反抗的分子将以叛逆、国家叛徒和间谍论处，他们将被隔离、流放和处死。科学院的布科夫教授成为学者们的检查官。由他来揭露过失，判处和定罪。没有人能逃

过他的魔掌，包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和过去曾受过斯大林亲自奖赏的人。71 岁的生理学教授琳娜·西捷仑夫人，这位因有关血脑屏障的研究闻名世界的斯大林科学奖金获得者也属于科学恐怖的受害者之列。人们谴责她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最近的一个学术报告里引证了外国人的说法，科学院收到几封写给她的信，等等。1949 年春的一天夜里，她被捕了，被软禁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她在那儿呆了五年，一间斗室，形影相吊，每天只以面包白开水度日，没有书读，没有纸笔，与世界完全隔绝。

1952 年 12 月，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斯大林成为闭门不出的暴君，痛恨自己人。政治家们虽然并没有被怀疑为意识形态软弱，却也得不到他的青睐。在 10 月份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只露了两次面，而且时间很短，一次是开幕式，一次是闭幕式。过去，报告总要由他来做，这是他的特权，这次却交给了马林科夫。熟谙内情的人立刻把马林科夫当成了斯大林的继承人。斯大林的讲话还不足十分钟，代表里最清醒的人注意到他的口头自我表达已经变得困难了。从此，关于他病重的流言便四处传播。

然而他却干了一件举世吃惊的事情：他的迫害狂公开爆发了。事情公开于 1953 年 1 月 13 日，《真理报》最后一版刊登了一条小消息："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了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这就是"白衫阴谋"。

有五位医生被指控，他的名字使全体苏联人感到震惊。他们都

是克里姆林宫所熟悉的人，是既有荣誉又有钱的人。他们给高级人士看病，外国政府及外国共产党的要员，例如法国的莫里斯·多烈士，都来莫斯科找他们治病。人们怀疑他们暗杀了安德烈·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这两位政治局委员死于一年以前，似乎患着严重的心脏病。

指控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斯大林要求迅速审判。罪犯将要被绞死而不是枪毙。但在处决之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要求供词，他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打，打，打，”他对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说。他之所以有把体罚视为最高处罚的倾向，那是因为在他少年时代，他父亲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打他也打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

没人相信这一显然人为制造的“阴谋”，他们思索着斯大林究竟要干什么。列弗尔托监狱里的被告的名声远扬国外。苏联报刊几乎透露不出任何消息。只有俄国人，而且必须是官方语言的研究专家才能猜透那些文章暗含的意义。人们可以看到三分之二所谓的罪犯都是犹太人。苏联是否像当年沙皇大肆屠杀犹太人那样又要开始一次反犹太人运动？报纸的大字标题却清清楚楚。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雷季娅·季马舒克受到颂扬，大概是她挫败了医生们的阴谋。她是国家安全部组织内的杰出成员。为了表彰她的革命警惕性，人们授予她列宁勋章。可是季马舒克并没有长久地占有报纸的大标题。斯大林被一次脑溢血打倒。1953 年 2 月 28 日晚上，国家元首把他的四个政治亲信唤至别墅吃晚饭，他们是赫鲁晓夫、布加宁、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像每次和斯大林一同吃饭一样，总是拖起来没完。第二天斯大林没有在克里姆林宫出现，这使警卫

和秘书们颇为吃惊，但谁也不敢去问。到 3 月 1 日晚上，安全部门的一名军官用电话召集上面的四个人。他们赶到别墅，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毯上，已经毫无生气。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睡眠，他处于昏迷状态。

护理国家元首的心脏专家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和他的神经科医生科诺瓦夫教授是列弗尔托监狱里那些可疑的等待判决的医生们的朋友，他们进行了初步诊断。他没有希望了。一条动脉血管在大脑的左半边破裂。脑溢血已经波及到大脑这一部分的全部。身体的右侧因而全部瘫痪。似乎永远丧失了说话能力，但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的呼吸也发生了紊乱，并且伴随着脑溢血还出现心肌梗死。

病人不能搬动，只好就地治疗。米亚斯尼科夫和科诺瓦夫教授的助手们，七个最优秀的医生，带着急救用品赶来。心电图证实了心肌梗死的存在，比 1945 年的那一次要严重得多。新的临床症候出现，说明斯大林随时可能会被夺去生命。脉搏发疯一样地跳着，肾功能紊乱，尿素在血液中的含量增高。尿毒症危机的发展可以根据不均匀的呼吸作出估计：先是长时间的间歇，然后又开始呼吸，呼吸愈来愈快，慢慢减弱，渐至停止，接着再重新开始。这种节奏被称为潮式呼吸，似乎也是由于对大脑的呼吸中心供血不足引起的。

医生们在他们的第一次公告里丝毫也没有隐瞒他们的结论。“这是死人的临床现象，”他们西方的同行说。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内部通知和病情公告一同出现在俄国报刊上。“对斯大林同志的治疗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密切注视下进行。”在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里，没有人再相信那些为保卫生命而战斗的人们了。

但他们还是要战斗。他们向可以使斯大林中毒的尿素进攻。而心脏机能不全便显得突出了。血压一直很高,心脏跳动的节奏愈来愈快并且失去了规律。心脏扩张,疼痛,同时脑血管的破裂继续蔓延。化学方法无济于事,医生们高超的手段无济于事,不断的供氧无济于事,米亚斯尼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战斗了四天,他们一点一点地进行反击,却不得不败下阵来,他们捍卫的是俄国医学的名誉。

58 小时之后,他们筋疲力尽,又气又怕地承认他们已无能为力了。斯大林似乎恢复了知觉。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握着他强壮的手。一个女看护企图用小勺喂下一口水去,他双唇微微一动。是撅嘴还是微笑? 突然,他的脸变黑了,喘不过气来。他的左手扬起来又落下,这时是 1953 年 3 月 5 日 21 点 50 分,苏联国家元首的脸平静了,僵住不动了。斯大林从此不能再骂人,不能再打人,也不能再咆哮了。在隔壁屋子里,他的儿子瓦西里接连三天烂醉如泥,不断地说着:“他们杀了我的父亲,他们杀了我的父亲。”

14. 尼基塔·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971 年死于莫斯科。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他为自己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后果付出了代价。

像他的前任斯大林和列宁一样,他对自己身体上早已表现出来的症状长久地不予理睬:例如动作的不受控制,感觉的迟钝,感觉器官功能的衰退。在一部电影里,人们看到他行走困难,迈不开步子。专家们称之为延髓的症状一般是神经中枢受到了损伤或者是大脑软化。开始接触这份医疗档案的时候,任何一位明智的医生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当时 77 岁的老人,只要最近有一次血管疾病发作他便难以逃脱。血栓堵塞了向心肌供血的冠状动脉,他死于心肌梗塞。

七年以来他没有掌权。人们知道他靠养老金过活,住在离首都不远的一座别墅里。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逝世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震动似乎比对苏联的震动还要大,因为苏联政府无视他的葬礼。在

外部，恰如相反，评论蜂起。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他的粗犷和他的气质与平时那些装腔作势的苏联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些人还利用这个机会忆及往事，认为他作为国家元首被免职未免过于粗暴，他们引证当时主宰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对此事的评论：

“人们采取肮脏手段罢了他的官，糟糕。一个政府不能这样对待他的领导人……”

“……这是一张相当讨人喜欢的脸，只不过是一张脸而已。但和这样的一个政权打交道真是令人讨厌，它的首脑昨天还是半神，第二天却成了一个冒失鬼，一个可悲的毫无主见的家伙。”

很少有人知道克里姆林宫为什么和怎么会采取这一决定。因为苏联当局对此只字不提。十年之后，在西方，在一个消息可以自由传播的国家——美国——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美国的法律认为国家元首违反了宪法并将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以免职相威胁，强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尼克松总统使法官掌握了一件可怕的武器：水门事件。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倒没有遭遇水门事件。但像在华盛顿掌权的尼克松一样，“K 先生”——这是他的绰号——没能控制住他精神上的紊乱。苏联政府把他赶下使他忘乎所以走向极端的政治舞台，借以开始弥补自己的鲁莽所造成的损失，它应用了一句俄罗斯人民喜爱的格言：“如果当政者没心管事的话，他的耳朵也就听不进去话了。”这是一句丹麦谚语。

赫鲁晓夫是在 1956 年 2 月中旬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世界发现的。按照党章的规定，党代会每四年举行一

次，所有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对此均十分注意。每次会上，社会主义都要给未来的政治定调。在那个月里，赫鲁晓夫干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的事。他粉碎了斯大林的神话，搬倒了偶像。他全说到了：任人唯亲、流放、处决、对法律的侵犯、病态多疑的性格、经济上的失败、军队的恶劣作风，一幅阴森可怖的图画。他穿着从最近的商店里买来的像口袋一样的衣服，伸出他那难看而又结实的小脑袋，声嘶力竭而滔滔不绝。过去，这儿是人们高唱赞美诗的地方，而现在听到的只是一连串的责骂。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他不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吗？而且，党的各级官员，这些神秘莫测的人物围在他的左右，对他不予干涉。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将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人们不仅注意到那激烈的言词而且也注意到讲话者本人。这个人很久以来便在官方仪式上出现，属于斯大林左边、与斯大林右边的元帅和将军们恰成对照的文职官员，但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远离主宰国家命运的领导核心。他与刚刚谴责过的统治的最后联系具有象征意义：出身格鲁吉亚的最高统治者的葬礼是他组织的。人们发现自1953年以来，他隐藏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背后，是苏联真正的主宰，最后终于将他们甩掉。

同年的4月4日，又经过他的手释放了斯大林最后一批受害者。即九名被关押了80天的医生。他从奥地利撤回了苏联军队，裁减红军人数，和埃及的纳赛尔进行了首次会谈，又在贝尔格莱德和铁托进行了接触，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解冻。他一边进行充满活力的紧张的外交活动，一边乌龟一样耐心地把国内的政治

机构抓到自己手里，他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苏联真正走上了新生之路。1956 年 2 月发生在莫斯科的爆炸事件是他事业的过渡，是进入伟人世界的考试。30 年的奋斗，与信徒、盲从、善人和恶鬼耳鬓厮磨的结果使他受到了磨练。他已经准备就绪，奇怪的是一个革命者竟然有这样的信念："一个人不管他开始多么无足轻重，"他说，"他总能达到命运允许他达到的顶峰。"

他是何许人也？他来自何方？

他出生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在木板房和圣像之中，在农民和文盲的世界里长大。8 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放牧生活，但不是自家的牲畜，因为他们太穷了。人家雇用了他，他成了放羊娃。父母去乌克兰，在顿巴斯当了铁匠，当时，沙皇政府三分之二的煤都由这个重要的煤炭基地出产。父亲死之前把儿子召来。赫鲁晓夫 15 岁成为孤儿，无处可投只好当了矿工。他表现得"非常活跃，忙个不停，就像他的名字所表示的那种昆虫一样。赫鲁晓夫，乌克兰语就是金龟子"。如果他身体够高的话，他可以成为哥萨克骑兵。他像哥萨克一样暴食暴饮，唱歌跳舞，吹笛子，样样都会。他也像他们一样地生来好斗。然而他没有去舞刀弄枪，却献身给另外一种战斗。22 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共产党。那正是困难时期，尼古拉二世的帝国摇摇欲坠。列宁回到祖国。俄罗斯即将发生变化。

没有新政权就没有赫鲁晓夫的一切。新政权使他得以摆脱煤矿工人平庸的生活。但如果你谈到他的传记的话，你一定会问到他怎么会高升的。理论使他感到厌倦，人们说。他们还说，把他与那些辩证唯物主义大师相比，他简直是一个文盲。他们说他有好动

癖，像浮沉子一样跑遍工地和农庄，教农民怎样吃兔肉。他喜欢行动，这是明确无疑的，但办公室里的功夫对成为一个莫斯科州委党的第一书记、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即便他没有参加斯大林 1949—1952 年的最后一次屠杀，30 年代在基辅的屠杀却是他领导进行的，乌克兰《真理报》曾为此表彰过他的干劲。不这样，便不能在格鲁吉亚人的背后占据一个位子。

然而自从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大显身手之后，他再也没有任何使人吃惊的举动了。西方的自由派自从 1956 年春天晕过一阵之后开始失望了。红军对匈牙利的入侵，部分是因为煽动所致，清楚地证明克里姆林宫的新星仍然是共产党人。虽然赫鲁晓夫的平民作风使人觉得扑朔迷离，但他并不是一个冒险主义者。直到 1958 年 3 月 1 日以后他才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形象。那一天，他排挤了尼古拉·布加宁同志，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却依然兼着党的总书记职务。从此，他掌握了国家的全部最高权力，只有这时，他自我变化的细微迹象才开始显露出来。

一种快乐，一种酒后的兴奋，一种感情外露的需要，表现为高谈阔论，插科打诨，文字游戏，放肆无礼，狂暴和对自己暂时失去控制。神经精神病科医生称之为抑制解除。他在此之前一直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警惕着自己过高的血压。心脏发生的某些小问题甚至使他感到担心。他忘记了这些，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已经成为一个伟人，他，一个渺小的俄罗斯人，半是工人，半是农民，现在可以和东西方的所有伟人平分秋色了。一种难以克制的需要，使他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使他要把自己的力量与盟友及敌人的力量相比，使他

代替了他的大使及部长。亲自去看，一切都亲自动手，成了他的一杯美酒。斯大林很少出洞却也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他和斯大林不同，他跑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第一次起飞就使他在 1958 年 7 月到了北京。

似乎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就诊断出 K 先生的躁郁精神病日益严重。在此之前，只有他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知道。她没有片刻安静的丈夫在极端的高兴之后随之而来的经常是忧郁。她说他经常头疼。他在外面、在表面上很容易加以掩盖。可是执政的结果是使他丧失了批评精神。他怪癖的性格而不是快乐的性格，经常使他由尖锐的嘲讽一变而为愤怒甚至恶言满口。但这些都留不下，留下的只有兴奋和怪诞。

赫鲁晓夫虽然肩负着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却依然唱歌，跳舞，饮酒，玩耍。他是新闻记者们高兴见到的人。当他谵妄症发作的时候，他过多的话语、他真真假假的愤怒会使他感到窒息，他会失去控制而胡言乱语。随后他的左右将会看到他精神颓萎。克里姆林宫里严肃的高级官员此时还不需要医生，以求进一步地明白这种抑制消除所能引起的难以挽救的后果。但他们已经对他们的领袖做出判断：在这个政策建立在核科学所带来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的新时代的开始，他还能产生影响吗？

他失去控制的最先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K 先生 1958 年 11 月 10 日宣布废除苏联和美国、英国、法国之间有关柏林的协定，他只不过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意思而已：两个德国不能统一。但由于他言词过分激烈而引起了冷战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历时四年之

久。1959年6月，由于意识形态争吵的加剧使他与中国对立，他便宣布最近与北京秘密签订的核协议无效。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1959年7月来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时候，由于他日趋严重的精神紊乱，也发生了一起发人深省的公开事件。

应该承认，赫鲁晓夫并不能为这次争吵负责。尼克松是为了主持一个美国居住条件展览会开幕式而来的，但他选择了这个不寻常的舞台以便向美国人证明他有资格继承艾森豪威尔。K先生并没有隐讳他对展览会所体现的生活水准的惊奇。尼克松却傲慢无礼地把讨论引向政治，赫鲁晓夫历来如此，只要给他一根棍子，他就会横冲直撞。于是，当着一群目瞪口呆的外交官，决斗开始了。

他们的争斗却使精神病医生大得教益，原来是躁郁性精神病人对强制性精神病人的斗争。好斗成性的赫鲁晓夫临时应付。他想用自己的俏皮话、用自己的活跃和幼稚的骄傲使对手贻笑大方。他指天发誓，俄国将赶上和超过美国。尼克松早已对这场决斗深思熟虑。他小心翼翼，力图完美而又火气十足地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但他依然难以压抑自己的冲动："玩火者必自焚！"他这样说。两个政治家，当住院病人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意识时，危险便会达到这种地步，关于厨房设备的一场幼稚的争论便产生了战争的威胁。

赫鲁晓夫同年9月对美国进行的快速访问给人们吃了定心丸。但他的访问起初并不顺利。苏联总理在华盛顿与新闻界发生了口角，便以中断访问相威胁。在洛杉矶，和市长唇枪舌剑地干了一仗之后，他又故伎重演。但旧金山给他以热烈的欢迎，平息了他的怒火。在衣阿华的玉米地里，在超级市场和快餐部，他看傻了眼。他

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时两天的会谈，结果使他喊出了“苏美友谊万岁!”冷战被遗忘了？如果说政治艺术因赫鲁晓夫之故而渐渐失去了它的可靠性，但它至少增加了一点新奇的色彩。戴高乐将军也领教了克里姆林宫新主人使人摸不着头脑的剑术，他总结了许多对国家元首的看法：“斯大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赫鲁晓夫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他是果戈理，是塔拉斯·布尔巴。”

躁郁症患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忽而感到有罪，忽而感到欲望强烈，没有人能预见他们的反应。他们怀着羞辱和惩罚别人的强烈愿望，跳上吞食一切的人肉筵席，一个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吃人巨兽，60年代初便开始他最后的庆典了，好像被一种难以理解的破坏欲推动着似的。他向中国挑衅，结果引起了北京的仇恨。在俄罗斯上空捕获的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及其飞行员使他得以破坏巴黎高级会议为乐，以公开侮辱艾森豪威尔为乐，虽然八个月以前他曾在戴维营热烈地拥抱过他。他高声叫道：“让这样一个人管理国家是危险的，他能干出某些将来难以补救的事情。”他谩骂的结论却和他的话矛盾，他并没有加以比较：“可以让他领导一个幼儿园。”他的话脱口而出，如瀑布，如海浪，但他似乎抓不住它们的意思。

表明他精神病态严重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联合国，1960 年 9 月。美国人已经不想接待他了。他作为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打上门来。他忠实的臣属簇拥着他：哥穆尔卡、卡达尔。还有几个不结盟者：铁托、纳赛尔、尼赫鲁。他受到了冷遇，除了曼哈顿之外，赫鲁晓夫被禁止涉足美国领土。示威和斗殴在苏联代表团的住处、在派克大街、在联合国大厦外面接连不断。赫鲁晓夫坐

立不宁。他要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辞职,攻击他是殖民大国在非洲的工具。联合国大会多数人反对他的提议并向瑞典人发出欢呼。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用拳头擂桌子。

作为新闻消息这是可笑的,但作为苏联政府政策则是令人悲哀的。丑闻延续下去直到10月。仍然是在联合国。会议议程预告将进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辩论,这场辩论还没有结束就变得滑稽可笑了。他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攻击,后者请他也给予那些生活在铁幕后面的人民以独立的权利,赫鲁晓夫脱了鞋,用一只漂亮的黄皮鞋敲打桌子。忽然,他的愤怒又好像被魔法驱走,他变得欣喜若狂,一边笑,一边继续敲桌子。主持会议的爱尔兰人布兰德为了让他安静下来竟然把木锤敲断,赫鲁晓夫向他高声叫道:"联合国活该倒霉,这是它瓦解的开始。"

这同时也是他自己人格瓦解的开始,这一点并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的秘密要求之一就与苏联国家元首有关。考虑到不久的将来不可避免地要迎战K先生,他希望了解他的精神状况。中央情报局的医生们负责描绘他的形象。他们已经拥有许多材料,知道苏联总理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对人民的态度尤感兴趣。他们注意到当别人用冗长的讲话灌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很快就减弱了。肯定无疑,他容易疲劳。他狂暴的精力不能持久。他们发现他身体处于紊乱状态,赫鲁晓夫患着颞动脉炎。这种病通常产生在60岁左右,使整个身体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它表现为轻度的发烧,血沉加速,太阳穴部位的血管因血栓形成而变厚,从而引起头疼。

但是布赖恩·韦奇的分析更为深入。他是中央情报局召集的20位专家之一。八年之后他才将当时写给肯尼迪总统的报告的内容透露出来。

他说:“赫鲁晓夫的性格并不特别复杂。从技术上看来,这是一种狂躁症的性格(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他的力量存在于与此类性格一致的特性之中。这些特性,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控制,但不能长久地信任。

“赫鲁晓夫能非常迅速地抓住和利用眼前的局势,他以敏捷闻名(他为此感到骄傲),他的敏捷以纯粹的机会主义特点为基础。他非常易感,只要发现有利可图便立刻准备行动。事关他自己确定的目标,他很容易冲动,但人们可以在一场以柔克刚的讨论中诱惑他,使他脱离既定目标。他能够从一个既定的议事日程中取利,利用其中的哪怕是支流的弱点。这种技巧,当他被引上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他则弃之不用。要与他对阵,必须对所提及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看法,并且要在讨论的过程中采取灵活的办法将这个问题提出。

“这是个重视实际、行动率直的人。他喜欢处理具体问题,特别是引人注目的问题。他讨厌含含糊糊的观点。不管讨论的问题何等重要,苏联国家元首都希望立即得到一个直接的回答。如果他似乎没有理解,那是他故意等待。不过他充沛的精力和说话的愿望人们还是可以利用的,只要给他短暂的回答,开始是不完全的回答,这样就给他留下了自我暴露的时间和余地。

“赫鲁晓夫忍受不了挫折,如果遭到别人反对他会发火,他会暴跳如雷,但很容易把他引导到另一个题目上去。当必须表现出坚定

不移的时候，只须简简单单地让对方知道就行了，不用过于坚持，然后便谈下一个题目。‘打败’这个人而不容他选择是危险的。

“他需要直接对话。礼仪和过分强调尊严容易使他走上极端。即使对K先生的信任所带来好处不应做很高的估价，但也切不能低估当他对某人不信任时所产生的恶果。

“他完全能够容忍意见分歧，特别是当他自知对别人进行了侮辱性攻击的时候。但是向他解释以使他相信或说服他，那是没用的。他可以不再前进，但不能受人摆弄，并且他也不同意摆弄别人。

“当讨论失败的时候，他可能丧失理智，在某一问题上表现得很顽固。这时应该采取下述办法：建议将问题暂放一边，先谈另一个问题，然后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如果他依然固执己见，建议再往后推一推，假设他依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弃自己的看法，则应该像铁托那样，离开房间。

“作为共产党人和俄国的民族主义者，K先生有他小小的不容更改的世界。必须了解他的哲学：(1) 国家应该置于个人之上；(2)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永久性的冲突；(3) 西方资本主义试图消灭苏联。相反，他不能理解我们关于个人自由的价值，不能理解两种制度中和的可能性或者民主国家的自由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完全理解某些概念，例如大多数的法则，面临国家决定的个人选择，地方自治等等。他不懂国际法的某些准则，国际法在他眼中看来，在某些历史发展面前，毫无作用。因为‘自由’或‘民主’的字眼具有另外的意义，因此不应该相信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致。

“和赫鲁晓夫只有一个一致的基础，即苏维埃国家的实用主义的利己主义。为了避免使苏联人做出错误的解释，应该用不容含混的字眼明确表明西方的立场。如果提及实用主义动机之外的动机，赫鲁晓夫是不会理解的。所以在总体观念上永远不可能意见一致，但可以协调从彼此根本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会谈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赫鲁晓夫没有个人的虚荣，但他有一个弱点，总强调苏维埃国家的美德、进步和成就，如果人们愿意重视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从中获益。

“最后，还必须强调一个政治问题。赫鲁晓夫对德国极度的恐惧达到了有害的程度。的确，希特勒使苏联丧失了近 2 000 万人，它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保持一个软弱的德国，这是 K 先生的头等大事，不应对此低估。

“两点说明，切勿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相比，不要让对斯大林形象的回忆玷污了画面。K 先生不遮遮掩掩，也不疑神疑鬼。相反，他感情外露，总想居于舞台中央。斯大林听着，并不透露自己的结论。赫鲁晓夫爱说，他对每个问题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毫不隐瞒。因此应该鼓励他自我表达。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他的结论，并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以反驳。这种交流使人得到的东西比重要的声明似乎还多。人们可以暂时打断他的谈话。理想的做法是肯尼迪总统可以就具体和明确的事实向他提问，刺激他。

“以技术观点衡量，一个普通人难以和赫鲁晓夫的非凡精力较量；他将会谈时间延长以动摇对手的耐力，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因此应该将会议小心翼翼地限制在 90 分钟之内，每天最多举行两次

会谈,加上一个外交性质的集会。不要不知不觉地被赫鲁晓夫弄得筋疲力尽。”

这个报告表现了今天人们分析别人的性格及习惯的兴趣。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因此都成了敌手极好的目标。人们衡量着对立面可能从这些心理认识中获得的好处。就这样,肯尼迪平息了古巴的苏联火箭事件而没有激怒赫鲁晓夫。相反,有人会问,K 先生是否错误地听取了专家的建议,这些专家知道美国总统身患阿狄森病,可能让他相信美国总统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意志采取导致苏联不得不接受的最后通牒的措施。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时代,以和平共处的观念和停止核试验标明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发生了转变。但是政治局一方面保留着赫鲁晓夫强加的某些做法,一方面又要在 1964 年抛弃他,因为他有狂躁病,他易于冲动,自然也因为苏联在古巴丢了面子。

在他秉持国政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中,他是否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增长?1962 年 1 月 12 日,在他精神抑郁的黑暗时期之一,他高声呼叫:“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我想,当一个人没有工作,觉得他不能像从前那样有益于社会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很不舒服。”

1963 年和 1964 年,他的判断错误不计其数,他的思想糊涂了,眼里到处是敌人。他也开始迫害别人,并且幼稚地毫无批评精神地介入文艺领域。由于这种新的表现,他正与法国精神病医生皮内尔对躁郁症病人的描述相同:他们的怪癖可能产生于最狂暴最强烈的情感,最兴奋最激昂的热情,以及对神奇的狂热与追求所引起的浪漫和空幻。这种病有时是快乐的胡言乱语,表现为敏捷而不连贯的

俏皮话，说话充满兴奋和反常，有时则自视傲然不可一世，只追求尊严和荣誉浮华的外表。

然而赫鲁晓夫不能再长期这样自鸣得意了。克里姆林宫内，此次医生和精神病专家们受命进行磋商并作出判断。他们要提防让一个患躁郁症的人占据最高职位所引起的后果，这个人已经不能再让人信任了，他奇怪的举止已经使人丧失好感，丧失了人心，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人们还会让一个病人在国家元首的地位上胡言乱语和产生幻觉吗？还会让他冒比他有力得多的斯大林所接受的风险吗？医生建议将他赶下台去，正如200年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们建议取消乔治三世的王位，后者也同样是躁郁症患者。

1964年秋，10月15日，一个美丽的日子，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之滨享受休息的甜蜜，人们在莫斯科举行一次政治局的特别秘密会议竟没有通知他。他成为少数，立刻被排斥于政权之外，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三驾马车代替了他。随之而来的是莫斯科附近一座别墅里的流放生活，巨大的精神抑郁，悲哀，通过大脑和心脏的细微现象所观察到的代偿失调，希望幻灭和回到现实。

15.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8个月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认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将离开领导岗位。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日子：1976年2月。他们说，莫斯科的第一号人物利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引退。可是现代唯物主义四年一次的声势浩大的弥撒只是为那些精心挑选的善男信女们举行了一次平淡的仪式，给他们的只是安宁的准则。像平常一样，继续了12年的领导集团，虽然老相已见，却依然庄严、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满脸皱纹和更加笨重的勃列日涅夫也丝毫没有显出政权已开始使他觉得不堪重负的迹象。

西方的分析专家猜测他的退隐并不乏严肃的理由。苏联的第一号人物1976年已经迈入古稀之年。至少两年前他的身体就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元首的医疗档案最厚，那就是他。勃列日涅夫因此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既被类似青春不老泉

又类似毒药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蒙蔽了眼睛。

关于他，一种现象再次使人感到震惊：人民虽然面临着他们领导人的疾病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却在政治上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忧无虑。当旅客们知道驾驶员血管脆弱随时有心肌梗死的危险时，他们能毫不犹疑地让人塞进飞机吗？居住在一个水坝下面山谷里的居民们，当他们看到工程被交给一个患脑软化的工地指挥的时候，他们能不愤而反对吗？然而大家都忍受着国家领导层内发生的不可想像之事。

俄国人没有逃脱法则。他们在1918年枪杀了最后一代沙皇，接受了新经济制度。现在他们对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只有漠不关心而已。苏联的外国观察家们都说这种冷漠随处可见：当高音喇叭在莫斯科的公园里广播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的时候，没有人停下脚步来听；没有人停下来看那垂在屋顶、阳台及广场上的标语口号。“它们和树林一样，是风景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位译员向美国记者H·史密斯说，“我们对此不加理会。”普通人在等级面前仿佛无计可施，这种现象似乎比别处更甚。“两个世界重叠共处，”H·史密斯又写道，“高处是国家和国家制度，下面是久经磨难苟且度日的百姓。”这种漠不关心大概可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对勃列日涅夫身染重病毫无反应。加之，与西方人和他们的领导人相比，苏联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优待：他们从未正式听到过对这些疾病的谈论。

当三驾马车1964年10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接替了赫鲁晓夫的时候，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们曾摇摆不定。驾驶台上有三名指挥官的时候，谁都知道，轮船不能前进，它只能随波逐流。然而，赫鲁

晓夫初期也曾有过同样的经验，这使他们放下心来：三头政治从来不能持续长久。三个人之中，一个贪婪的家伙很快就会垄断基本权力。这场关系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究竟谁能吞掉另外两个的残酷游戏，没有进行多久，勃列日涅夫似乎最具条件，结果由他来定调，他的战友只好满足于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

机关工作人员的估计建立在两件事情上。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获得 750 名领导人和 3 000 名官员毫无保留的支持，军队的最高组织，750 名元帅和将军一致表示支持。他利用这两个操纵杆掌握国家。剩下的就是赢得国家安全机关和中央各部了。他只要用足够的时间，它们都会被攻克的。

还是在克里姆林宫里，1964 年 10 月 15 日以后不久，负责政权大人物们身体的医生们也开始做出类似的估计。像高级官员们一样，医生们很快作出了判断：勃列日涅夫将赢得胜利。然而他们却不无惋惜，因为在跑道上的三个候选人之中，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很快就要考验他们的学识。他们的看法来源于他们对三驾马车各自表现的分析。勃列日涅夫区别于过于谨慎的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他极度活跃。他的好斗性是一贯的，他思想与智力的强硬，他对前途所感到的永久的不安使他没有任何喘息之机。他的竞争精神始终激励着他。这些特点正是勇于行动的人的特点，然而也正是冠状动脉病患者的特点，是那些被兴奋所摧垮了的血管脆弱的人的特点。

1964 年，勃列日涅夫的血管变得脆弱起来，当时他将近 58 岁。

一个细致的检查结果表明(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也经过了同样的检查)血管过早受损,肯定了一种明显的糖尿病倾向并且开始出现肥胖症。心脏的肌肉好像也疲倦了。勃列日涅夫始终患着高血压,本身便产生过多的胆固醇,使他成为一个有巨大危险的病人。因而只要他还没有确保优势,他便不会听那些劝他克制的建议,也不会非常驯服地让人治病。

在俄国和在别处一样,权力候选人如果没有别人相助永远也无法登上政治顶峰。列宁推动了斯大林,斯大林看中了赫鲁晓夫及其一伙。赫鲁晓夫又把勃列日涅夫扶植上台。

像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也是俄罗斯人,他在乌克兰开始他的事业。他先当农民,后来成为钢铁工人和工程师,当了 20 年默默无闻的积极分子。当他领导摩尔达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的书记处的时候,赫鲁晓夫于 1952 年将他调至莫斯科自己的麾下,在日薄西山的斯大林的身旁。可是这位兴奋的皮格马利翁,这位未来摧毁斯大林神话的人,全然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被自己的臣属一拳击倒。然而正是勃列日涅夫宣布了克里姆林宫的第三位大人物政治上的死刑,他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宠儿,海军上将谢尔盖·戈尔什科夫的支持,后者由一个农奴的孙子成为俄国的舰队司令。肯定是因为他 1945 年 5 月立了战功,被提升为将军,勃列日涅夫才在军队里有那么多可靠的同盟者。当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他对军队关怀备至,不论是陆军、空军还是海军,对他们来说,一切应有尽有。

在这场新的权力之争中,人们曾预言波德戈尔内获胜的希望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然而开始领先的却是面色苍白的柯西金。他给

人的印象似乎是个没有力量的人,其实不然,他很难对付。1939年他就是党中央委员,1946年进入政治局,斯大林委托他负责俄国人的穿衣问题并为他们打开通往消费世界的大门。他喜欢坐办公室,每天至少12个小时。如果他的上峰更能理解人的实际愿望的话,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办事员,成为一个卢瓦,一个柯尔培。斯大林使他筋疲力尽,1952年甚至把他弃之脑后。他在风暴中低下了头,但接着又挺直了身子。固执、僵硬,他从1965年起成为苏联在外界的代表,而勃列日涅夫,为了将来的领袖地位,正在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柯西金力图修补和北京中断了的关系,他向巴基斯坦渗透,到巴黎去拜访戴高乐将军,在葛拉斯堡罗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时刻迫近了,他将同时迈入历史和疾病。

1968年7月15日,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警告。自春天以来,这个卫星国背叛了莫斯科制定的社会主义信条。勃列日涅夫用他粗大的声音回答了叛乱。8月3日,他同意和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在一个边界城市举行会谈。会谈被秘密中断。几个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为什么。一种突如其来的不适使勃列日涅夫卧床不起。心脏病专家很熟悉这种疼痛,它围绕着胸部,并且伴有出汗和眩晕现象。一个血栓堵塞了心脏顶端冠状动脉的一条小血管,这是心肌梗塞。坏死的面积似乎不大。但必须休息,医生们说要长期休养,他们奇怪的是事故发生得这样晚。勃列日涅夫只给他们几天工夫,由他们去想办法好了。修复人的身体,这是他们的事,他自己的事则是政治。而政治此时刻不容缓。人们让他吃大量的镇静剂和抗

凝剂，例如人类治疗学中久已使用的肝素，这些药物使心肌梗塞发病初期的死亡危险降低了一半。他于8月21日重新立起身来，可医生认为，他还应该卧床休息。他把俄国部队指向布拉格，在那里实现了持续两年的“正常化”。

当他的左右对动摇他的衰弱钳口不语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遗余力地对苏维埃政权机构进行了耐心的占领。他跑遍了最遥远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人们看见他出现在所有要人的办公室。军人和治国专家赞赏他对正式礼仪爱之如癖，但私下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很放松，他很随和，跳舞和打猎样样内行。就这样，他注意着西方所说的名牌形象，而在东方，这是一项新发明。医生建议他谨慎和节制，他却对此充耳不闻，但他不得不在1971年以前的数年中三次中断他的马拉松赛跑。他的医生说是“流感”，然而他们每次都让病人休息六个星期。对这样轻的病来说，康复的时间使世界上的专家觉得似乎太长了。相反，这一时间正好是心脏病专家通常给予侥幸逃过心肌梗塞的人复元的时间。

1971年，勃列日涅夫的命运失去了平衡。没有人再和他争夺集体世界的优势了。没有人在莫斯科的权力道路上迷失方向。俄国电视紧随他寸步不离。人们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可以与列宁和斯大林比肩。他是第一代的斯大林主义者，征服了第二代的后来者，即那些“中国人”，他们大概因为对他缺乏了解所以非常缅怀世界人民之父的严酷时代，并对敢于打倒偶像的赫鲁晓夫进行公开的抨击。勃列日涅夫也把别人打下去，那些冒险家和现代派。虽然他不像前任那样动辄流放了，但他仍然将那些“爬行的革命者们”关

进精神病院。他不用铁镣锁人，囚犯的禁身衣变做了化学禁身衣，这样，惹是生非之徒便不再形成阻碍了，他们睡过去了。

为了置身权利顶峰，他本身也做出了不少牺牲，即他的身体。从此，他将把自己的生涯建筑在和西方的接近上，所以他多次访问外国。只有基辛格，这位在尼克松和福特治下的美国国务卿在“空中外交”方面可以毫不费力地战胜他。他的手腕上亮着一块有双层刻度盘的表，它总是给他两个时间，他临时所在的地方的时间和莫斯科的时间。这种对新奇钟表的爱好还波及烟盒。一个事先调节好的装置只在固定的时候才开，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打开，否则只有将它打碎。他用这种办法来服从医生的意志而表面上又似乎看不出来。医生们坚持认为他必须限制自己对烟草的兴趣。如果没有他们，他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

1974 年将被打上他的印记。这一年，法国的蓬皮杜逝世；在美国，尼克松辞职；在英国，希思下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勃兰特下野；在以色列，梅厄夫人退隐；在葡萄牙，斯皮诺拉将军逃走；在阿根廷，庇隆末日来临。而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主义诞生了。他去古巴、东柏林、太平洋沿岸、南斯拉夫和巴黎。由于他们的大使、部长或元首的调停，他接待了美国、巴基斯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客人。他从美国人那里取得了一项有利的贸易协定和战略武装的平等原则。他发展了和东欧的经济合作。同时他使自己的国家远离了不断噼啪作响的中东火药桶。他亲自主管外交，庆幸实现了自定的目标，保证缓和。但与此相反，国内却依然使他感到失望。农业总是步履蹒跚，生活水平提高很慢，行政机构的臃肿

妨碍了技术上巨大潜力的发挥。许多外国客人注意到他已经耗尽了精力，他不会再创造新的奇迹了。他突然在年末卧床不起。

“流感”，莫斯科向世界宣布。心肌梗死，心脏病专家立刻纠正道，这次他们是了解情况的。心脏坏死的部分很大，苏联首脑数月内不能复原。但因为不能推迟接待一个埃及代表团，他便躺在沙发上，身穿睡衣迎接来访的客人。他的一名医生无意中使开罗的使者得知此次新的心肌梗死还伴有心律混乱，直立性低血压。血压明显下降了，随之而来的是眩晕、面色苍白、出汗和意味着失去知觉的视力混乱。

埃及人走后的 50 天里，没人再见过勃列日涅夫。人们还希望他 1975 年 1 月去中东？访问取消了。人们还等着他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仪式取消了。根据透露出来的某些消息，人们终于知道苏联首脑正在距首都 30 公里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是接待那些“劳累过度”的俄国高级官吏的隐秘医院之一。从此他不得不减少他所有的活动，接受医生严格的护理。

他无法再欺骗世人了。1975 年 2 月 13 日，他恰好走出疗养院迎接英国首相威尔逊。他完全是在给俄国电视做戏。苏联的评论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他身体健康。但晚上他倒了下来，脸上疲惫不堪。他又一次消失了。过了不久，人们知道医生让他住院减肥。实际上他一直有高血压，并且很严重。血里的胆固醇过高，同时三甘油酯含量过大，这些所谓中性的脂肪是由消化的食物脂肪体在小肠内化合而成。这三种因素大大增加了患冠状动脉硬化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的危险。

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动脉硬化症已被连续的心肌梗塞所证实，同样，他的动脉粥样硬化也被证实。因为几个月以来，当他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神经病学专家们可以看到他比平日更外倾，更少抑制，总之，更快活。这种快乐简直像假装的。人们不会被这种虽然微乎其微的迹象所骗，这是阿尔瓦莱兹综合征的开始，由于动脉血管的虚弱引起大脑某些微小的破坏。

克里姆林宫医疗小组之所以决定进行预防性减肥措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国家元首的血管，然后使他的身体准备经受一次手术的影响。1975 年 5 月 10 日，即苏联首脑为庆祝战胜希特勒德国 35 周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庆祝会的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再次住院。绝对保密。只有几个外国使馆被告知党的总书记将“消失”两个星期。

似乎是要处理颌上一个过去伤口的后遗症，因为勃列日涅夫长期以来感到说话困难。手术将由苏联的外科医生承担，由德国的牙科大夫相助，他们虽然悄悄地来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被发现了。然而元首没有作出解释的被迫的消失将延长时间。作为可以预见的反响，谣言立刻在苏联外部四起，几乎所有的传闻都令人惶恐不安。遇到类似情况总是如此。

人们不是说摘除下颌上的一个肿瘤吗？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有一种假设似乎与实际情况相近，这是医务界的观察家们提出的。

遭受过复发的心肌梗塞打击的病人的心脏有患一种普遍的并发症，即斯多克—亚当斯病的危险。这种病的特点是心房和心室的跳动受到愈来愈深刻的干扰。脉搏，通常每分钟 70 下，至少要减少

一半。血的流动因此大大减慢。整个身体由于供血不足将承受不幸的结果。心脏本身可能会引起颤动。大脑血液流通的缓慢会引起暂时的丧失知觉和眩晕以及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混乱，甚至还有癫痫发生，这是由大脑暂时贫血引起的。这些症状有时不仅会引起突然的休克，而且还会产生某些迹象，使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们在一段时间内误认为是脑血栓形成症或脑溢血。当化学治疗对这种病不起作用的时候，便只好在病人胸部安置一个心脏起搏器。一个微型的电池把有规律的脉冲传向固定在心脏上的两极。用这些人工的振动代替衰弱的大脑中枢所发出的不完整的振动。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以做颌上手术为借口（一个刚刚得过严重的心肌梗塞的病人似乎并不急于非做这个手术不可），很有可能是在勃列日涅夫受到斯多克—亚当斯病突然打击而衰弱了的胸部放了一个起搏器。

这样的一个假定从来也没有被人证实过，尽管美国那家生产这种起搏器居世界首位的公司总经理夸口说他的病人包括苏联的国家元首。同样，即使真的放了起搏器，苏联当局显然也不会承认。承认勃列日涅夫心内传导衰弱而必须用电力来辅助，苏联当局就等于承认他们的领袖已经不能充分保证他作为负责人所应起的作用。他面临着供应心脏起搏器的电池发生故障或者伸向两极的细丝断坏所引起的危险。

不管 5 月进行了什么手术，苏联的一号头目直到 1975 年 6 月 8 日才与公众见面，那是在一场足球赛上，他坐在波德戈尔内身旁。接着他又消失了，直至 7 月 3 日。此次他是以个人身份接见了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他对他说自从手术后他感觉好了一些。这些表现证

明他在量力而行。

1975年夏,所有的政治评论家都为了一次巨大的泛欧会议而聚集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他们一心一意地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仔细地分析他的举止,某些人还有医生相助,甚至试图在远处揭穿围绕着他的健康所浮荡着的秘密。他们首先注意到苏联国家元首乘火车而来,这似乎是明智的:对一个心脏病人来说,空中旅行总是危险的。他们接着看到他说话的困难依然存在,他的下腭上没有任何新伤口。他们最后发现他逃避社交活动,逃避芬兰礼宾计划举行的正式宴会。为了为这些逃避辩解,他的左右列举了没人相信的借口。他的助手们说他正在准备一份讲话,他牙疼,他正在处理国内的紧急事件。从此疑团不断地加厚,猜测蜂起。

勃列日涅夫对西方甚嚣尘上的吵闹充耳不闻,他节省地使用着自己的力量,从1975年夏天起便不再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仿佛收缩了,身体和政治一起收缩。他的外交欲望旺盛的时代完结了。他和美国人所签订的那个有利可图的贸易协定因为一场使他与美国人对立的关于移民自由的争吵而牺牲。他不像过去那样爱争论了,他无力抵抗了。于是他采取了果断的措施。11月,他对那些危及他在西方和亚洲执行缓和政策的人大发雷霆。他强化自己的政策是为了给莫斯科的鹰派一个保证吗?是因为他觉得身后有一个接班人正在暗中上升吗?或者只是出于他被阿尔瓦莱兹病破坏的头脑中增大的幻觉吗?

1976年春,他自命为元帅,借此继续向红军表明最高领导权依然掌握在文职人员手中,掌握在他的手中。夏初,他不得不去东柏

林，在市政厅的会议厅迎战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经历的反专制之风使他大为震动。聚集此地的领导人，半数要求选择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反对莫斯科的绝对权威，也就是他的绝对权威，因为他总自视为马列主义哲学的化身。他进行着自卫，这一点使长期没有见到他的人感到吃惊。他一点一点地回答着攻击和批评，却没能使人信服，结果他发言的时间多用了一倍。长时间的演讲使他疲倦。临行前不久，他只希望反对派们不要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接触中抛弃他们的革命精神。他后退，投降了。一个历史的转折。

显然，他已经不是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了，那个把被独立愿望弄昏了头的捷克斯洛伐克治得服服帖帖的勃列日涅夫了。他的激情正在熄灭。新政策并不能解释一切。一个肉体痛苦的大人物，无论他如何不同凡响，也不能对自己体内脆弱器官的波动无动于衷，他要自问它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一个有病的身体便是一座监狱。当疾病被认为难以遏制的时候，这座监狱就变成了可怕的苦役。无论克里姆林宫里给他看病和照料他的人是何等高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力有限。他们不可能给他柔软的血管，一颗新的心脏，鲜红的血，第二次青春和第二次生命。世界颤动着，它不断地更新从而长期存在下去。人只不过是过客而已。

16. 安东尼·艾登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真主是伟大的，他的仁慈之心广阔无边。然而伊顿公学培养的一位英国绅士在他的领域内代替了他，因为他影响了一个伊斯兰信徒，尼罗河上游河谷地带一个卑微的邮局职员的儿子的命运。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只不过是武装政变的上校，在开罗执政时间不长，他在接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实际上受到了大英帝国的首相安东尼·艾登的推动。

艾登并没有真把这位埃及人放在心上，一句话，他使他恼火，竟使他丧失了平日固有的冷静。他不是把这个马穆鲁克视为潜在的希特勒吗？不幸的是他本来想搞掉他，却加速了他的成功。历史有时随意打乱它的创造者的命运。由于过分自信，拿破仑因此在滑铁卢败于惠灵顿公爵之手。在卡诺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在他本想打倒在地的格列高利七世教皇面前卑躬屈膝。由于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艾登倒台，纳赛尔被猛然推向了伊斯兰世界之首。

为了洗刷自己，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患病，尿毒症发作至少有六个星期了。然而纳赛尔也同样病魔缠身，只是他当时尚不清楚器官混乱的性质，他不时感到那折磨着他的疾病加剧。但他拥有一种艾登没有的动力：他要权力，这种对权力的渴望噬咬着他的思想。于是他敢于以胜利者自居，虽然他的军队在苏伊士吃了败仗。从此，对整个中东来说，他成为铁人，是他使以色列、法国，特别是英国屈服。传奇风靡阿拉伯世界。

事情始于 1956 年 7 月。在埃及，现在只有纳赛尔一个人操纵政权了。他超过并排斥了纳吉布将军，后者是他革命的兄长，他曾帮他把法鲁克国王从法老王位上赶下台来。他身体高大结实，使人想起拉美西斯二世所钟爱的笨重的塑像。他既粗野又有风度，目光明亮，同他给人的印象颇不协调。他像鳄鱼一样的凶恶。这是个惯于指控别人的人，属于贪婪的一种。

在亚历山大的知识界，人们说他没有教养。的确如此，在戎马倥偬之间，他没有注意自己的教育。人们把他看做天真汉。并非如此。他出身贫穷，为了逃避饥饿而穿上军衣。他很快就明白了提升要在参谋部的走廊上而不是在苏丹沙漠遥远的哨位上获得。他母亲早逝，他以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并且很早就与父亲分了手，他谴责他匆匆再婚。这个自修者却有一名精神导师，他只读过他的某些著作，那是默斯塔法·卡迈尔，死于 1908 年的开罗政治家。卡迈尔唤起了反对英国人的民族与伊斯兰自豪感。他追求一个摆脱英国

占领的埃及，像西方那样，由议会进行管理，能够成为北非所有穆斯林的灯塔。纳赛尔循着卡迈尔的足迹，也相信上帝的选民。在迈出了掌权的第一步之后，他知道怎样培育穆罕默德的子孙和实现阿拉伯霸权主义。为了巩固他年轻的共和国，他找到了富有的同盟者和金钱。

一笔可观的数目：4亿美元。这是尼罗河阿斯旺水坝的预定费用。这样既可以控制大河的洪水又可以控制灌溉，纳赛尔计划给他的农民一种比蚕豆更富营养的食物。他最先探询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意见，他们开始犹豫不决，进而拒绝出钱资助。他们指责他一年以来和莫斯科过于眉来眼去了。苏联已经用现代化物资装备了他的部队。苏联刚刚向他打开钱柜：由它出钱修阿斯旺水坝，并且答应派水坝技术人员，希望依此确保政治打入非洲。最后苏联又在他耳边出了一个使西方难堪的主意：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纳赛尔于1956年夏挑起的危机对美国人震动很小。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只需把波斯湾的石油用大油轮从黑非洲南端运过来就行了。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更为担心的是11月份决定他能否重新主宰白宫的大选以及他的国务卿杜勒斯的患病，他的结肠癌已转移到肝部。巴黎似乎对埃及人的决定更敏感。在伦敦，内阁不安地自问首相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艾登任政府首脑已经15个月了，这足可以表明他不属于伟人一伙。他天性过于软弱。15年中，他在丘吉尔的庇护与培育下渐露头角。有人甚至说他是“最优秀的第二把手”。他风度高雅，衣着考究，甚至指甲也修得一丝不苟。这位达勒姆领地一个驯狗捕狐的

从男爵的后人领导了英国的外交部。显然人们注意到他空话连篇，这样一种倾向当时曾被认为是一种天才；外交官，囿于他的职业，从来不能下任何保证。当英国老狮屈服于第三次大脑血栓形成症继而放弃权力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对艾登的任命持有异议。出自一位这样的领袖之手，已经被世界上所有伟人熟悉，他使人感到放心。

然而英国在政府新首脑身上看到的不是1938年和国会及张伯伦对抗的、指责张伯伦与希特勒进行危险勾结的那个激昂和出色的政治家，也不是外交部有崇高威望的那个领导人，而是一个优柔寡断苦恼不安的人。也许公众事务已经使他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他能力不及。有人说丘吉尔这位可怕的精神之父使他像个孩子，他阉割了他。来自王国外部的第一个严峻的判断出自生命也遇到困难的杜勒斯：他对艾登的拖拖拉拉，对他高雅的举止感到恼火，指责他能力不足。接着，德国总理阿登纳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平庸之辈。

如果要为他辩解的话，应该指出艾登刚刚离开医生就掌握了领导权，而领导事务又使他觉得繁重不堪。因此他有理由郁郁寡欢，多变，总是对身体提心吊胆，总之，他得了疑病。

首先是老病胃溃疡。接着是1952年肝炎引起的黄疸。数月之后，一次X光检查发现他的胆囊被无数结石堵塞。于是在伦敦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手术肯定没有做好，因为热度和疼痛依然存在。艾登体力受到削弱。黄疸复见，决定进行第二次手术，但情况没有任何好转，病人健康恶化，便住进波士顿的莱黑医院做第三次手术。卡特尔博士发现他的同行们弄伤了向十二指肠输送胆汁的胆总管。他用一根塑料管代替。这种手术经常带来一种捉摸不定

的前途,并且,假如发烧的话,还会引起胆道发炎。经受类似的考验必然使人失去自信和对医生的信任。至于艾登1956年显得老于59岁自然也不会使人感到吃惊。

历史的机缘这时将使英国首相投身歧途而有利于纳赛尔。10月,匈牙利发生了反苏联的暴乱,这场暴乱喧嚣了几个星期,渐渐地掩去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所产生的反响。美国政府和英国内阁都密切注视着布达佩斯的街垒战。苏联在它燃烧的前沿阵地投入到力量较量中去,它把自己置身于联合国干夫所指的地位。没人再注意艾登。但他却忽起一阵自以为得计的冲动,即那种来自无意识的最深处的冲动。他终于觉得他显示自己国家领导人能力的时刻到了。纳赛尔成了他的眼中钉。打败了纳赛尔,他就可以把他过去作为一个怯懦的首相所经受的失败一笔勾销。有两位秘密的同盟者参加这一行动。两个似乎想在此次冒险中能有所得的国家:首先是以色列,接着是法国,后者难以忍受它在印度支那奠边府所遭受的耻辱以及它觉得正在阿尔及利亚增长的耻辱。于是中东燃起了大火。

英武的以色列人10月29日首先开火。他们进攻西奈的埃及人,尾随着他们扑向苏伊士运河。11月5日,英法突击队从空中和海上袭击富阿德港并将它占领。接着向已是一片战火的塞得港进军,预定在开罗与达扬的突击队会合。在战场上,接连七天以来,埃及人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向后撤退,溃不成军。

但是在另一处锤炼政治的地方,在宫殿的会议桌上,与艾登的期望相反,他不仅没有成为胜利者却成了被告。澳大利亚和印度不

赞同他的行动，在这两个国家后面，整个的英联邦起而反对。在伦敦，内阁由于被工党动摇而抛出了它的首相。“您将国家引向灾难”，人们这样说他。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咆哮着，用他的原子霹雳威胁英法两国。同样，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也跳了起来：因为苏联在匈牙利进行了野蛮镇压，他以为此次降住了苏联。而在他看来稳操胜券的联合国却因为艾登的壮举而重新分裂：在中东进行的海盗式袭击可与俄国在东欧的血腥镇压媲美。苏联人从中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良心平静。美国总统于是派他的第六舰队尾随于英法两国军队之后在地中海游弋。

艾登还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冲突的局势。如果他置威胁于不顾，世界力量的对比不是要被他改变吗？他不是还有使世界毁灭的危险吗？丘吉尔要是遇到这种形势将怎样处理呢？首相又一次证明他不具备伟人的条件，那是些没有神经、在大国较量的棋盘上从来不让他们的兵卒后退的人。鼓舞他的那种疯狂的冲动没有持续下去。艾登带着受压抑的大脑屈服了，命令停火。剩下的事人们已经知道了。东欧的人民知道西方绝不会为了他们动动小手指。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事先开绿灯，他们决不能采取行动，无论是事关自己，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世界被大国、被美国和苏联所瓜分。

纳赛尔在开罗喜气洋洋。事变刚刚把武器交到他的手里，他可以把已经开始实行的默斯塔法·卡迈尔虔诚的计划进行到底了。从此，他把犹太人作为替罪羊扔给他激动而又不幸的人民。

他在这一旗帜下团结了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以及

腓尼基银行家的银行黎巴嫩。战争在沙漠和海滩上的失败和军队溃退有什么关系!

艾登本人则没有这种天赋。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前面的病状,却对他那使他在困难时期变得衰弱的尿毒症危机一带而过。他只是说发烧和疲倦,没有别的。可是,当肾脏过滤的血量减少、尿的产量降低的时候,迹象是明显的。含氮的杂质在血管里愈积愈多,当达到每升三到四克的时候,身体器官就会发生困难并且急速恶化。有时,肾脏机能不足,能够通过尿里红血球含量的不正常表现出来。这些混乱需要医生给予治疗。但在伦敦和英国,似乎没有一个医生知道首相的这些病症。事实上,艾登觉得力不胜任,他大量地服用苯齐巨林以激励自己。根据他的医生伊文思勋爵的说法:他实际上已经中毒了。他说艾登访问过内阁的同僚们之后,同意在牙买加休养几个星期。1957 年 1 月,他提出辞呈,从此永远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在当代历史上,他是以疾病这个未被证实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无能辩白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

与此相反,纳赛尔上升到权力顶峰,这使政治界惊诧不解。使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他的年轻,虽然他才刚刚 40 岁,在一座六七十岁老人颇多的宫殿中是个例外,他的有目共睹的无以区分真假使谈话对手惊讶不止。法国记者让·拉古杜尔解释道:“这种病无法描述,它半属传统半属性格,它使对手们不知如何是好,却能使自己逃脱最可怕的灾难。”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冲动的灵感和疯狂的自我启示混在一起。他是穿着阿拉伯斗篷的罗康波尔,是阿拉伯说书人等待着的英雄。他撒谎吗? 当然,他相信自己的那一套

吗？毫无疑问，他维护着这些直至发疯。精神病医生认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是精神结构中一种歇斯底里的表现。

他沉醉于权力之中，冷酷而多疑。只有无秩序的混乱才使他高兴。在他身边到哪儿能找到有条理的人、组织者和制定计划的人呢？也许在政治警察那儿，或者在由萨拉赫·纳赛尔所领导的情报部门能够找到。其他地方，到处都是管理秩序的混乱以及对这种混乱的忽视，最高领导之间联系粗心大意，参谋部里对危险缺乏估计。纳赛尔随意使用那种把自己的冲动和倾向抛给别人的防卫机器，而他自己则否认有冲动和倾向存在。

对在贝鲁特的大学教授历史后来成为黎巴嫩外交部长的查尔斯·马立克来说："纳赛尔主义是一种阿拉伯穆斯林反对西方的思想受到过长时间的压抑的反应，只不过来源于一种伤感的民族主义，一种自卑感罢了。"这种反应几乎总是导致战争。纳赛尔政权虽然曾夸下海口，却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经济失败。1967 年，由于他吹牛和挑衅，禁止以色列船只驶进蒂朗海峡，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冲突。达扬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只用六天工夫又一次打败了他的军队。他会因此倒台吗？他否认失败，像 1956 年那次一样，把失败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还装模作样地要下野，却又立刻重掌政权，把民众的虔诚作为法老的贡品。他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神赋能力来这样欺骗他的百姓啊！感谢真主！

他从使他沉醉的权力里暗中吸吮着那甘美的乳汁。他是烟鬼而且又贪吃。他很像那些满载荣誉奖牌退出比赛的运动员，告别了与竞赛联系在一起的艰苦生活而渐渐地肥胖起来。他建筑在通往

赫利奥波利斯大道上的别墅每年一换，渐渐扩大着，由舒适而豪华，直至变成宫殿。他在1958年以前每周打三次网球算作休息。后来他在网球场的原址上盖起了一个巨大的办公室，因为他既不能跑也不能跳了。呼吸还好，双腿不听使唤了。痉挛使腿肚子和大腿上的肌肉麻痹，他感到疼痛难忍以至于无法迈步。他终于询问了安瓦尔·穆福提博士的意见，后者并没有总当他的医生。纳赛尔是个严重的糖尿病患者，他的病多年以来没有被发觉，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下肢所出现的病状表明动脉炎正在发展，这是身体机能混乱的最初结果，其他后果会接连出现，医生说，可能会威胁领袖的能力，可能使他不再适合领导国事。穆福提博士为他的直言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特务部门的头子萨拉赫·纳赛尔接着命令把他关进了监狱。

人们知道，糖尿病表现为尿里含有大量的对生命起重要作用的葡萄糖。这种病理状态是由于胰腺损伤不再分泌胰岛素引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脑神经中枢的衰弱，甲状腺或肾上腺分泌过多，葡萄糖在人体细胞中应用的混乱，以及遗传和食品过量即肥胖症的影响。

纳赛尔得的这种糖尿病被称为脂肪性或简单糖尿病，乃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糖尿病。患者多为缺乏运动、多血和喜欢大吃大喝的人。在通常对尿进行检查的过程中，由于排尿量的增加和不正常的口渴偶尔也可以发现这种病，或者，像领袖那样，是在出现最初的并发症后发现的。

并发症很多。血管方面，首先表现为下肢动脉炎，然后产生高

血压、心绞痛、脑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梗塞的威胁。神经方面，这些并发症产生神经炎、多发性神经炎、麻痹，使颅神经受到损害。糖尿病还产生蛋白尿、肾功能减退现象，有时将肾破坏。同样还能产生肺结核或者视力混乱。而最常见的事故则是休克。

纳赛尔经过了好几次休克，这些休克产生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离开了规定的食谱，或者是因为疲劳，或者是因为精神打击。它们表现为口渴难忍，嘴里有丙酮味，呼吸艰难有声。领袖身体的血糖含量上升为四到五克，碱储备猛然下降。

这种病对身体的破坏力很强，必须严格地控制饮食，每日注射胰岛素，胰岛素比某些药物，诸如磺胺以及胍的衍生物，更能使血糖含量下降。

注视着他们北非主要盟友身体状况的苏联人很快发现纳赛尔的举止发生了变化。1968 年 7 月，当纳赛尔到莫斯科来定购可以与以色列空军中的美国“鬼怪式”飞机对抗的战斗机的时候，他们利用这次机会建议他作一次深入的身体检查。检查结果证明穆福提博士发现的静脉炎加重了。大腿的血管变硬，它们的内部直径缩小，血液流通更为困难，肌肉纤维供氧不足，因此造成腿部严重痉挛、麻木和僵硬。静脉曲张性溃疡要立即进行治疗。如果做血管手术同样可以使某些血管部位从血栓形成症的堵塞之中解放出来。但苏联人宁愿先让他试试温泉疗法，在格鲁吉亚的茨哈尔图博气候疗养站，距库泰西九公里，那里的矿泉对治疗炎症颇为有名。领袖于 1968 年 7 月 28 日被安置在那里，由叶夫根尼·沙卓夫博士护理三个星期。效果不大，他的身体不断衰弱下去。

不过纳赛尔已经放弃了他每天的 70 或 80 支香烟，并且适量地控制食用的碳水化合物。但已经太晚了，他正在为 20 年的暴饮暴食和缺乏小心付出代价。1969 年 9 月 11 日，正当卡扎菲上校以纳赛尔主义的名义在利比亚夺取政权的时候，领袖卧床了。然而对埃及来说，那是个严重的时刻。以色列空军两天来不断地对他在苏伊士湾的军事基地进行狂轰滥炸。他的某些指挥官暗中骚动起来，他们反对最近采取的对犹太人进行消耗战的决定。

公开的说法是纳赛尔在月初，在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国家元首举行的会议开幕前不久，患了严重的流感。医疗公报宣告领袖将摆脱日常事务六个星期，世界上任何地方遇到类似情况莫不如此。实际上，这是一次心肌梗塞。沙卓夫博士领导着医务小组。除了医生们之外，只有七位政界人物了解他得的是什么病。纳赛尔的妻子本人也对他的境况毫无所知。但她怀疑是否是一种普通的病，因为她看到技术人员在他们的别墅里安装了电梯。沙卓夫博士告知纳赛尔他不能再进行水疗了，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别处，至少五年内不能。他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即使他感到难受，因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纳赛尔的心腹和发言人穆罕默德·海卡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最终夺去领袖生命的疾病没有作丝毫的掩饰，但他对国家元首经过这次心肌梗塞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变化没有作医学上的说明。纳赛尔的自信不如过去了，他有时忘记了主题，忘记了具体的事实，只是大谈以色列的失败，他总是宣告以色列的失败就在眼前。他成了一位神志模糊、举动无常的总统，并且时时咄咄逼人。

大脑受到伤害是这种变化的原因。糖尿病引起的严重并发症至少三分之二是心肌梗死，一般产生于发现糖尿病的15至20年之后。当心肌梗死发生的时候，由于来得突然和引起恐慌，有时便掩盖了那经常与它同时俱来的脑血管损伤。许多专家注意到，一个被心脏病打倒的病人，或者是因为全身动脉硬化，或因胆固醇和三甘油酯混乱，大脑要同时经受并无多少迹象的轻微损伤。解剖证明，死于心肌梗塞的病人，35%大脑里有严重损伤。那些逃过心脏病打击后来产生可以观察得到的大脑混乱的人，10个有6个是由于和心脏危机同时发生的大脑血液流通减弱所引起的。

1970年9月27日，纳赛尔结束了阿拉伯国家首脑在希尔顿旅馆召开的巴基斯坦问题会议，他觉得非常疲倦，只想睡觉，只想长久地沉睡下去。下午3点半，他回到别墅，没有同等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同吃饭，而是躺下了。疼痛加剧，扩散着，是糖尿病还是休克？他要了一杯桔子汁，把他的医生萨威·哈比卜叫来。4点钟，心电图表明他进入了心脏危机：又一次心肌梗死。

总统秘书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叫来海卡尔。当海卡尔迈进纳赛尔的房间时，他发现内务部长和总统事务代办已在那里。四个政界人物莫名其妙地看着医生们忙乱不休。一个医生把一个电击起搏器的电极置于领袖的胸上。接通电流，总统的身体抖动了，但心脏还在震颤，它无规则的跳动愈来愈弱。另一个医生跳在床上，双手平放在心脏的位置上，试图使心脏重新用力地跳动而费尽了力气。心脏病专家们奋战了三个小时，器官却从此永无反应。

三天之前，也许纳赛尔觉得这个时候已近，他像大多数人一样

无法克制心中的恐惧。他在和海卡尔谈到那只有象征意义的天堂和地狱时低声说:"这意味着我们死后便不存在了? 就这些了吗? 不能让人心安。"

死之前,他从莫斯科勃列日涅夫那里获得了"萨姆 3"火箭中队和空军中队,这使他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得以发动一次新的对以色列的战争。这是他留给他的农民的最后的礼物,依然是火与血。

结束语　从医疗秘密到反对滥用职权的集体合法自卫

世界上约定俗成的医疗秘密，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社会，特别是当它要保护一个执政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陈旧过时的概念了。

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医生必须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并非单独甚至也并非主要是为了病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严守秘密，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对病人和集体均有好处，它对医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必不可少。

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医生面临着某些义务，许多与国家元首本人或职务联系在一起的医生都会处于这种局面之下。为国家计，被动员的医生以这种身份所作的任何透露，因其职责所在，都是合法的。医生无须自问，他的职业义务是否也允许这种透露。他因此不能以医疗秘密为借口回避他的国家公务人员章程所规定的必须透露的

义务。被国家所雇用,他在自己的医疗工具箱中带着他的职业所固有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职责所固有的权利和义务。

存在着某些透露医疗秘密的例外情况,它们的合法性不容怀疑。为什么关于不许透露职业秘密的禁令永远不能被合理地违反呢,而例如关于不许杀人的禁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正当自卫,却可以被合理地违反呢?

当一名医生发现一名病人得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的时候,保护公众的健康要求医生的不是沉默,而是报告当局,使当局得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保守秘密的义务必须绝对遵守的话,则相应地要牺牲同样也应该受到保护的公众或个人的利益。例如,下述情况是不可取的:一个医生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病人不适宜用汽车运送,因而对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或者不向任何人透露,父母虐待孩子,使他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

从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严守秘密的责任一定要超过任何其他的义务或权利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人们不会接受这种责任可以为维护随便什么利益而被合法地牺牲。因此,解决说与不说之间的冲突总是意味着要权衡矛盾着的利益双方。在遵守保密的义务的同时,人们不应忘记,这主要是为维护公众利益而制定的。

可以这样来概括对这种权衡的裁决:任何对职业秘密的违反都是错误的,如果这一违反所维护的利益的重要性小于它所伤害的利益。

这一平衡原则似乎不难理解，但应用起来却并非易事。当然，法律有时可以做出裁决，指出医疗秘密是否应该为更高的利益牺牲：为必须公开可传染的疾病所采取的措施是考虑到要保护公众的健康，而不是保护病人对他的医生的信任。当法律表现得模棱两可或沉默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总原则能帮助决定天平摆向透露非法或合法的一方。当缺少明确的规定的时候，人们同意由医生自己决定保守还是公开秘密。秘密的公开绝对不应该超出达到既定目的所必须严格遵守的范围。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将要查阅那些分别对待自卫和紧急避难的法律条文。当利益存在着明显冲突的时候，即病人保密的基本利益与第三者或公众利益发生对立的时候，医生不能自己对冲突作出决定。他必须寻求可以使他解除严格保密义务的合法途径。如果为了挽救公众的利益必须透露的话，医生似乎可以运用这一途径。当然，西方社会的医生应该继续保守职业秘密，但他不能总是以医生宣誓作为依据，因为道德在今天的演化和医生与政治的联系已使它陈旧了。一名医生不能苛求法律保障和内心平静。恰好相反，他的幸福乃是在两种矛盾的需要中努力找到平衡点。一个服务于国家元首的医生，如果他认为针对病人的精神表现和肉体疾病及其健康状况所必须进行的治疗威胁到集体的时候，他如果还过分强调要保守医疗秘密的话，那显然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历史中却屡见不鲜，我们在本书中只不过揭露了那些最为明显的案例而已。

1966 年，即丘吉尔死后一年，他的医生莫朗勋爵在回忆录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他那位杰出的病人的医疗详情，从而引起世人对职业

秘密进行了一番大讨论。

莫朗勋爵论证了对于任何历史时期，如果不详细地叙述表现这一时代的政治家的精神状况及疾病状况，则无法进行研究。某些人批评他违背了职业秘密的原则。莫朗解释他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他的病人的死使他解除了职业秘密的束缚。在这点上，丘吉尔的家属与英国医生观点抵牾。但渐渐地莫朗勋爵的批评者却改变了观点：某些人对病夫竟然被置于领导国事的岗位上感到吃惊不小。最后的情形是，莫朗勋爵之所以受到批评并非因为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而是因为他向全国隐瞒了丘吉尔可悲的身体状况，因为他没有及时采取断然行动。这些看法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这一观点：当集体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具有相对性。

人们或许认为医生过分重视政治领袖。归根结底，政治领袖虽然握有巨大的个人权力，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影响具有自己的力量和活力的事件。但对最后几十年历史事件的分析表明，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伟人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平衡就变得重要起来。

一个像迪安·腊斯克那样的人，他做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在参加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曾经对一个由冲动和高血压支配的人的决定性意义作过很好的分析。他直率地指出担负着重要责任的有病的领导太多了，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

顺便提出几点看法。我们自己没有护理过本书所研究的任何

一位领导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与职业秘密的概念毫无关系。除此之外，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想要证明的是人们不可信任那些患病的政治家，甚至包括像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最为诚实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能力做出判断，他们不了解（自觉或不自觉地）他们的身体状况，到了一定年龄，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全然不知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最后，某些政治家甚至不会估计他们所得的或可能得的疾病。前首相艾登就这样写道："如果人们向一个肩负一项重要任务的人说他有心脏病和癌症，他仍能够继续他的任务，直到没有力量为止。"而艾森豪威尔断言，如果俄国人正当他心脏病危机的时候发动进攻从而"制造一种严重局势，要求迅速对使用武力做出决定"，他肯定会独自一人做出判断和反应，度过他病中的第一个 48 小时……

人们同样要问，而肯尼迪总统和蓬皮杜总统的医生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国家元首没有"因病休息"的时候，给他们用某些药力和刺激性很强的药物（特别是可的松的衍化物）是否合法，因为它们会对精神和智力产生副作用。

我们想强调另一个使我们不胜惊奇的事实；除了艾登之外——他以患病为理由在苏伊士发生灾难的时候（1956 年）离职而去，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场灾难的后果——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因为健康原因而放弃权力！他们视自己为超人吗？也许。他们的医生却从此遇到了麻烦。他们不能像在别的病人面前那样让人敬畏，并对某些限制做出规定，他们无法维持通

常的“大夫—患者”关系，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元首同意扮演一个病人的角色。戴高乐将军，虽然骄傲，却知道向他的外科医生阿布尔克博士表示感谢：“教授，一切都有赖于您……”

有时，医生是有罪的，例如莫朗勋爵便是这样，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温斯顿问我他是否应该早就退隐。我没有回答，但我也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50 年后，人们对我起的作用将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惟有我可以敦促他继续执政，但我知道不出一年，他还没等退休便已经难以胜任了。他的家属和朋友都恳求他休息并从国事中抽身。他们担心他会干出什么有损于他名声的事情来。而我认为此事与我无关。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退休，他将认为他的生命从此结束了，他会对失去生活的理由感到非常不幸。既然我是他的医生，我便有责任尽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人们不难看到，错误地对待一个政治家的医生所起的作用会使人走上何等谬误的道路。莫朗勋爵毫无顾虑地为他的病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英国的利益。他忘记了他不是丘吉尔的私人医生。1940 年 5 月 24 日，英国的战时内阁指派他去照管首相的健康。他从政府而不是从温斯顿·丘吉尔手中接受了委任。

就这样，由于缺少明确的原则，这介于医学和法律之间的无人地带可以使人们对职业秘密和患病国家元首的“患者—医生”关系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某些医生援引医生宣誓以便使诊断不要外泄的同时，另外的医生，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军队医院工作的医生，却在公布系统检查或有关美国总统病状的公报。还有一些医生，觉得必须向国民撒谎才行：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乔治·蓬皮杜总

统的医生撒谎而对总统的瓦尔登斯特罗姆病只字不提，或者以保守职业秘密为借口，公布一个假诊断（流感的诊断），却又无视这同一秘密，在公报上正式谈论他的痔疮……职业秘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原则是有争议的，它没有强迫医生一定要说谎或像在苏联、埃及、美国、英国和西班牙那样，用一场需要“至少休养六个星期的流感”来掩盖一次心肌梗死……

不是也应该考虑到照料国家元首的医生们的能力吗？美国的办法是指定一个属于军队或海军的医生，这种办法似乎引起很大争议。根据某些医生的回忆录（丘吉尔的莫朗勋爵，罗斯福的麦金太尔海军少将），人们发现这些医生不管愿意与否，都对生活在权力轨道上感到高兴，他们没有勇气要求他们显赫的病人离开领导岗位。

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克雷孟梭的话，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太重要了，不能只让医生负责。怎么能不让人回忆起英国议会的明智呢？两世纪以前，它指定了一个医务委员会来检查国王乔治三世所患的躁郁症。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国王无法继续任职，于是任命了一个摄政议会。如果美国的民主机构能够做出此类预见，人们可以假定理查德·尼克松将在进行身体检查之后被罢免，这样美国也就无须受水门事件之苦了。

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身体健康。他当时还就某些英国海军上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发表过评论，说他们遇到了“健康问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荣誉，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一个丘吉尔对自己的病况竟毫无所知，全然忘记了他过去说过的话。

有没有办法来预防这类关系到每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及整个世界的事情呢？

关于预防国家元首的精神或肉体患病问题有很大的争议。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之后，领导世界精神卫生协会和特别研究了希特勒的替代人鲁道夫·赫斯的情况的里斯博士，相信人们可以防止某些有性格障碍的病人接近权力。但这是枉费心机。水门事件发生后，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希望人们对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测验（美国精神病医生进行的一次测试把与约翰逊总统对抗的戈德华特先生钉上了耻辱桩，但人们竟忘记了对约翰逊总统本人进行测试！）；第二种认为不可能对台上总统的行动作出预断。以丘吉尔为例：英国内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像走马灯一样地轮换，但他因为个性的态度和孤立的立场（他支持前国王爱德华八世）而被一直排斥于内阁之外，虽然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出色的预言家。然而由于身体和精神过度活跃，他忽然被推上不太令人羡慕的英国首脑地位，与在波兰和法国成为胜利者的希特勒对抗。掌权之后，他的决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引起相当大的争论，甚至有时带来灾难。但他被一群比他更有力量的人包围着，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他被他们反对，甚至有时遭到他们的嘲弄。在北非，他才第一次扮演了军事领袖的角色。在别处，他总是与美国领导人意见相左。胜利之后，英国人民自然而然地告别了他们卓越的领袖，而选定了一些不甚杰出的领导人，但这些领导人却更具解决这场毁灭性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才能。

在身体状况上搞点虚伪的名堂必不可少。美国总统候选人都

要公开他们或真或假的健康检查。新闻界也时常要卷进来。正是他们挖掘了一份精神病护理材料使伊格尔顿的政治前途被毁……约·菲·肯尼迪没有谈他的阿狄森病并禁止他的左右对此作出回答……庇隆在经过系统检查医生对他大开绿灯之后发生一次心肌梗死，这并没有妨碍他于1970年宣布参加阿根廷总统竞选。他后来成为一个行动艰难的心脏病人，将权力让与妻子。当这位独裁者病死的时候，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1976年的数月之中，美国民主党人思索着吉米·卡特是否适宜做白宫候选人，或者是否应该有别的竞争者与他对抗，从而最终不得不选出一个更为不偏不倚的人，即前副总统H·H·汉弗莱。在1976年7月的候选人提名大会之前，汉弗莱认为，基于他的经验，他将是党的理想候选人。但1973年曾发现他的膀胱有恶性肿瘤，手术之后还进行过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给这位政治家带来妨碍。大概因为肿瘤是恶性的缘故，他现在依然在用化学疗法治疗，而他却半含半露地说那是为了预防良性肿瘤变成恶性肿瘤。美国显然不想再提及任何有关他们总统的病理，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最终关系到所有的民主国家。任命吉米·卡特解决了汉弗莱的问题。但人们又一次看到，如果汉弗莱的提名被民主党的"国王制造者"们保留的话，美国医生无法对此进行反对。

美国的政治观察家对此作何感想呢？最为人器重的政治观察家之一、《纽约时报》的社论撰写者詹姆斯·赖斯顿在总统竞选运动开始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回忆说，1944年，罗斯福在他的健康问题上欺骗了选民，而他本人又被他的医生所

骗：约翰·肯尼迪并不是人们在他当选时所看到的那样年轻、强健和充满活力。选民们似乎并不为此担忧，既然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患过心脏病及肠胃病之后又重选了他，既然约翰逊虽然有心肌梗死却也中了选。詹姆斯·赖斯顿用更明确的语言说："然而，当我们强调必须了解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财产状况时，关于他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对于领导国家事务来说显然比财产状况更为重要，我们却相信他和他的医生。我认为很有必要，在候选人被他的党正式提名之前，应该由一个医务专家组成的小组，对他的健康状况作客观的检查。人们可以说我介入了这位候选人的私生活。但假如说每一个进入美国军队的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的话，很难使人同意，一个其责任更为重大其身体及精神状况关系到集体利益的未来的总司令可以不进行同样的检查。"赖斯顿然后讨论了候选人华莱士和汉弗莱的身体状况，提到了他们各自的病况，并且公开了下列这一事实，这对我们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偶然问到了华莱士他在正式成为党内候选人的时候是否同意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他回答我说，如果别的候选人这样做，他也肯定这样做，但没有人向他们提及这个问题。"赖斯顿用伊格尔顿事件为例强调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也应该进行同样的身体测试，特别是因为他们一般说来都超过了 60 岁……

人们又一次看到，即使在一个于 1976 年庆祝了革命 200 周年的伟大的民主国家里，民主机构也不足以防止一个身体患病或者也许精神患病的人获得最高权力。

上述看法使我们关于权力意志的根源得出了几点感想，我们另

有著述论及这个问题。执掌政权似乎可以作为童年遭受强烈的人生辛酸的酬报，而被遗弃的孩子(孤儿、私生子、弃儿等等)的痛苦最甚。从此权力对所受到的辛酸来说犹如一种药物，一种麻醉品，一种灵丹妙药。于是人们懂得了这种主宰别人、统治他们并让他们经受报复法则的欲望。这些人不能同意因为身体有病而放弃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是神圣的，多数公众承认某些国家元首的权力是上帝赐予的。民主国家里更为独立的宣传工具允许一部分公众从这种看法中解放出来。今天，对待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人，不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管理机构里或军队里，传统的态度摇摆于两个极端立场之间。一种是赞成、仰慕、崇敬和偶像崇拜，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均不乏这方面的例子。相反的态度是冷嘲热讽的反对，对任何赞赏的热情(哪怕是部分正确的)都报之以辛辣的挖苦，甚至发出无政府主义的诅咒。自从法国革命以后，后一种态度更为普遍，当时，等级制度“神圣”性质的两重性暴露无遗。

在欧美教育界，有人开始对“大人物”，对领袖，对政治天才进行科学批评，他们被旧学派的历史学家多少次当做传记的样板，并被从普鲁塔克[1]开始的古典教育捧上了天。人们用不着一定接受龙勃罗梭[2]的看法，他干脆把天才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但当他们看到苏联的“个人迷信”把人引上了何等谬误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可以提出某些问题。

事实上，在执政过程中所应该实行的健康监督乃是议会监

① 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

② 意大利著名的医生和刑法学家(1835—1909)。

督的正常发展，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乱及其向专制形式或多或少的偏离。对于一个在估计和判断愈来愈复杂的问题过程中被技术和实际困难所压倒的公民来说，经常显得不足的政治报导应该由健康报导来补充。正是这样，即使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建立的权力也成为篡夺和滥用的权力。

因此，对国家领导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公民或哲学利益的表现，这一研究成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问题。读者正是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本书所包含的信息。它不是为了揭露政治家们被掩盖的一面，而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在某些国家里执掌政权成为一种麻醉品，对这些人来说，政权从此须臾不可缺少。也许政权真正民主化之后，人们会看到辛辛那图斯[①]的榜样重现。经历了一番光辉灿烂的生涯之后他重归故里，但元老院的一个代表团强迫他接受君主之位，因为罗马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极为迅速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立刻辞职，重事农耕生活。英国首相威尔逊不是已经仿效了辛辛那图斯的榜样吗？他于 1976 年初宣布辞职，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非这样做不可。当然他一定有他政治上的理由。但另一种力量推动着他，他已经 60 岁了。

1976 年 9 月

① 罗马民族英雄，公元前 460 年成为执政官，打败入侵者后即退归田园。